

伊·高祖科

(Igor Gouzenko) 原著

鐵幕



—— 一個蘇俄間諜的自傳

馮 若 蘭 譯

叢書
之一

台 港 新 生 報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879.57

著者號 7714

登錄號 1155

國史館藏書



0120724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序

一切愛自由正義愛國家民族的讀者們，在閱讀本書正文之前，我們希望大家注意：這書中所記敘的，全部是血淋淋的事實，切不可拿讀傳奇小說一般的心情去讀它。寫這本書的人，現在已經入了英國籍，仍舊留居在加拿大，受着加拿大警察的嚴密保護，但爲了避免蘇俄間諜的謀害，他的居所一向嚴守秘密，除了加拿大政府極少數的高級官員和警察當局外，沒有旁人知道。如果讀者中仍有人對書中情節表示懷疑的話，請記住本書所列舉的若干文件，曾經爲加拿大司法當局所採用，作爲對於因書中所述間諜案而受牽連的若干顯赫人物判刑的根據。這些文件都是本書作者冒着生命的危險從蘇俄駐加大使館的檔案中偷竊出來的，其真實性自然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

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點，乃是因爲我們認爲這正可以幫助讀者們瞭解本書價值所在的原故。自從世界上出現鐵幕以來，關於暴露鐵幕內情的書籍雖已出版了不少，但沒有一本能像本書一樣引起整個自由世界的驚異和重視，這多半是由於它們不像本書一樣舉證確鑿，使蘇俄的同情者，無法再作有效的抗辯。

本書的出版，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來說，真可算得是近幾年來的一件大事，因爲我們到底有了一種權威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透過蘇俄的宣傳，來觀察這個所謂共產主義的「天堂」裡面的一切秘密，同時並使我們明瞭，鐵幕的主人無時不在利用其業已伸展到自由世界的侵略觸鬚——蘇俄的間諜網——陰謀使全世界的自由民族都淪入鐵幕，供其奴役，因而引起我們的警覺，加強我們的戒備。

我們中國人讀了本書，更具有重大的意義。目前我們正在從事於反鐵幕和反奴役的生死鬭爭，祇有使大家都明瞭鐵幕生活的可怖，和自由生活的可貴，才可以堅固我們的作戰決心，提高我們的作戰勇氣，從而爭

879.57
7706

880.59
0082

取作戰的最後勝利。就這個目的而言，本書無疑是我們今日最理想的讀物。其次，在共匪這個大規模叛亂集團中，雖然大多數都是些盲從和脅從之輩，但也有不少是中了赤化宣傳毒素的影響已經很深，而甘心作鐵幕主人鷹犬的，對於這些人，我們怎樣去作一番消毒的工作，使他們看清楚鐵幕內人民生活的真象，然後再促使他們自動地醒悟過來，重回祖國的懷抱，也是當前的急務之一。要求達到這個再教育的目的，本書無疑也是目前最理想的教科書。最近我們接到一位讀者來函，要求以本書來作為教育匪俘的課本，可說與我們的意思不謀而合。

由於這種種原故，所以我們決定將本書在報上連載後再印行單行本，使更多的熱血志士有詳讀本書的機會。關於本書的逐譯，承馮若蘭女士精心努力，寫成了流暢美麗的譯文，又承張維城先生繪製封面，鮮艷奪目，為本書增光不少。其他幫本書設計與校對的先生們，均于此一併誌謝。

編者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誕辰紀念日

譯 者 引 言

一九四六年的年初，全世界報紙都刊載着一個驚人消息：蘇聯在加拿大探聽原子彈秘密的間諜網破獲了。舉發這陰謀的人，乃是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武官處的一位密電員伊各·高曾科 (Igor Gouzenko)，也就是本書的原著者。

高曾科出身於蘇聯的農家，憑着他本身的努力，被蘇聯當局視爲優秀青年，給以特殊的訓練，成爲密電的專門人才，先在莫斯科情報總局，後來派到加拿大蘇聯大使館工作，因爲他職務的關係，參與種種機密。他到加拿大之後，目睹了民主國家人民真正自由的生括，使他對蘇維埃制度的殘暴黑暗深惡痛嫉，經過了相當時間的內心衝突，終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的晚上，冒了生命危險，竊取蘇大使館有關間諜活動的卷宗，向加拿大當局舉發，於是蘇聯的陰謀乃大白於世。

高曾科後來入了加拿大國籍，現居加拿大，因防蘇聯特務的毒手，至今隱姓埋名，在加拿大警察的週密保護之下，他的確實居處，也僅有加拿大警察及少數當局知道。這本書是他的自傳，不僅對於蘇聯在國外間諜網的詳情，以及他舉發間諜案驚險曲折的經過，都有敘述，並且還揭露了他所親身經歷的，蘇維埃鐵幕後面的種種秘密，統治階級的殘酷，官僚的腐化，以及人民生活的慘痛。

本書的故事，曾由美國二十世紀電影公司編爲電影，亦名『鐵幕』，與本書同樣得到各方面的好評與歡迎。

目 錄

一	『人民的敵人』	一
二	換得我自由的人質	二
三	初到莫斯科	三
四	蘇聯——勞動者的天堂？	四
五	學習與戀愛	五
六	入『幕』之初	六
七	德國兵快要打來了	七
八	紅 軍	八
九	『嫌疑者』的肅除	九
十	間 諜 中 心	十
十一	國 際 騙 局	十一
十二	德 國 俘 虜	十二
十三	安娜——我的妻	十三
十四	出 國 消 息	十四
十五	柴鮑丁與加拿大	十五
十六	人 事 糾 紛	十六

十七	第五縱隊	四六
十八	原子彈秘密	一五六
十九	當間諜的國會議員	一六三
二十	盜宗卷	一七〇

一『人民的敵人』

想像力煊染了我童年的記憶，我雖從未看見過她站在高岩之上，帶着鹽份的海風吹着她金黃的長髮辮，俯瞰波濤汹涌的海面而笑，但我對於波德金娜總有這樣的一個印象。

她是我平生第一個遇見而覺得比別人特別親切的女孩子，但與她之間總有一種敬仰與尊重的距離，直到有一天我們到莫斯科附近幼年先鋒營去的途中，我突然覺得有一隻手握住了我，我低頭下去，一看是波德金娜的手。我們都是十四歲，可是如今回想起來，好像她那時已經快要長成的樣子。

波德金娜活潑而愉快，細細的腰身，在運動及讀書方面很自然的高人一籌。即使在冬天，她的皮膚也是褐色的，常帶的微笑，露出了光潔雪白的牙齒。男同學們有時拉拉她的金黃辮子跟她開玩笑，波德金娜也有她的玩皮勁，兩腿更有足毅的速度，去追逐跟她開玩笑的人。我記得她的眼睛是藍色的，總帶一種慈和的光澤，似乎與她矯健的精神不相配合。可是在那一天，她眼眶中充滿了淚珠，使我詫異而同情，甚至掩蓋了她握住我手的驚人發現。

我們這一隊吵吵鬧鬧的幼年先鋒隊正在行進中，被阻止了。幼年先鋒隊等於英美的男女童子軍，另加政治方面的宣傳。我們排在隊伍的後面，看不見所以不能前進的原因。等了一會，漸漸看見有一群人從對面列隊慢慢而來。

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奇形怪狀的行列：污穢零亂，臉色如灰。衣服是一堆零亂的破布，脚上也紮了破布。其中有一個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臉似乎還年輕，但其餘的一切都顯得衰老。從麵粉袋上剪下的一塊布，包了頭，像印度頭巾似的保護着耳朵。鬍鬚散亂，鼻尖上一條大大的傷痕。胸膛緊陷，從破掛的窟窿裡看

得見他的肋骨。他給我的印象，使我聯想到怪異的稻草人，而有人類疲倦苦痛的可怕表情。他舉起血跡斑斑的手，對我們偷偷地揮了一揮。

「麵包！」他用特別沙啞的嗓音低聲說。

我不知不覺的伸手到小口袋裡找到一片，可是另外一個孩子比我先拿了出來。他遞給那可憐的人，他像狗似的吞下去了，其餘的夥伴都饑涎欲滴的看着他。

我們大家都爭相把剩餘的食物拿出來，我們的一位穿制服的女教練奔了過來。她腰間緊緊束着皮帶，使胸脯在卡噠制服裡特別鼓了出來，玳瑁邊的眼鏡，使她淺色的眼睛有似死魚眼珠。

「不准給他們麵包！」她緊張地嚷，「他們是人民的敵人！」

穿着政治保安隊——秘密警察——制服的其他押送人員都趕了過來，從那手染血污者的手裡搶去麵包。麵包落到地上，其中一位用腳踐入泥污。那可憐的人又給使勁一推，他倒了下去，一會兒自己爬起，回頭看地上那塊被踐爛的麵包。他的目光黯淡而深沉。

他舉起疲倦而病態的目光回頭看去，似乎在盤算是否還有餘剩的屑粒，值得冒險一試，這個表情，顯然使波德金挪動心。就在這一刹那，我覺得她的手握住了我，她哭了。

每當我回憶童年的時候，總是清清楚楚記起當時的那種特殊感覺。她握住我的手，而不去握其他較大孩子的手，使我有一種自豪之感。我知道我應當有所表示，有所動作，可是不知道怎樣的表示，怎樣的動作。

這一系列囚徒的最後守衛過去之後，我們都有不快之感。守衛欣然地向我們招手，我們都置之不理。我們剛才所見的一幕，其中一定有着罪惡，但我們覺得一定是對的。波德金挪匆匆用袖子擦乾了眼淚。我們教練之中，一位高大結實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高聲說：

「孩子們，讓我們唱歌！你們這些小鬼有什麼不開心啊！」

我們重又排好隊前進。零零落落發出歌聲。我也想加入歌唱，感覺到波德金娜在我的旁邊。零零落落的歌聲馬上也變成寂靜了。我們默默前進，想着自己的心事。這是我們第一次與犯人接觸，集中營的浮泛故事立刻變成現實了。我懷疑着那手染血污的青年人，他究竟犯了什麼罪。我懷疑別人有沒有看見波德金娜哭泣。她對人民的敵人，如此表現弱點，會受教師責罵嗎？我四週看看。但大家的臉都是陰沈的。全都呆呆看着前面。沒有人說話。也沒有大笑。祇有脚步声，打破了沈寂。

波德金娜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在若干年以後。我們已修畢先鋒隊的訓練而進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階段。第十班的青年團於那天下午四時召集緊急會議。

大家都到了。會場有一種特別嚴重的空氣，情形有點不平常。到會的人，僅限於持有青年團團員證的人。開會之前，我們有幾個人去問本班的團書記為何開會。他祇聳聳肩頭說道：

「我不知道——我祇是奉命召集而已。」

下午四點，三個人走進我們聚集的教室來。我認識其中的兩位。他們是本校的舊同學，畢業後進了軍官學校的初級班。一位是柴義金，穿了軍官學校的制服。他額骨高高，容光煥發，淺黃頭髮剪得很短，直立在幾乎是方形的腦壳上。他讀的是交通科。還有一位是包搭潑夫，也穿制服，沒有柴義金神氣。矮矮胖胖，臉上有個小小的向天鼻子，他在軍校讀的是機械科。二人都是出名的青年團員。第三個人，中型身材，臉上一付暴戾的神情，我們大家都不認識他。

青年團執委會的主席，一位長鼻子的瘦學生，跟那陌生人說了幾句話，就站起說道：

「今天的會議有一個問題。這位格洛木夫同志，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負責組織工作的人，現在向各位說

話。」

那陌生人鞠了一躬，走到講臺的前面。在開口以前，向大家瞋目而視，足有十五秒鐘。他的肩膀寬而高，幾乎看不見他的頸子。細細的眉毛連成一線。把大大的拳頭插在口袋裡，深深呼吸了一下，開口道：

『青年團同志們！』他的音調沈重而帶恫嚇性。『今天的會議是奉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召開的。要我們討論一個問題：青年團團員波德金娜的問題。』

我的心跳了一下。我沒有聽錯嗎？波德金娜？大家都回過頭去。我也跟隨着大家的目光，恐懼着我將看見的景象。

波德金娜縮在她的座位上。臉色白如石灰，驚恐的目光從講臺上的格洛木夫再移向我們。

我們原先有所期待，但決不是期待這個局面。當天上午波德金娜還為明天下午組織了一個運動會。她特別優待我，派我做男子排球賽的公證人。她非常美麗。即使穿着簡單而鬆鬆地掛在她身上，毫無式樣的灰色衣服，也覺得非常美麗。目光永遠愉快而帶笑容，莊嚴而決不是纖弱。他充滿着活潑愉快的精神，使人人都有好感。

『波德金娜！』主席以令人驚恐的嚴厲之聲嚷：『立刻到講臺上來！』

她喪魂落魄地慢慢站起來，走到桌邊，看着格洛木夫。

格洛木夫看都沒有看她。但向大家說道：

『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認為波德金娜必須開除團籍，有一個人民的敵人，跟她住在一個屋子裡，她不加舉發，她已失去了政治警覺性，她對於青年團已是毫無作用的了……』他像演戲似的停了一停，接着又道：『她不能舉發那個敵人並非偶然，或許她跟她父親有同樣的思想，……』接着提高喉嚨道：『她的父親因為是人民』

的敵人，現在已給政治保安隊逮捕了。」

波德金娜，臉色慘白，看看我們，好像要從我們臉上找尋什麼似的。我怕她看我，怕她做出要求我同情的姿態。

她的父親，大家都知道在「發電機廠」當財務長，這廠在莫斯科的普洛列泰斯基區，是蘇聯最大的電機廠。因為父親的地位，波德金娜可以得到特別的配給。我們尤其注意到她的鞋，常常比同學們好些。

格洛木夫同志的聲音，變成怒吼了。

「她的父親在發電機廠裡陰謀組織托洛忒基布卡林集團而被捕了。」

他的語音高到發尖。接着的寂靜祇聽見蒼蠅在窗子上嗡嗡亂飛。我們坐着一動不動，看着波德金娜。她突然開口，聲音極低，但全場都聽得見。

「我是勞工階級的家庭裡生長的。」她說。

格洛木夫對她假笑。

「是的，」她重複着說，此刻是有些粗暴的樣子，「勞工階級的家庭裡。」

「你還是告訴我們，平常你與父親談些什麼，你的政治觀念怎麼樣，廢話少說！」

波德金娜稍有些歇斯底理的神情：「我與父親的觀念不同。」

「啊哈！」格洛木夫勝利地嘆。『那末你老早知道他是托洛忒基派了！那末爲什麼不報告主管機關呢？你爲什麼不舉發敵人？噉？』他得意地看看大家。

「你並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波德金娜緊張地說，「你說他爲了托派思想而被捕，我並沒有托派思想。我也不知道父親會有這種思想。他從未與我們討論過。他從來沒有……」

「你越發糊塗了，我的波德金娜，」格洛木夫帶着猙獰笑岔着說。「你先說你與父親的思想不同，接着又說你父親沒有這種思想。我們並沒有請你來替你父親辯護，他無需別人替他辯護。」

波德金娜再想開口，但格洛木夫揮手止住她。

「我覺得波德金娜的話，我們已經聽厭了，」他說，「她沒有什麼新消息告訴我們了。現在請各位青年團同志們告訴我們波德金娜究竟是怎樣的人。」

我們都默着。無人敢開口，都呆了。大家都喜歡波德金娜，活潑有生氣，讀書聰明，顯然是忠實的愛國者。說她有反動思想，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後來，她的一位好友，名叫徐寧娜的姑娘站了起來。她瘦而長，黑色的短髮，梳得像男孩那樣，有大大的下頷。

「我認識波德金娜很久了，」她說，「永遠佩服她是一個成功的學生。她常常是活動的青年團員。我不明白爲什麼要開革她的團籍，唯一原因，爲了她父親被捕了。這似乎不公平，她是個愛國的青年，得到全班同學的尊敬。我斷定別的同學，一定與我意見相同……」

「你說你的，」格洛木夫岔着說，「不必拉扯別人。」

徐寧娜有她的氣魄。「我認爲沒有開除波德金娜的必要。她是個優秀青年團員，且將成爲優秀的黨員。」從屋子別的角度發出了一陣響應之聲：「波德金娜是好團員！」「她常常是優秀份子！」「她父親的罪過，與她無涉。」

格洛木夫的脸，憤怒得發青。他轉臉對着柴義金，他有點擔心的樣子。柴義金站了起來：

「青年團同志們！我瞧你們，我懷疑你們究竟是真正的青年團員，還是無知的笨蛋。這牽涉到紀律問題，你們的行爲令人所不齒。你們，她是優良團員嗎？好學生嗎？敵人往往戴着優秀份子的面具滲透到我們中

間來。」

他指着波德金娜。

「我告訴你們。這女孩是敵人。敵人愈能偽裝，愈有作破壞工作的機會。你們的政治警覺性在那裡？青年團員的銳利目光又在那裡？」柴義金清了清嗓子，用譏諷的語氣接着說道：

「你們在今夏以後，配做受更高教育的青年團員嗎？這樣幼稚無知，你們有什麼用處？徐寧娜贊美她的朋友。此刻是青年團員討論正經問題，還是朋友給朋友捧場呢？徐寧娜還想進交通學院嗎？我老實告訴你，在交通學院這種見解是不行的。我相信波德金娜知道她父親是陰謀者，可是爲他掩飾。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有双重的罪過。你們必須堅決地說：青年團裡沒有波德金娜存在的餘地，她必須開除！」

全班寂靜。坐在我旁邊的泰倫托夫站了起來。我很興奮。因爲泰倫托夫是男孩中的首領。又是雄健的運動員。我常常看見他偷遞字條子給波德金娜，她也往往報之以微笑。

「青年團同志們！」他說。「我們的行爲，有如無知的小孩子。我比你們略略年長，有權向你們發言。黨正和人民的敵人作無情的鬭爭，而我們却在贊美波德金娜，她不願舉發敵人。她對祖國犯了隱匿敵人的罪。我認爲應當把波德金娜開除，人人都應當支持我。」

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原希望這位班中的男生領袖，替波德金娜辯護。我甚至以爲她是他的女友。我默默地從泰倫托夫看到柴義金，瞧見柴義金微笑點頭。然後我想到泰倫托夫想進史太林機械化學院。於是什麼都明白了。

波德金娜軟癱在椅子裡。低頭看着自己的脚。我忽然想發言，但說些什麼呢？此外，這對於我的前途有利嗎？

格洛木夫又站了起來。

『讓我們付之表決！』他急迫地發令。『贊成開除波德金娜的人，舉手！』

人人舉手，連徐寧娜都舉手了。我從她的臉上知道剛才被威脅着不准她進交通學院，使她大大的恐慌了。

格洛木夫慢慢看看大家。『一致決定。我現在命令波德金娜交還團員證，立刻離開會場。』

波德金娜慢慢離開椅子，走到講臺邊。肩膀微微彎着。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突然想起了那天在莫斯科附近途中的情形。

那天她哭了，爲了人民的敵人而哭泣！我又另外轉到一個可怕的念頭。當時有人看見她握了我的手，並且跟我說話嗎？有人會指責我同情於她嗎？我覺得喉嚨發乾，自己知道出着汗。我不敢揩拭，恐怕被人注意而加以推想。例如泰倫托夫即爲一例。

波德金娜很困難地從一疊紙張中找出團員證來。手發抖，像秋風裡的樹葉。柴義金粗暴地伸手拿了過去，丟在桌上。

波德金娜轉臉向門口走去。快到門口的時候，她像逃去似的加緊了脚步。門在她的後面重又關上了。

我們散會的時候，誰都不看誰。我不能想像，我們怎能再與波德金娜同室上課。我們是朋友。倘使她跟我說話，我怎麼樣呢？我知道大家都有這種憂恐，但誰都不敢提出這個問題來。

那天在我們回家之前，還有課程，我們發現波德金娜獨自坐在教室裡。我們進去的時候，她一驚，似乎她忘記還有課程，所以獨自藏匿在那裡。

誰也不坐在她的旁邊。連徐寧娜都坐得遠遠的。教師來得稍遲，她看見波德金娜時，立刻停了步。教師

繚着眉頭，她說在開講功課之前，先要談談凡遇可疑的人，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必須舉發的道理。

她是個瘦瘦的中年婦人，黃髮碧眼。盤起的辮子遮蓋着耳朵。她穿着洗舊的短外掛，一條舊帶子，長衫上有看得見的補釘，平常她的語音是很柔和的，此刻似乎故意想把聲音做得剛硬，很奇怪地尖厲刺耳。

教師對於那些舉發父母叛逆而使父母流放到西伯利亞或吃槍彈的孩子大加贊美。她窄窄的嘴唇翹了起來，眉毛飛揚，眼睛裡充滿着熱烈之光，她稱贊這種孩子是國家的英雄，最高度愛國熱忱的具體表徵。她說到莫洛曹夫故事的時候，尤其顯得興奮，莫洛曹夫這孩子的家庭，因他的報告，全都處了死刑，莫洛曹夫被尊重為有益國家的偉大英雄，曾為他造了一座紀念碑。

『我姐姐有位女朋友，這位女朋友的故事，值得你們的深思。』教師說。『她跟一個男人結了婚，生活得很愉快，後來那男人被宣布是人民的敵人。她哭嗎，她像弱者那樣為她丈夫乞憐嗎？她忘記她的責任，第一個責任嗎？不！她宣布跟那男人離婚，在黨開會的時候，她發表演說棄絕丈夫。她還有勇氣懺悔嫁給此人的愚蠢。現在那女朋友重又結婚，她公而忘私的精神受到社會的尊敬。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了，大家記在心裡。』

下課的時候，我偷瞧波德金娜的座位，她已走了。

在校外，我聽見泰倫托夫跟幾位同學在笑着，他們屢次，談到波德金娜的名字，我十分忿怒。

我獨自回家。天還沒有黑，陽光甚好，氣候也很暖和，可是我總覺得那天特別的陰沉。母親正在我們的小油爐上做晚飯的湯。她密切注視了我一下，問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說我沒有病，跟姐姐伊拉和哥哥維斯伏洛一同坐在桌子邊。

伊拉問我波德金娜是不是真給青年團開除了。

『是的。』我說。

母親給我們一碗稀薄的湯和一片黑麵包時，大家都靜靜無聲。

母親一面吃飯，一面告訴我們，她很爲奧爾珈擔心。奧爾珈是鄰居的女兒，嫁了一位姓金的韓國人。三星期前政治保安局把金喊去，一去之後就毫無消息。

奧爾珈屢次到政治保安局去打聽她丈夫，他們祇說他的案子正在偵查，他快要釋放了。兩天以前她又去看那個常去見他的官員，那官員祇是說道：

『金？什麼姓金的？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姓金的人。』

奧爾珈昏厥了。她已懷孕數月，憂慮增加了她的神經衰弱。候客室裡其他的婦女救她甦醒，但不能送她回家。她在路邊生產了，在她到家以前，母親扶着她在我家躺了一會。

『這是恥辱，這可憐的女人！』母親說，眼睛裡充滿着無限的悲哀。『她現在轉着自殺的念頭。不願她跟孩子這樣活下去了。這是恥辱，我告訴你們！革命之前，這樣殘酷地對待人民是沒有的……』

如今回想起來，經過了那麼悠長的歲月，我仍舊清清楚楚地一切如在目前，自己宛如電影銀幕上所照出來的一個角色。連屋角裡那個破水盆都記得清清楚楚，桌上的湯碗以及旁邊的麵包，哥哥停着羹匙慢慢地看着我，母親苦痛的表情，姐姐呆呆的視線。

我記得我忿然地站在那裡。我聽見我吐出的語音，好像從別人嘴裡說出來的那樣。

『不談，不談！我以青年團團員的資格命令你們！波德金娜或許是個弱者，但我決不是！』

這一幕慘痛的記憶，或許比什麼都強烈，後來影響我於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五日的夜裡，在渥太華的蘇聯大使館，採取了一個極大的決策。

一一 換得我自由的人質

我母親極少仍在人間的可能性。縱使她會渡過艱難的戰時，蘇維埃政府爲了我暴露了加拿大間諜網的「罪狀」，也決不會不以母親爲報復對象的。

父親已經過世，這是我知道的。哥哥維斯伏洛，在德軍進攻俄國之初，就犧牲了。我最後所聽到的消息，姐姐伊拉是在做建築繪圖的工作。我每想到她必然因我而連累受苦，心中尤其覺得悽慘，她一定像波德金娜那樣爲社會所棄，也許受苦的情形更加厲害。

在審問間諜案之前，我曾與加拿大的偵查人員有過多次談話，其中有一位曾經對我搖搖頭，說道：

「伊各，你是個有膽量的人，但同時你也是心腸最硬的人。倘使你母親還在世，你此舉等於使她送命。你也知道這會毀你姐姐的前途。你哥哥萬一還沒有死，那末他也得遭殃。可是你却這樣做了。」

硬心腸嗎？

「你當然會有這種看法，」我回答他，「可是你的立論是從生長在自由國家的觀點出發的。我的決策固冒極大危險，請相信我，然而這是衝破蘇維埃「人質圈套」的唯一辦法，蘇聯用人質的方法，牽牢了每一個派往國外使領人員的鼻子，尤其是父母，強迫着留在國內作爲非正式的人質。總要有人來衝破這個圈套，讓我來作犧牲者，希望我倘使能衝過這個圈套，爲了新俄國的最後勝利，別人也能冒險一試。」

此外還有一個考慮。母親一天一天老了，今日的俄國是不允許老年人存在的。我到加拿大來第一個詭異印象是看見許多老年人，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愉快。蘇維埃制度，就讓他們活活餓死，這纔真是硬心腸了。

我還可以說得詳細一點。

蘇維埃當局的態度是公然冷酷的，絲毫不帶一點感情的成份，對於年齡日高，體力日衰，或是認為對國家不再有用的人，就以『要他們幹什麼』的問題來判斷他們。處置這般無用人口的方法極為簡單：年齡越大配給越少！

老病而成爲『多餘人口』的人，俄文名之爲『立希納滋』。當我是個熱心的年青共產黨員的時候，從未覺得這『立希納滋』制度有什麼奇怪。現在想起來，真令人心悸。當時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當我在青年團時代，我們會屢次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的結論是：一個人變了『立希納滋』，就應當受這種淘汰待遇，應當自殺以減輕國家對於這種無用消費者的負擔。這種觀念，全國都受到鼓勵，甚至到今天，俄國的自殺率比任何世界上國家爲多。

我們對此有一個開玩笑的術語。我記得有一天，走進史太林機械學院的時候，有一位同學批評那看門老頭子麥斯洛夫斯基，他說道：

『麥斯洛夫斯基一天瘦一天，臉色一天白一天，他們在把他送回椰子樹上去了。』

這術語當然是從進化論而來的，進化論說我們人類是從樹上的猴子演化而來。把人送回樹上，意思是說把他送回『老家』，我們在家裡討論這個問題，我祇記得有一次，哥哥談到鄰居的一位老頭子，他消費着家中別人的配給而苟延殘喘。母親忿忿地說：

『一個人有了力量，纔不會失去尊嚴。』

母親身體短小，心靈敏捷，和靄而有耐心，她是大大受人愛戴的教師。但是，這可憐的婦人，一生無窮無盡的爲家務操勞，而境遇之惡劣，更甚於西方人所謂的『貧窮困乏』。

我出生於羅加却甫村，離莫斯科不遠。正是一九一九年，災荒而農村極度不安的年頭。歷史上著名的羅

加却甫村反蘇維埃農民暴動，正發生在我出世以前母親臥床待產的那個星期。

目前學校裡的教科書稱之爲『富農叛亂』，母親常常說，那是夢魘似的記憶。她從床上聽見槍聲，聽到殘酷的咒詛，夾雜着婦女歇斯底里的尖叫，雜亂的腳聲，鏗鏘的刀劍之聲，受傷者的呻吟。

『在那可怕的夜晚，』她告訴我們，『我看着窗子上反射起火燒的紅光，心中就想，不知道那一家又遭殃了。』

有一次，她聽見外面的聲響特別嘈亂，掙身起來靠到窗口，從一邊伸出頭去，可以望見廣場的一角。一隊腰間掛着刀子的騎兵，押送着一群農民往廣場而去。她清清楚楚聽到跟在隊伍後面的，那些婦人孩子的哭聲。後來她聽到，紅騎兵在教堂前面把這些農民砍成碎塊。母親以蹣跚的步子走回床上，心中想：

『一個新生命要誕生了。我們給他準備的是怎樣一個世界啊？』

我出世的那晚，母親說，父親從內戰的前線歸來，有三天假期。父親是瘦長幹子。暗沈的目光，因內戰的景象而更見憂鬱。他潮濕的大衣上，散發着廉價烟草的氣味。他的軍帽上有顆紅星。他擁抱着母親，說道：

『果真是個男孩嗎？』

我是母親第四個孩子。第三個生於一九一七年，一年後因營養不足死去了，他的名字叫伊各。爲了紀念他，我也取了伊各的名字。

父親坐在床邊，談着前線的情形。

『情勢很嚴重。白軍包圍了彼德格勒，人民挨着餓。莫斯科的情形也同樣不好。』

母親也把村中農民起事的情形告訴他，她說槍殺無抵抗的人，任何藉口都不能掩飾這種罪過。

「這也許難免，」父親停了一停說，「但革命的目標原則上是不錯的。」

父親結束短短的假期之後，又重回前線。這是母親跟他最後一次的相見，他也像無數其他的俄國人那樣，給俄國歷史上這個瘋狂階段所吞噬了。數年之後，完全出於偶然，母親遇見曾與父親同在一個軍隊醫院的人。她急急問父親的消息，那人嘆了一口氣：

「你丈夫死了——患的傷寒。」

在我出生以前，如果母親把生命看得很重的，那末那時看得更重了。她常常告訴我，那時她問到親友鄰居們的男人的時候，往往得到的總是同樣的回答：

「參加叛亂而被槍斃了。」

當時因為男人的死亡，造成勞力缺乏，而有糧食空前大恐慌的結果。需要最多的胡蘿蔔也沒有了。我們全家生活在鄉村裡已成不可能的了，鑒於她第二個孩子因饑餓而死，母親決定把我送到外祖母家去。外祖母所居的塞姆茲村生活雖未必繁榮，她有她自己的房屋與土地。土地是她存亡的生命線。她接受了我。

外祖母歐卡德利娜·安德列夫娜·費古伐是個典型的俄國婦女。她生過十六個孩子，因為喜歡小孩，她很高興地收留了我。

我住在外祖母家裡七年，留下很多愉快的記憶。她平常戴着黑色頭巾，到禮拜天就換白色的。每晚我瞧見她跪在神龕之前，神龕掛在屋子的一角，下面永遠點着油燈。我常常看她劃着十字，一直跪拜到腦袋着地。有一次，我告訴她，曾有同伴問我，外祖母是否強迫我祈禱。

外祖母吃了一驚。『你怎麼回答的呢？』

『我說你不會強迫我祈禱。』

「對啊，」她顯然鬆了一口氣。「這不關他們什麼事。」

冬天，因為沒有鞋子或雪靴，我祇能就在家裡。但到了夏天，我跟別的孩子們，從天明到天黑常常在外面玩，河邊街上無所不到，玩着名叫「巴白基」的遊戲。在收割的季節，我們到田裡去，爭着騎馬趕車。

外祖母的心胸很寬大，但同時也很嚴厲。我不聽話的時候，她用樹枝打我，她常常說道：

「打一回比不打兩回更有價值。」

有時，她拍拍我的頭表示應許我一件什麼事情，我奇怪她那一生操勞，胼胝滿掌的雙手，爲什麼拍到我頭上，竟如此的輕柔。我至今回想到那些冬天的下午，坐在她旁邊，看她做菜或烘麵包，仍有欣快之感。她不斷地告訴我許多小故事，她的家庭，以及她童年的回憶。她說話的時候，引用着無窮的格言，諺語和詩句。黃昏，她蓋着一件舊的羊毛褂子躺在坑上，把我擁在懷裡，講給我聽許多的童話和民間傳說。

她常常談到布歇維克黨執政以前，她所享受的好日子。

「那時我們鄉下人生活得很容易，」她說。「那時沒有丘八太爺到村莊裡來隨心所欲的把我們的東西拿去。如今年青小夥子們都夢想到城裡去。怎樣叫他們愛這生產很少，連很少的出產還要給人拿去的農村呢？」

「革命是怎樣到來的呢？」我有一回問她。

「從城裡來了陌生人。他們自稱爲布歇維克，以激烈的演說攻擊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他們答應大家平等博愛，土地爲農民所有。他們又說，我們應當供給戰士麵包以報答他們。」

「農民們表面上贊許這種好主義，可是私下裡却不敢完全相信。他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去。可是布歇維克們對於農民的冷淡態度，自有他們一套處置的辦法。村莊裡來了一批新人，他們不大開口，這是紅軍的給養部隊。」

「他們的手槍，使誰都不敢作聲，同時很快的把糧食拿到了。教堂的牆壁上貼了標語。他們呼吸之間即可判定一個人的生死。不論你信仰革命也罷，不信仰也罷，可是誰都要供獻糧食或是去打仗。」

在她明白情勢以前，外祖父給拖入野蠻的內戰中去了。他給放在一輛車子上送回家來。身底下鋪着稻草，染滿血污。車子停留的地方，血透過稻草和車板，在路上滴成一個小潭。

「他像一隻受傷的小鳥似的死在臂膀上」，祖母悲哀地說，「並沒有不斷的喊我名字。」

她出賣了大部分的土地，但永遠不願離開那剩下的田產，她的孩子都已遷居到頓河旁的羅斯托夫去，不斷想接她前往。她總是回答說，她要死在外祖父所死的地方。

我覺得關於外祖母，我寫得太多，超出了我的原定計劃。然而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老太婆。回憶起來，我從她身上看到了舊時代的俄國，它有千百年的歷史，給蘇維埃制度所粉碎所破壞。外祖母使我知道舊俄也一樣的有人情，一樣的可愛，比起我現在所居的加拿大來，也同樣的有其幸福。

我深深地記得外祖母告訴我的一句格言，鄉村裡的人們對這句格言，永遠慈和地笑着：

「不要反對惡魔。」

我常常覺得遺憾，那時太年輕，不能深刻地體味她哲學後面所包含的真理。其中那溫存而慈愛的性質，對於野蠻日子裡的嗜血者們。是絕對扞格不入的。

外祖母屋子的外面，有個小小的院子，大門之外，一片廣遠的草原。直到地平線，可以望見一行藍色的樹林影子。小溪沿着後院的邊界流去，隔溪有牛群在吃草。

還有一個小小的果樹園，為外祖母所種植。外祖母對它最所鍾愛。每月一次，當天氣晴朗的時候，她請村莊裡的學究代寫書信給兒女們，由她自己口授。外祖母很聰明，但不能寫字。她信的詞句常有天然的韻律

，她稱她的兒女們爲『沒有母親雨露的野花』。我聽她嘴裡在唸，覺得她的兒女，確像溪邊斜坡上綠草中的野花一樣。

夏天，她帶我到村中的教堂去。清潔的氣息，肅靜的環境，並不像村莊裡別的屋子那樣污穢與擁擠，令人起神奇之感。教堂旁邊的墓園，樹木蔭深，夏天也覺清涼。我常常跟外祖母坐着仰視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圖像，心中奇怪着爲什麼會有這種遭際。接着，跟別的赤腳孩子們一同溜到外面，在綠油油的草地上玩耍去了。

當我後來做了青年共產主義聯合會會員的時候，童年這教堂的記憶，使我很爲難，因爲我們必須棄絕任何宗教的思想或行式。黨蔑視宗教，但似乎與我幼年的愉快記憶，總是無法調和。我故意竭力排斥那種記憶，信仰官方斥宗教爲『人民麻醉劑』的主張。可是我總沒有法子養成像教師所表現的那樣，對宗教抱着痛心疾首的敵意。過了許多歲月，我很奇怪地發現自己，在這裡加拿大，我給孩子們選擇讓他們去信奉的宗教。

有一天，發生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意外插曲。母親帶着伊拉維斯伏洛意外地來訪問我們。一個人有時回憶過去的景象，竟會記得那樣清楚，不是很奇怪嗎？我至今記得母親那天臉色的愉快和美麗，把一只手提箱放在木長椅上之後，回頭看着我。她的服裝，與一般鄉下人完全不同，那樣的好看，我呆呆瞧着她。我覺得她是我所看見的最美麗的人物，她伸手拉我，羞澀反而使我退後了一步，她說道：

『啊外祖母把你養得真不錯，伊各！你面色紅潤，強壯得像個大人……』她停了一停，細細端詳我的臉，『……你眼睛怎麼攪的？』

外祖母放聲大笑。『一塊小小的傷痕，他所謂他小朋友給他的紀念品。不要以爲他常常帶着這種招牌的。』

接着是一連串的擁抱與接吻。我哥哥穿着短裝，甚至有襯衫和領帶，在他旁邊，我簡直像鄉巴老那樣的有些窘相。尤其是領帶，使別的孩子注目。很少人瞧見過孩子有領帶的。伊拉穿着藍色衣服，背上打了一個大結。她急速地吻我兩頰，兩人站在那裡，不知道從那裡說起話來。接着她問我，要不要聽她唸一首她所學的詩歌給我聽。話說起了頭，就笑聲不斷了。我對於我的家屬，很覺自豪，尤其我發現我玩耍的伴侶們很羨慕地隔着窗子在瞧着。

晚飯時母親對外祖母說：

『現在已到考慮伊各教育問題的時候了。我想，我此次想把他帶回去。我還想使這孩子和羅斯托夫那裡族中別的人們見面。』

外祖母隔着桌子看着我點頭。『帶他去吧，這小鬼。在這鄉村裡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

矛盾的情緒，使我忘記了吃飯。離開外祖母使我傷心，可是想到了到別處旅行，和母親，伊拉，維斯伏洛一起生活，又有無限的希望。

在羅斯托夫城忽忽的就擱，給我以很多的新奇經驗。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大城市。遇見許許多多的叔叔嬸嬸，堂兄弟堂姊妹也令人常常覺得高興。這大家庭就是健全的俄國的表徵，也就是一個永不會讓它腐蝕的強盛俄國。可是，我對這家庭還不會有更清楚的認識以前，母親奉命要往伏克倫。史巴斯高義鎮去教書了。

爲了答復我關於我們要去的地方的好奇問題，母親翻開地圖來，指着上面的一個黑點。

『這就是伏克倫，史巴斯高義，孩子。這在中央黑土區。你在那裡可以放量吃蘋果，那是有益健康的。你還有機會看到新鮮的集體農場，究竟是什麼回事。我就是奉命去教那些集體農場的孩子們。』

這對於我，那時當然不會感覺到太大的意義，可是我幼稚的好奇心却給喚起了。變換新環境的興趣之外

，還可以見識一種新的試驗，這種試驗我聽別人談得很多，而且有人談起這件事情來，有時很詫異地帶着鬼祟祟的神態。母親的態度似乎很奇怪，她好像沒有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告訴我。

我們到達伏克倫，史巴斯高義已是黃昏時候。母親的房間就在學校裡，那是一座革命前的紅磚舊建築。母親弄了些牛奶來，我們喝了。然後我們一同出去，坐在學校前面的一隻木長椅上。遠遠傳來了女孩們的歌聲，很覺悅耳。別的一位教師走來跟母親談話。告訴母親這區域裡十幾個村莊的農民子弟都來這裡讀書。這學校就叫『集體農場子弟學校』。

伏克倫，史巴斯高義鎮爲這一區域的中心，有數千人口。設立了三個集體農場。

母親一定發現我渴睡了。她向那教師告別，把我送上床去。當我漸漸入夢的時候，我想這是世界上最有興趣的地方。我可以聽見歌聲。現在是男女合唱，使我神往。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農場。路上有一個人招呼我坐他的車子，那是一輛半遮蓋的車子，由一只瘦馬拉著，馬尾巴是光禿禿的。我看到別的馬，也把尾巴剪掉了，我就問那趕車的，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因爲我知道馬蠅是很厲害的。

『爲什麼緣故？』他也學着我說。『天曉得。他們說馬鬃賣給外國可以換機器。我不曉得第二步又要我們什麼東西了——也許是我們自己腦袋上的頭髮？也許是我們嘴上的鬍子，織成了美麗的地氈，跟外國人去換機器吧？』

他突然駭異地俯首看看我。

『你多大年紀了？我告訴你，我剛才並不是說什麼不滿意的話。你明白嗎？我從來不說不滿意的話。記住。然而一個人總是要說說玩玩的，可不是嗎？』

我點點頭，不明白他爲什麼要跟我談到這一點。接着我又問他馬爲什麼都瘦成這個樣子。隻隻都看得見肋骨。他說燕麥沒有了。已經完全吃光。

突然後面來了一輛飛速的三馬馬車，趕過了我們，灰塵四起。趕車的是臉部寬潤的中年人，嚷着道：

『快快回到鎖上去！特別法官來查案了。』

我們那個趕車人，急忙拉轉馬頭趕回鎖上去，他臉色的慌張，真使我有些莫名其妙。人們一簇一簇的聚集在那裡，都緊張地談着特別法官。我記得我當時也有一種盲目的恐懼，不明白那恐怖人物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急忙趕回去問母親。她用心聽我報告，一面關上了門。

『你還是不要出去吧。』她說。

那晚，我躺在床上，假裝睡着，我聽見母親跟另外一位教師低聲說話。談的是一個名叫伊凡尼古的農民，他負責管理六隻屬於集體農場的牛。其中一隻死掉了，伊凡尼古被控故意殺了那隻牛，把肉吃掉了。據他本人說，那牛是病死的，但特別法官說他玩的詭計，他在夜間把牛的屍體掘出來，把肉分給家人吃了。

消息傳出，伊凡尼古給拘押了起來，所以田地私產一律沒收。一星期之內，他和他的家屬給放逐到北邊，名叫鐵伏爾的一個地方去。從母親那位同事不敢高聲談論的神情看來，一定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故。

她們之不敢高聲談話，另外還涉及一個問題。那是關於鎖上一個公務員的，那人的名字，我沒有聽清楚。他要求辭職回到自己的田園去。母親問，這有什麼不對呢。她同伴說道：

『你還不知道呢！凡是集體農場的公職人員要求辭職，往往解釋爲不滿意集體制度。不論你幹得了幹不了，總是以幹下去爲上策。』

母親又問：『那人後來怎樣了呢？』

沈默了一會，『他給送到了遠處去。誰也不會再聽到他的消息了。』

『他的家屬呢？』

『或許跟他一同去。或許隔幾時再送去，或許永遠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

X

X

X

X

我的教育繼續了下去。我漸漸地對於這種集體農場的主席凡雪里，彼德洛微支發生了敬服之感。他把集體制度解釋得非常清楚，我開始懷疑母親的觀念，或許受了革命時期別種經驗的影響。凡雪里強調青年的重要。青年代表俄國，而集體制度可使俄國偉大。

勸募蘇維埃公債的任務，分派了我們這些青年。我們分成許多組，每組負責一個地段，約十餘戶。我第一次被派工作，很覺興奮，得意地告訴母親。她沒有說什麼，祇是用怪異的目光看了我一看。

我們所訪問的第一家，大門開着。我們一組的首領彼脫雅走了進去，大家跟着。一隻小牛躺在角屋的草堆裡，一種霉腐的臭味充滿在屋子裡，一隻狗從我們的腿中間竄向門口去。我低頭一看，我發現我站在一堆糞污之中，我幾乎嘔吐，好容易忍住了。

祇有一扇小窗有光線進來，我站了一回，眼睛才能適應屋子裡的陰暗。一個孩子坐在桌邊，面前放着一隻碗。草堆附近站着一位年約三十的婦人。另一屋角裡還有一個人影子：神龕之下，坐着一個很老的老頭子，瞧着我們。他那毫無光采的眼睛。驚恐而慘白的面容，一定使彼脫雅有些駭異。彼脫雅開口的時候，語言有些震抖：

『你們能認購多少公債？』

沒有回音。老頭子祇是呆呆看着。那女人微微動彈，低下頭去。孩子看着自己的碗，又看看我們，看看

老頭子，目光終又歸縮到碗裡去。老頭子一言不發。

這是一幕可怕的經驗，至今深刻地留在我記憶之中。我清晰地記得，我們闖進這家庭，裡面的人誰也不會有詫異的表示，我記得當時的沈默，以呆呆的一言不發來回答彼脫雅的詢問。好像一屋子都是死人，彼脫雅轉背就走，我們也跟踉蹌蹌的走了出來。

我們接着又訪問了三家。情形都差不多。一個婦女向我們解釋她沒有錢認購，我們聽不清楚她如泣如訴的語音。我們決定等她丈夫在家時再來。第二家，一個男子獨自躺在床上破舊的被褥裡。女人和孩子到田裡去了。他在生病。空氣裡充滿臭味，我們不等他解釋完畢就出來了。

在隣近一家的門口，我的胃中作嘔。靠着牆壁不能再進去。彼脫雅進去之後，立刻出來。他似乎也受不了。

『我報告凡雪里，彼德洛微支說我們一無所得，那真太慚愧了，但有什麼法子呢？簡直一點都勸募不到！』

彼脫雅向他報告的時候，凡雪里勃然大怒。

『他們都是騙子，無恥的騙子！』他嚷着說。『你們必須以嚴厲手段去對付他們。』

那天下午，我看見所謂嚴厲手段是什麼一回事，我聽見一個婦人慘痛呼叫。幾個年齡較大的孩子從她家裡拿出一袋麥子，那婦人則死勁想奪回去。一個孩子把她一把推開，麥子口袋就給丟上一輛車子。車上早有幾袋堆在那裡了。那婦人頭髮散亂，哭着訴說她丈夫革命時代曾在紅軍中打過仗，她有孩子要養活。但那車子已揚長而去了。

兩天之後，凡雪里宣布，學生募捐就此結束，因為他推行了更有效的辦法。集體農場每一會員都派認若

干，扣除他們兩三星期的工資。

到秋天，農民的死亡數字開始大大的增加。因為母親是教師而我是學生，我們的配給比起一般鄰居來，仍舊豐富些。朋友和熟識者的死亡，差不多成了不足為奇的現象。

有一晚母親特別的憤慨，對街一個婦人快要死了。她說道：『我要去看你們的朋友凡雪里，彼德洛微支！』

心理上有點恐懼，但同時對母親的信任心又給我以鼓勵，我遠遠地跟着她。她一直往凡雪里的辦公處去。他不在。母親命我引路，到凡雪里的家裡去。我遵命而行。母親敲門。凡雪里的太太，一個結實強健的婦人，給我們開了門。簡單談了數語後，她把母親帶到裡面，我也跟着。

凡雪里從一個房間走出來，那或許是餐室。有猪肉的香味，自從我離開外祖母後，好久沒有吃到了。凡雪里用手背抹去了嘴唇上的油，跟母親在過道裡說話。

當時母親說的話，我已記不清楚了。凡雪里宏亮的嗓音，把我從猪肉的幻想中喚了回來。

『不必擔心！』他露出參差不齊的黃黃牙齒微笑。『他們會活下去的。縱使活不下去，也沒有什麼關係。』接着的一幕景象，真使我萬分的驚駭。母親的手臂忽然一動，狠狠的一掌，恰好打在凡雪里的嘴巴上。他退了一步，臉色在驚訝之外，又加忿怒。他的太太向母親破口大罵，張臂抱住我母親：『你這個娼婦。滾出去，死娼婦！凡雪里，打她！』

凡雪里咬着牙對他老婆說道：

『你走開！』接着轉臉對了母親，眼睛裡露出了冷酷的威脅表情，一字一字的說：『趁你還能動彈的時候給我走出去。你等着瞧吧！』

這恐嚇是不假的。母親臉色發白。她拉了我，呆呆走到街上。外面有三個奇怪的孩子在注意我們。我們跨出門，他們就假裝在玩耍，我知道不是那回事。

母親跟我默無一言，走回家裡。

走進房間，母親慢慢拿下圍巾，掛在鉤子上。她點了燈，沈重地坐在桌邊。接着聽到她啜泣之聲，頭靠在手臂上。又隔了一回，我看見她寫字。第二天早上，她告訴我投函莫斯科請求調職。她所說的調職理由，以及她原是一位優秀教師的事實，救了她——和我——後來總算沒有受到悲慘的遭遇。

接着的若干時日，環境給我們的緊張感覺，使母親無暇想到她的憂慮。村莊裡已不再有歌聲。也沒有東西可吃了。一半的學生已經離去，他們的父母，在此地完全絕食以前都送了他們到別處去。

狗立刻給吃完了。馬都饑餓而死。祇有凡雪里，他的家屬以及集體農場的委員們，仍舊什麼都有得吃。祇有他們的烟鹵在冒煙。有一個孩子因事到他家去，看見坐着一桌人，桌上有烤蘋果和一瓶酒。

特別法官又來了。凡是走得動的人都給召去開會。

「在這中央黑土區的歷史上，」他嚷着說，「人們從來沒有讓肥沃的土地，變到如此的貧瘠消竭！你們都應當負責，你們不肯工作，不肯供獻——你們這般人，還有那些領導你們的胡塗東西！」

那晚就發生了亂子。

本區的青年團集會，聲言是分配輪班工作。會場裡點着煤氣燈，裡面煙霧迷漫。女團員也來出席，並沒有多少演說和討論，大家盼望着跳舞的餘興節目。當區域委員會的代表開始致詞的時候，窗子突然震動，接着有別的破碎之聲。外面有槍聲。

燈火熄滅。一盞掉在講臺附近，幕着了火。團員們，有的拔出手槍，往外衝去。可是外面沒有人。攻擊

者已經逃光了。

青年團整夜的搜查村莊。我躺在床上，母親在黑暗中坐在我旁邊，外面有斷斷續續的槍聲。東天一片火光，我慢慢入夢，聽不見什麼了。我醒來時，母親不在旁邊。我急急穿好衣服，走到鎮上去。

彼脫雅告訴我，農民死屍發現了十五個，傷者更多。他驚怖地告訴我，他看見有一個眼珠掉了出來，一條肉連着，懸而未墜。

政治保安局的人，下午前來，立刻開始調查。數十名農民被傳詢。有的當場釋放，有的給拘押了起來。當夜亂子更大，槍聲也更多。有槍的青年團都帶着槍，沒槍的腰間插着刀。母親關緊房門，又把一張椅子緊靠在門上。這比什麼都使我害怕。我像嬰孩似的蜷伏在母親懷裡睡覺。

情形一天壞一天。農民也開始殺人了。內戰時代藏匿的短槍和來復槍給他們搜尋了出來。有一個政治保安局的人，給一槍打在胸口，接着是瘋狂的包圍和搜索。農民每次被捕都以數十計算，有時合家都給捉起來。婦孺的號哭成了日常事務。

一切都實行作戰的體制。學校變成了政治保安局及青年團開會的堡壘。外面日夜有武裝人員嚴密守衛。恐怖漸漸消沈了。農民接受了失敗。苦難與死亡的簾幕重又掛了下來。配給大大地減少。母親把她名份的分給我吃。我之發現這一事實，因為目睹她臉色日見慘白，常常呆呆坐着，不像從前那樣的終日忙碌。母親雖把東西分給我，可是我還常覺饑餓。我說她不應當把東西省給我，她祇是苦笑，說她不該把我生到了這個世界來。

X
X
X
X
母親對於我在這友愛快樂的民主國家，暴露了蘇維埃間諜網的黑幕，她是不會怨恨我的。不，決不會。

也不會怨恨我『背棄』了她。倘使她現在還不會餓死，不會給槍斃，倘使她可以看見我的這些孩子，我生活在裡面的這個社會，我想她一定會深深吸一口清潔自由的加拿大空氣，說道：

『伊各，這與我們舊俄時代的生活，沒有兩樣。也許別人要懷疑你的動機，可是我決不懷疑。』

三 初到莫斯科

母親請求調職的信裡，曾經控訴凡雪里，彼德洛微支的失職。村莊裡其後發生的變亂證明了母親控訴凡雪里辦事乖張是確鑿的事實。還有母親本身教學成績的優良。這些因素，使她順利地得到了調往莫斯科的命令。

她一個人先去，隔了很短一個時期，寫信來說，她已接洽好，叫我住到叔叔家裡去。她說，她再設法在莫斯科找到住處後接我去。姐姐和哥哥也是寄居在莫斯科的親戚家裡。

隔了一年，母親纔替她自己，我和伊拉找到了房子。

我早想離開叔叔家裡，母親的消息使我非常快樂。我知道我走了他們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我的行裝，除了一捆教科書外，一只舊箱子都已裝盡了。

母親很快樂地帶我們到莫斯科郊區去看房子。

『我自己和你們兩個都登記了住到模範宿舍去，』母親得意地說，『而且成功了。』

在北美洲，大家以恐怖的情緒寫述或談說平民住宅區。我心中往往覺得好笑，你們的所謂平民住宅比起俄國的模範宿舍來，簡直是奢侈。

我們走到莫斯科南郊一排三座兩層的房屋。形式類乎兵營而是木造的。許多烟囪，在屋頂上雜亂無章地

蠢了出來。

我們停留在一所房子前面。『就是這一所。』母親說。

門口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大約都是這屋子的居戶。他們以顯著的不樂意目光看看我們，當我們與他們迎面而過的時候有人喃喃地說：

『到底還要派多少人到這裡來住呢？』

進了門光線很暗。一股霉腐的氣息，使我停了一停步。從新鮮空氣中進來，我得到一種十分污濁的印象，聞到了陳腐的油煙氣息和酸味。母親敲着一扇掛有『烏普拉夫頓』牌子的房門。『烏普拉夫頓』一詞的意義是房屋管理員。

我們聽見裡面發出一陣咕哩咕囉的語聲，但無從明瞭它的意義。

母親叫姊姊等在外面。她示意叫我跟她進去。一個白鬚老頭子在補鞋。

『管理員同志，』母親陪着笑臉說，『這是我的兒子伊各，我常常跟你談起的。』

老頭子祇顧埋頭工作。母親有些窘。她又招呼了他一聲，語音帶着一些不安的情調：『倘使你用得着他，伊各很樂於幫你的忙。派他一些小差使，或者讓他幫你鋸鋸木頭。他閒着的時候都可以幫你忙的。』

管理員吐了一口嚼煙的黑色渣子。

『我們走吧，伊各。你已跟可愛的管理員見過面了。他對於我們住在這房子裡的人都很好，所以你要聽他的話。我們上樓到我們的房間裡去。跟管理員同志說聲再會。』

『再會，管理員同志。』我說。但那老頭子連目光都不會擡一擡起來。走上樓梯的時候，母親很抱歉的對我說：

「他原是不大開口的，但他是個好人。總之不論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都有跟他做朋友的必要。」

走廊很長，我覺得簡直有幾里路長，兩邊都是房門，每一扇門大約相隔一公尺。母親開了一扇門。

「這是我們的屋子，」母親對我跟伊拉露着得意的笑容。

裡面有兩個我所不認識的婦人坐在那裡。

「這是什麼人？」我輕輕問母親。

母親立刻把我介紹給她們。「這是跟我們住在一起的鄰居。」

「你是說跟我們同住在这座建築裡的嗎？」

我的天真，似乎使母親有些驚訝。

「哦，不！她們也是住在這個房間裡的。」母親指着其中比較肥胖的婦人對我說：「瑪麗亞·尼古拉夫娜有一個兒子，一位聰明的青年，在紡織學校唸書。這位納德士達·米克來洛夫娜，」母親又指着另外的一位，「有個女兒，但她是不住在這裡的。」

後來我明白這小房間裡要睡我們六個人，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睡地板的了。

這房子是不可思議的擁擠。整天充滿着喧鬧之聲，孩子的哭嚷，每層兩端公用廚房裡的高聲談話。腐敗食物，髒亂衣服，霉爛垃圾等等的臭味，我的嗅覺神經，至今還留着記憶。我有時懷疑，是不是還沒有把自己洗滌得完全清潔。

這「模範宿舍」使我接觸到一種新型的政治保安特工，特別設立在这裡的支隊，由不少在這房子裡秘密搜集情報的人所組成。我漸漸地很容易辨別這種特務分子。他們永遠在偷聽別人談話，而且常常做得非常愚蠢。我也知道，跟這些人和管理員客客氣氣是聰明辦法，因為他們一紙報告能使你家破人亡，而政治保安局對

他們情報員的報告，總是信以為真的。

生活異常黯淡。食物很少，得到的也質地極為惡劣。到處都要排隊。在合作商店前排隊，等待一點可憐的食物；衣着方面一二種非要不可的東西，也得排隊。排隊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功課。在加拿大，你可以隨意走進食品，糖果，五金等店舖，要買什麼就是什麼，真使我無限的滿意。這裡沒有特別給官員留開的部份。也沒有政府命令限制我祇能在那一家買東西。也沒有人對我說：『這裡你不能買的。』

莫斯科生活中沒有所謂交際。或許爲了這個原因外國人把俄國人看成鄉巴佬。我可以說，如果北美洲的人，有一代也過着俄國的生活環境，那末貴國這些青年也非成鄉巴佬不可。舉例說，我初次在加拿大火車裡吃飯以前，從來沒有想到一餐飯要用這許多銀傢具。一個羹匙，一把小刀，和一隻叉，在我們是足夠有餘的了。

宴會是沒有的。也沒有地方款待客人。請客沒有菜餚，也沒有酒。

男孩們的夢想，莫大於自己能有一只錶。女孩們，野心大的，也從來不夢想有整宅的家寶，只要一個獨享的房間就夠了，嫁個丈夫有工作做。不發生政治性的麻煩也就心滿意足了。

X

X

X

X

我進了一所學校的五年級，這學校取名爲高爾基，以紀念文豪高爾基。它在工人區，離史太林汽車廠約隔兩條馬路。

這學校也是在旅行者面前炫耀的處所之一。使我第一次熟悉了俄國的『政治展覽』。差不多每月都有外國旅客，大多數是英美人，給人引導到學校裡來參觀這『工人子弟的學校』。

附近雖還有許多別的學校，但我們這一所乃是唯一向外人露面的學校。因爲其他的學校大都污穢雜亂，

簡直家畜都不宜居住，不用說孩子了。

我到加拿大，隔了相當時間之後，我翻翻那些『俄國印象記』一類的書籍，往往使我驚異，何以那些似乎很聰明的作家，竟被俄國的宣傳謊計所欺騙和矇蔽。

在莫斯科的幼年先鋒營裡，我們常常奉命玩着這種無聊的遊戲：『兩拍，三拍！孩子們，拍手！來，兩拍，三拍！』

一切都是要訓練我們成爲機械狀態。幼年先鋒營是以軍事爲基礎的。首重紀律，一切都有條例管制。我們組成兩連。廣場中間豎立了旗杆和檢閱臺。喊着『向前看』的口令，每天一早舉行升旗典禮。

早飯的東西並不好，也並不多，可是孩子們比了在家中所吃的已經好得多了。我們親眼看見，隊中的首領們，常常吃着三份飯菜。我們視之爲榮任首領的特權之一，我們常常討論，如果一旦自己做了首領，應當吃幾份飯食。

到夏天將要終了的時候，營中的情形變壞了。孩子們易於厭倦，開始抱怨。我們每星期一次，必須做軍事性的遊戲，每次都有不服從的現象發生。次之，營中的首領因酗酒而發生了惡劣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他在宿舍裡常有酒局。因此他把公款去支付酒賬，開了不少虧空。爲了彌補，我們營裡的伙食和生活情形，比別的營裡要壞得多。可是這還在他實行一個荒唐詭計之前的情形。

營中的首領們有許多計劃。有些是關於菜園的，用下面的口號強迫孩子們自早晨工作到夜裡：

『孩子工作即等於休息。』

別的首領又主張每天作軍操。這也有一個口號：『使孩子們準備作保衛祖國的戰士。』

有些教官是從建築學院畢業的，我們的首領就把我們組織了繪圖班，畫了許多人頭和面具等。各營比賽

的時候，把這些東西拿出展覽，作爲孩子們的作品。

『我們的孩子以促進文化爲消遣，』他得意地說。『在正常工作之外，發展各方面的技能。』

裁判員給本營以頭等獎，首領也得到特別嘉獎以褒揚他的領導有方。那夜鬧酒的聲響比平常更高了。

幾年之後，因爲我在低級學校的成績優良，共產主義青年團把我看作有力的青年幹部。我開始受了這種榮寵的影響，一心一意接受了青年團員的任務。

現在回想起來，我外表雖接受了我的新任務，然而仍舊不能磨滅我心中腦中許多不愉快的記憶，因爲我們深深體驗了蘇俄生活的嚴重性。苦難與不公平似乎在幼小者的記憶裡留下了無可再深刻的印象。

因此之故，那隊囚犯的景象，使我永不忘記。在我童年，已經使我想到了全國同胞們目前和將來的命運。在幼年先鋒營裡挨餓的日子，目睹着首領們吃得酩酊大醉，切齒痛恨，世界上竟有這種現象的存在。我忠實於青年團員的職責，可是先天的狡智，這也是我週圍無數被壓迫者，所同有的，警戒我把一切放在心裡，對外絕不表示。

從幼年就養成的說話謹慎的習慣，實爲我一生極大的資產。它使我能獲得上級人員的信任。它使我得到了一個普通農村青年所難於得到的地位。

我最後聽到波德金娜的消息，她跟她母親給逐出莫斯科遣送到寒冷的北方去了。有人說她在那裡生活一定異常艱苦，食物配給也給削減了。也有人譏笑着說：

『波德金娜弄些三外快是非常方便的！』

他說這句粗鄙的笑話，自己放聲大笑。

現在，回想到這位美麗大方的姑娘，被殘酷而不可思議的動機，指派爲『人民的敵人』，我心中總要好久

一回的愧恨怨尤。可是在惡魔般的教育之下。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類此的案子很多，同樣的殘酷。我兩位同學，一位女的寧娜·格羅也夫，一位男的凡亭·却尼希微支，即爲另一實例。

他們的父親都在發電機工廠工作。在某一次清黨運動中給捉去了。在家屬等待與無所適從的時候，寧娜與凡亭認識了。我們遵守我們的訓練，不理睬這種人，讓他們去寂寞與擔憂，可是他倆却戀愛起來了。

兩人的父親給槍決了，罪狀並沒有宣佈。可是與波德金娜的案子不同，在青年團裡是知道的，不過不讓寧娜和凡亭知道他們父親犯了什麼罪。既爲犯人的兒女，他倆當然也被青年團除名，然而允許他倆仍能在我們中間照常受教育。

寧娜是運動健將，保持着全國的游泳紀錄。她交遊甚廣。中等身裁，體格健美，有一種天然的令人喜愛的態度，和氣而無運動員的粗暴之氣。

給青年團開除之後，寧娜避免談到她的父親。祇有一次跟她談話的時候，她提到了父親。她以怨望的語調，說她從未覺得有何犯罪之處，她一點也不覺慚愧。

她像班上別的女同學那樣，寧娜進了醫科學院研習醫學。三年之後，她進了莫斯科普洛列泰斯基區的一個醫院。

多年之後，在大戰期間，我忽然想到寧娜，去看看她是不是仍在那醫院裡。巧得很，她正要回家去。她見了我很高興，要我跟她一同去到她家去。天在下雨，可是陪寧娜走路似乎使我特別的樂意。

在途中，她提起那些舊同學的名字，我儘我所知把最近的消息告訴她。她說凡亭在前線，她已經幾個月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了。

可是大部分的時間，她談的是食物。我們走過一個軍營，窗子裡流出一股湯的香味。寧娜使勁吸了一吸。『喝這樣一碗湯，』她嘆着氣說，『我就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

她站在她的住所之前。那是一座兵營所改成的二人家庭宿舍，寧娜也住在裡面。住的人多得要溢出來了，孩子在外面的泥污中玩耍。一種熟悉的霉爛垃圾臭味催促我快些離開這裡。

雨停了，我們握手的時候，雲端裡露出一縷太陽光正照在我們身上。寧娜欣然仰首而望，微帶笑容，脫去了頭上的那頂舊帽子。

『這是愉快的徵兆，伊各！』她說。

我注視着她的頭髮，從前在遊泳出水的時候，總是漆黑光亮，那樣的美麗可愛。然而現在好像久未梳洗，有一點點氣味。

寧娜臉色有些忸怩，好像已猜透了我的思想。

『沒有肥皂。』她乾脆告訴我。

我對於這段插曲，永感遺憾。她一向如何的高傲，現在自認不潔，不知怎樣的使她傷心。對於我，破滅了我童年一個美好的記憶。

後來，我又得悉了可憐的寧娜，碰到了更傷心的遭際，比沒有肥皂洗頭髮，那要重大得多了。

有一天，寧娜在醫院裡，被派去看護一批新來的傷兵。她像往常一樣，問他們有沒有凡亭·却尼希微支的消息。其中有一位說：『我認識的！』說完又有懊悔說出的表情。『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匆匆補上這一句就不作聲了。

寧娜對於這類事情，有婦女們特有的直覺。她一面工作，東拉西扯地與病人閒談。後來，一個自然而然

的機會使她跟上次提過凡亭的人單獨說起話來。那人把所有的情形告訴了她。

他跟凡亭同在一團，而且是親熱的朋友。在大家知道他會被青年團除名之前，凡亭在部隊裡很得別人的好感，軍官也重視他。後來就給調到『反省團』，不久就戰死沙場了。

寧娜的神經支持不住了。數月之後，她回到醫院，穿了黑色的衣服。院中職員同情地問她家裡死了什麼人。她不告訴他們，但大家覺得寧娜變了，和從前完全不同。寧娜一定愛凡亭甚深，所以對她的影響竟如此之大。其後她也被發現，會給青年團開除，於是醫院裡也不再收容她。

她投水，但給救了起來。黑海來的一個水手把她從水裡救起，帶到了他的家裡。她在那裡住了一個時期。水手回到黑海去的時候，寧娜開始在許多酒館裡出現——一個永遠穿着黑色衣服的奇怪姑娘。

後來，寧娜在警局醫院的花柳防治病房裡，成了出名的『馬克斯區域的風流寡婦』。

四 蘇聯——勞動者的天堂？

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十八歲，我在今古藝術館學習一門繪畫課程。這圖畫學校的名字雖體面，地方却並不高明，在莫斯科中區一所舊建築的最高層。爲了學費，我在近郊一個翻砂廠的識字班當教師，弄到這位置，這是我母親的助力和自己的學業成績。

後來，我在國外的報紙上讀到外記者們的報導，譽之爲蘇維埃成人教育的進步。在我看來，他們的報導真是遺漏太多，然而記者們也只能就他們所見所聞寫下來。而外國人在俄國，也祇能看到聽到蘇維埃政府要他們看要他們聽的東西。

我得到這職業之後，要我去見工會的主席。這是訓令所規定的。

那人約三十歲，以歡迎的笑容迎接我。我向他報告我掃除文盲的野心計劃。

『是的，是的，當然，』他不耐煩地岔着說。『我們必須肅清文盲。』

他站了起來，招呼我跟他同去。他帶我到了一間所謂『俱樂部』的屋子裡去，那是爲工人落班休息的。裡面有幾張彈子桌，但那裡的人，大都坐着或吸煙。有的在長木椅子上睡覺。在一張彈子桌邊有人在爭吵。

『這就是你上課的地方。』工會主席對我說。

我詫異地看着他。

『這是不可能的！在這種環境之下，如何上課呢？』

主席乾脆回答我道：『倘使你覺得不行，我可以建議另調別人。』

這使我無話可說。從此以後，我就盡我力之所至，但總覺得鼓勵不起來。來上課的工人有的好像沒有睡醒。有的跟我和『同班學生』開玩笑。彈子桌旁的喧嚷和笑聲不斷使功課的進行中斷。

我後來又去找工會主席，請求調換一個適當的地方。

『沒有別的屋子。』他皺眉頭說。

『能不能借你的辦公室，每天上兩小時課。反正這是提高工人知識的……』

他忿然地拍着桌子，叫嚷道：

『你以爲你是什麼人！看着你這種青年，白嫩的双手，既不打鐵，也不是煉鋼，我心裡就不舒服。倘使你自己以爲有力量，要在這裡擺架子，你錯了；如果再是這樣不識相，我會給顏色你瞧！』我與工會主席的談話就如此結束。

在翻砂廠成人補習班的一年，我毫無成就。我並不是沒有努力，這簡直不是學校，而是開玩笑。可是，這一年工夫，使我認識了工人的情形。

班上的『同學』，常常請我去參觀他們的公共寢室。他們的貧乏真使我吃驚。除了床底一只木箱之外，都別無長物。

每座宿舍約住一百人，而一半以上的床舖，總有日班夜班的工人，不斷躺在上面。等待上班的人，總是喧鬧異常。充滿着笑聲和烟味。常常有女人去會見什麼人，那些躺着的也視若無睹。

有一次，一位年青見習工人帶我進去，我舉目四矚，心中正惋惜着他們工作如此的勞苦，而生活又如此的惡劣。那青年拉拉我的手膀，得意地把窗上掛着的廉價布窗簾指給我看。這是工人宿舍所難得看見的。

『生活得很文明吧？』他誇耀着說。『我們與鄰近的宿舍比賽，』他說，『這月我們得勝了，裁判員說，大半爲了這窗簾所表示的一點文明意識。』

他得意得臉都漲紅了：

『這是我想出的念頭呢。』

X

X

X

X

多年以後，當我第一次在加拿大乘火車的時候，我又想起了這窗簾，加拿大連火車裡都掛窗簾的。每家的窗子上都有窗簾，並不是爲了比賽，而爲生活上所當然的一種平常東西。

火車快到溫尼貝克，從車窗裡望到一家工廠，外面廣場上停滿了汽車。

我興奮地指給座旁的一個加拿大士兵看。

『你瞧這些汽車！政府一定在作大規模的檢閱。』

我立刻想到政府，因為在蘇聯，除了政府官員，就決不會有這許多汽車的集合。

那士兵詫異地看了我一看。

『胡說！』他說，『那些車子是工廠裡工人的！』這簡直絕對無法相信。我斷定那兵士對我作謬妄的宣傳。火車到渥太華之前的兩夜一天，我就沒有跟他說一句話。

工人怎麼能賺那麼多錢，買得起汽車呢？縱使有了錢，怎樣得到允許，購買祇能屬於政府的東西呢？

紅軍進入歐洲的時候，我又想到了多年前俄國工廠宿舍裡的窗簾。紅軍在歐洲，他們站在最簡單的家庭之前都發呆了，因為窗上的窗簾，屋子裡的傢具，和壁爐架上的時鐘。

直到今天，我每看到窗簾，心中總覺得悲哀和同情，想起了可憐的俄國同胞，他們生活之悽慘，連窗簾都成了奢侈品。

X X X X

在我學習自由生活的過程中，充滿了這一類的驚訝。從這裡比較，使我明白了蘇維埃生活的悲慘與苦痛。

我每一次的新發現，使我的心回到莫斯科那個翻砂廠，想到了辛勞出汗的大眾。他們的怨言，他們不知不覺的長歎，如果給聽見了，那末連這一種最可憐的生活都得不到，鐵索琅璫的強迫勞動營，即為這種『自由』的代價，想到了這種恐怖，也就安於那種悲慘的生活了。

渥太華蘇聯大使館裡有一位同事蓋爾金，在他進軍界之前，曾在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廠裡工作過。

俄國工人技術知識的低下，與北美工人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於是連國外機器之如何寶貴都不能理解。

蓋爾金告訴我，有一大批的美國器材運到了他們的工廠裡，從車子裡卸在場上，無遮無掩地就擱在那裡。這批器材之中，有製造汽車的機器，隔了很久很久，工廠中定購這批機器的部份，絕不見派人點收。

雨繼之以雪。遙長的冬季過去之後，雪溶成泥漿，有一天，火車裝了幾車生鏽的廢鋼鐵來。因為場上的擁擠情形，場上的工頭與火車上的工頭爭吵了起來。結果那幾車廢鐵倒了出來——恰好堆在美國機器的上面。

又隔了相當時間，那定購機器的部份準備好了，管事的人忽然問起機器來。照往來的文件看，機器是已經運到了，但場上如今祇有一大堆廢鐵而已。經過了許多的喧嚷與調查，總算得到結論，機器是在廢鐵堆的下面。

青年團立刻組織了他們所謂的『衝擊隊』，找尋這些寶貴的機器。這衝擊隊就大張旗鼓，配備了鶴嘴鋤，鐵鍬鐵鏟等，他們奮勇直前，唱着歌，去發掘那廢鐵堆。結果發掘到了，但搬起來得費幾天的時間，修理又需幾個星期。

這種浪費與無效率，在莫斯科工廠裡是常事而非例外。我在莫斯科讀書的期間，有好幾次組織了所謂衝擊隊去清理發電機工廠。

第一次，花費了我們一個月的時間，清除了該廠院中所堆積的污穢與廢物。可是，隔了九個星期，我們又給派去了，污穢與廢物的堆積一如從前。以愛國心相號召，繼續不斷的組織了『衝擊隊』，人們可以暫離其本身工作而前來參與。然而工廠裡却從未有人想到祇要永遠派定兩三人隨時清理，要簡便得多。這樣可以不必荒廢別的工作和學生們的課業。

描寫俄國現代工人的生活是如何快樂的文章，國外發表得非常之多。可是，請相信我，你所聽到或見到

的蘇聯宣傳，恰好與事實相反。

舉例說，我很奇怪地讀到不少消息，說俄國罷工，甚至戰時也有罷工。老實告訴你，俄國是沒有罷工這回事的。

蘇聯的工廠管理，以秘密警察爲主要工具。他們奉令消滅組織罷工的最起碼的可能性，無數的秘密警察以及他們的『特別委員會』。人員永遠在注意有沒有人作不滿意的怨言。工會實際上早已改變爲政治保安局的分支機構。

在戰爭發生之前數星期，高爾基城的一家工廠裡，有幾名工人罷工。他們說工作過度，疲倦不能工作。並且說，家裡的人快要餓死了。要求增加食物。

這一案子，當局特別拿來對全國有罷工意識者作爲警戒。十四名罷工工人，一律槍斃，我記得報紙上記載得特別淋漓盡致的詳細。

然而還不止如此。全廠其餘的工人都給趕上火車，流放到西伯利亞。連該廠政治保安局的首領都受到處分，因爲他讓罷工竟發展到實行的階段。這當然是對全國政治保安局人員的警告，要他們特別謹慎——否則試試看！

廠裡換了新工人，官辦報紙竭力宣傳他們生活如何愉快。

我到渥太華後，從報上讀悉西方國家勞工組織力量如此之大，經過很長時間，我始相信這是事實，不是騙人的宣傳。准許勞工自由組織全國性的工會，對於他們的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環境，竟有發言之權，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高希各夫，大使館的一位同事，有一天竟忍耐不住說道：

『這纔真正是勞動者的天堂！』他又道：『倘使把這裡工人所享受的自由，告訴莫斯科，列寧格勒，高爾基，卡科夫的工人，他們一定要笑我們。』

『是的』，我說，『這也是我國工人應當享受的真正自由。但有什麼辦法呢？』

高希各夫，陡然一驚，他擠着眼睛看着我，使我不能不發笑。

『不必這樣看我——我不是特務，放心好了。』

高希各夫的眉頭展開了。他慚愧地笑了一笑，又轉臉望望肩膀的後面。

在今日的俄國實在沒有辦法。新一代勞動者，絲毫沒有自由工會的觀念，絕不知道罷工是什麼一回事。他們有生以來就是一種新型的奴隸，卑微忍耐，自己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受優待的勞動者。最壞是沒有法子向蘇聯工人說明國外的情形。縱使能用文字或語言打進他們的耳目，他們也不會相信。而且文盲甚多，收音機只准聽蘇聯的節目，所以傳達消息也是絕不可能的。

蘇聯工人中兼做特務情報的人，所得報酬也微乎其微。可是周密而效率甚高。

每一部門或每一班，都有幾個人給政治保安局做秘密工作。他們每月不過多得一公斤麵包或一磅白糖。對你同事做這種喪心害理的刺探工作，僅有這點酬報，實在太淒慘了，可是你決不能了解，在這饑餓之國，多帶一些麵包和糖回家去，將是怎樣的得意和快樂。妻子目光中所露出的喜悅，孩子們興奮的尖叫，都證明你是一個成功的家長。

我常聽人說：

『肚子飽了，一個人容易忠心誠實，然若讓一個人挨餓，一天復一天，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那末食物就會比良心更有力量。』

利用糧食缺乏，作為管制人民的武器，在我們這個極權國家已經發展成精密的技術。本身饑餓已是毀難受的了，如果在合家挨餓之下，還談得到什麼友情，談得到什麼道義。爲了給孩子們爭取更多的食物，即使是欺詐，也覺得代價並不算高。

除了竊聽別人談話，刺探消息的小特務之外，工人們還面對着一種更危險的密探。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政治保安局的爪牙，以做工爲掩護，專作挑逗性的引誘，使人不知不覺中露出其心中所想的一切。

他們以隨便閒談來使人忘記警戒之心，引導對方作無所顧忌的談話。他們對於特務組織所認爲『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以發生私人友誼爲刺探的入手。

這種密探，在政治保安局所辦的秘密學校裡受訓，秘密學校遍設於全國的工業中心。在工程師之中，在管理人員之中，甚至在黨裡團裡，都密佈着這種分子。秘密學校，都由政治保安局服務期滿的老特務或是黨中所謂忠實老黨員所主持。凡經受訓畢業的人，都要簽一誓約，如果洩漏學校所在，甚至這種學校性質或存在者，願受死刑。

我注意到外國往往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爲這種共產黨組織的特別學校，其目的爲訓練一種專在北美及歐洲煽動工人的人才。其實這種學校，同時也注重國內的工作。它們也訓練一種人才，散佈在蘇聯工業界，遇有需要的時候，在工人間作蒙蔽或宣傳工作。

這種特務，都有秘密的名字，僅爲政治保安局的總部所知道。甚至工廠中的特務組也未必曉得這些受過高度訓練的特務分子，於是特務也可以刺探和檢舉另一特務，而使雙方認不出來。

他們的權力甚大。他們一句話，可以使一個工人入獄或給送進集中營。尤其當一個工人有所謂危險行動而得到別個工人支持的時候，那是絕不會放鬆你的。公開懲處，恐激起一般工人的不滿，神不知鬼不覺的那

人忽告失蹤，自然簡便得多。

各處工會的首領，照例必為政治保安局的特務分子，這是一種十分狡黠的佈置。他自然永遠不會想到領導罷工。

在這種陰謀刺探，互相監視與互相猜疑之下，別國工會的作用，自然在俄國無從發生的了。

還有一種工人，乃是國外所絕少聽見的。這就是『強迫勞工』，在科學發達人類進步的時代，還有這種奴隸存在，簡直是可怕而不可思議的。我在一年的工廠教習任內，曾親眼看到下面這段悲慘的故事。

如果一個畫報要攝取強迫勞工的全般鏡頭，那末最好以塞洛甫城為背景。這當然要假定那攝影師能逃出坐牢或槍斃的遭遇。但若編輯先生拿到這套照片。他會不會相信天下真有此事，我老實表示懷疑。

塞洛甫也像西伯利亞的若干城市，四圍都是集中營。集中營故意設在工業中心的附近，以便囚徒們從事『強迫勞動』。

每天早晨，在深灰色的烏拉爾天色之下，一隊一隊囚徒的陰影，慢慢向城中移動。這是從塞洛甫附近九個集中營來的。我曾問過一位同事，這一帶究竟收容着多少囚犯。

『確數不知道。』他說，『但有一次這裡的居民曾經點過隊伍的數目，估計起來超過了塞洛甫原來的人口。』

塞洛甫工廠裡的工人，已習慣於跟這種囚犯共同工作，一點不覺稀奇。事實上，自由勞工與強迫勞工的差別並不多。工頭和經理對他們都可以謾罵叫罵。

自由勞工享有一種特權，他們回到宿舍去的時候，可以獨往獨來，不必『護送』。而強迫勞工則有人監視，他們的住處外面有嚴密的鐵絲網。

走到樹林中去，到處可以發現『行人止步』的招牌。

這是外面的圍牆。裡面還有一層，緊緊包圍着營舍，就是那些灰色陰影的住處。因為樹林甚密，從外面路上是望不見什麼的。

集中營裡的這些囚徒，他們的存在，全看他們有沒有工作需要而定。處置不需要或不能工作的人，饑餓寒凍乃是最尋常的方法。

記述集中營的情形，我想一定有人會搖着頭說：『俄國不會有這種情形。這人是在誇張或說謊。』當然也有人會說，當納粹集中營的黑幕，第一次公之於世的時候，也是這種情形。

在囚徒之中，有許多過去的教士。他們的工作是洗擦各種教堂用具，如神龕，十字架，燭臺，香爐等，把上面的鍍金磨括下來。我看見他們在教堂裡工作，處處可見。這種教士往往比別的工人更瘦更憔悴。在教堂的陰森空氣裡，反映在手中的金屬器具之前，他們好像是殉道者的鬼魂，又像活的骷髏，默默地委心任運的在工作。

有一次在莫斯科，我們若干青年團員，特許前往參觀蘇維埃的法律如何處置那些曾經傳佈宗教——人民的麻醉品——的罪人。我們給帶進一個久已封閉的教堂。僅留一扇小門，作為那些『工人』出入之用。

裡面的空氣，特別使人難受。連那些監視的特工人員，也得常常出來換換空氣。可是那些『工人』則一天在裡面要耽到十至十二小時。

我們之中，有人就談到這些人憔悴到出奇的形容，問起是不是因為他們在革命前那種『無用職業』給造成的。

『也許有一些關係，可是……』那特工人員睜眼地看了一眼，『他們天天在磨刮那些用來毒害人民心靈的』

工具，化學的毒素使他們身體吃虧，這不是公平交易嗎？」

他笑了。接着又說道：「你看，他們用來洗擦的酸性藥品，蒸發出氣味來，深入他們肺部。工作長久之後，酸性且會從手指傳導到身體之中。」

有人問，這種酸性毒素，能使他們迅速死亡嗎？

『不，』那監視的人說，『很緩慢而久長的死亡！』他又大笑了。

我們的嚮導，並且還告訴我們不少其他的可怕故事。有些教士給派到高處去工作，酸性的氣味，有時使他們發暈，從高處跌下來。那些幸而死亡的人，就葬在教堂附近的墳園裡。監視人祇要報告一聲，就從集中營裡另外指派了人來。

那次的參觀，使我從兩個方面認識了蘇聯手段的陰狼。第一、懲處教士的『特別』方法是秘密的，天黑之後方把這批『工人』集中起來，送到教堂作整夜的工作。天還沒有亮，居民尚在睡夢之中的時候，又把他們送回集中營去。這樣可以避免那些『仍舊沾染着宗教細菌』的居民，發生什麼同情的表示。而在另一面，却准許青年團目睹這種『秘密』。

理由很簡單。青年尚未沾染『細菌』，目睹這種『公平的果報』，使我們更能理解蘇維埃對於人民敵人的處置方法是如此的嚴厲。

可是，這一次參觀，使我對於這種殘酷手段，突然於不知不覺中起了慚愧和不快的感覺。我爲什麼有那種感覺，當時使我們懊惱，蘇維埃反宗教的巧妙宣傳，顯然沒有把我童年在塞姆益外祖母家時，附近那所恬靜教堂的印象根除。但青年團所受的訓練，使我機械地抑制了不合乎黨團意志的任何情緒。

然而人類的心靈，是無法永遠控制的。我雖竭力想忘却那個記憶，可是那次參觀所得的另一印象，却堅

如鐵石，無法磨滅。我問那特工人員，這些教士，對於他們過去的『愚蠢』，是否有悔憾的表示？

『悔憾他們的愚蠢嗎？』他說。『這種笨蛋從來不知道學習。我常常捉到他們在洗刮的神龕前祈禱。你以為使他們受毒至死的愚妄，會使他們在腐朽的偶像之外，想點別的現實事物嗎？』

這些堅毅勇敢的人，就是那樣工作着，從教堂的器物上刮下金子來，溶化之後，俄國就用來派遣和餒餒國外的間諜，購買機器，建設所謂蘇俄的『快樂生活』。

五 學習與戀愛

我習業的第一步，是向莫斯科建築學院申請入學。由於青年團主席富於經驗的指導，以及我在低級學校裡優良的成績，申請入學並沒有遭遇多大困難。在極短時間就接到通知，叫我準備於秋季去應入學考試。

我成了列寧圖書館的常客。關於藝術及建築的書籍，凡我看得懂的都借來看，而對於數學及結構學也化很長的時間加以研究。入學試驗自然用不到這些高深學問的，但對於這些學科的興趣及基本知識，也未嘗沒有幫助。我為學院所錄取了。

在幾年讀書期間，列寧圖書館仍是我常到的地方。那裡衆多的書籍，靜穆尊嚴的學術空氣，這種記憶，跟我當時的一段戀愛史交織互融，無法分開。

當時我們的同學，有的跟學院的女同學，或跟常常照顧的店家的女店員，常常會發生一點羅漫底克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往往不長。我因專心向學，甚少時間想到戀愛問題，直到有一天，我在列寧圖書館裡遇見了安娜。那時我生平第一次，也僅有的一次，跌入戀愛了。

如果允許我說幾句題外的話，我想我在這裡應當對於俄國的男女問題有所說明。若干對於俄國女子道德

的指責，往往使僑外的俄國人聽了頗感不悅。我不是清教徒，但有人以為俄國缺乏家庭生活及宗教信仰，造成了俄國青年在性方面普遍的不道德，這句話是不對的。

一般的俄國姑娘，也像非蘇維埃世界其他的姊妹們一樣，也是希望有好丈夫，孩子和家庭的。

安娜是我同班的女生。她與我似乎距離甚遠，我在學校裡簡直不敢跟她說話，可是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裡，面對面的遇見了她。我沒有開口，安娜却和顏悅色的問我道：

『你到這裡來，跟我的目的相同嗎？』

我竭力鎮定從容，微笑地回答道：

『如果說是研究俄國的建築史，那末是的。』她點點頭，我就接着道：『或許我們可以來合力研究吧？』這是友誼的開始，不久就發展為愛情。安娜今日已是我的妻，和兩個孩子的母親。我平生許多決策，都有她的鼓勵，尤其是最重要的那一回，對我們歸化的這個國家，暴露了蘇聯的間諜陰謀。隨時雖有生命的危險，安娜的意志却極為堅定。加拿大警廳方面的朋友對我說，如果我沒有她，我連一半都做不到。我承認。

因為安全條例的限制，我除提出她『安娜』兩字的名字外，不能作更多的記述，這是很感遺憾的，我們現在同住於加拿大家中，列寧圖書館促成了我們的因緣，思之實令人快樂。

X X X X X

準備『俄國建築』一門課程的考試，安娜和我研讀著名藝術批評家格拉巴的著作。教堂寺院的建築，在俄國建築藝術的發展史上，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所以教我們這門功課的貝索諾夫教授要我們牢記著名教堂的名稱，何時建築，何人建築等。我與安娜各自記誦之外，常常低聲互相考問。

『倪雷狄查教堂是什麼人建築的？』她問。我回答之後，就還問她：『凡雷里教堂的詳細情形你知道

嗎？」

坐在我們鄰近的一位老婦人，偷偷聽着我們。隔了一回，她從桌子對面伸長腦袋，輕輕問我們道：

『我聽見外面謠傳莫斯科的神學院重又開門了。你們是從那裡出來的嗎？』

我很乾脆的回答她，我們對於教堂的興趣，僅限於建築學上的研究。她有些臉紅，同時也有些失望。有一時期，盛傳史太林在考慮有限的恢復宗教，許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渴望此舉能成爲事實。

在革命時期，雖經大規模屠殺教士，沒收教會產業等種種激烈的反宗教迫害措施，但顯然沒有根本剷除人民心中的宗教意識。

我的這一輩，多少還從上一代沾染了宗教觀念，可是我們的下一代，所留痕跡就異常稀少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了避免農民及年長者的惡感，同時爲了國外的觀感，後來當局就覺得對於一樣形將消滅的東西，也不必去嚴加禁制。于是若干業已改成博物院，馬厰或無神俱樂部的寺院及教堂重又回復，立刻有許多民衆蜂擁前去參加禮拜。蘇維埃黨領袖就聳聳肩頭說：『怎麼？這可以使人民的頭腦有所忙碌，好在俄國教會是並不受國外的影響，不至於有害處發生的。』

蘇聯的宣傳，當然利用『恢復教會』這件事在海外大大渲染，以遮掩俄國反宗教政策所受的批評。

在現代的蘇俄，似乎沒有一件事情，可以逃過官方的統制。

數年之後，當我到加拿大來之前，我到列寧圖書館去借一本百科全書，想儘可能獲得一些關於加拿大的知識。我請到了一種特別的借書許可證。

許可證雖和過去的同地方發給，但規則可嚴格多了。後來我詫異地發現，許可證的發給和這大圖書館的管理，都已移交給政治保安局的人員辦理了。其原因爲了圖書館設有特別閱覽部分。其時俄國正在戰時，

這些特別閱覽室只准各軍事學校，各實驗所及政府人員的申請許可證。

其軍事部分，大都由莫斯科的軍事學校學生來閱覽。在閱覽的時候，常常由特務人員在監視，有兩個事例，令我知讀書也必須有所警惕，因為特務要從我們的讀物之中，去探聽讀者的思想傾向。有兩位軍事學校的學生，毫無解釋就給開除了，可是我們都明白其中的原因。因為他們對於革命前的訓練，研究得太為熱心，同時表示着太大的欽仰。

有一天，我偶然地發現，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消息報與真理報無法借到，後來知道其中因刊有若干後來被指為「人民敵人」的作家所寫的文章。

莫斯科有一張「不朽」的油畫，這幅油畫的內容，常常在修改，這倒是有趣而值得注意的。這是『最高軍事會議』的巨幅畫像，出於專畫史太林肖像的格拉雪莫夫之手。掛在紅軍大禮堂裡，幾乎占整塊牆壁的地位。

圖中畫着史太林在桌邊，四面圍繞着紅軍的將領。可是，不久之後，有兩位次要的將軍，他們的像忽然神秘地從圖上失蹤了。他們原來占據的地位，已改換了一幅帷幕或桌子和椅子等類的東西。再過幾時，又有三位將軍失蹤了。

這神秘的解答很簡單，不久官方就宣布，若干將領因牽涉托洛茨基及布卡林派陰謀被捕或被槍斃了。

再隔一些時候，又有若干將領在格拉雪莫夫巧妙的畫筆之下消失。空的地方，那下垂的帷幕所占篇幅更大了。前往參觀的人，不必看報，一望而知誰還仍為史太林所寵幸——仍在人間。

我聽說在某次美術展覽會中，有一位著名藝術家問格拉雪莫夫道：

「老兄……那些維妙維肖的臉容……怎麼又失蹤了不少呢？」

格拉雪莫夫悽慘地聳聳肩頭：

『我怕那幅畫就要拿下來了。我簡直來不及修改！』

隔了沒有多久，那畫果真拿掉了。外面就偷偷地流傳着一個笑話，說史太林占據着那巨大牆壁，旁邊只剩伏羅希洛夫。鮑得寧和鐵木申科等寥寥數人，他原來很得意的表情，也改變了寂寞寡歡的樣子。

一九三九年的暑假，我因在院的成績優良，被請到莫斯科附近一個青年先鋒營去當導師。食宿免費，還有一百五十羅布一月的薪水，我欣然接受了這個短期工作。

因爲生活既不必化錢，所以把它積蓄起來，使我能買一双新皮靴——這是七年以來的第一双新靴。自己得意非凡。我帶回家裡把舊的換下，那舊的早經幾百次的修補了。

跟新的放在一起，舊的真有些可怕。皮已開裂，一層又一層的補釘。可是以前我却沒有想到它的醜陋。學院裡的同學，當然人人注意我的新鞋。大多數同學所穿者跟我那双舊的全無二致，他們以羨慕贊歎的目光研究我的新靴。我很得意，因爲這是一暑假辛苦所換來的。

身上所穿戴的別的東西，其破舊情形也不下於靴子。我的大衣已用了十年。領子久已破碎，夾裡已換了若干次，然而這還比別的同學高明一些。我的帽子，已失了帽形。襪子已穿了七年。幸而原來的料子好，所以看上去還算過得去。全身可以替換的東西，只有襯衫。

後來我到了加拿大，在街頭閒步，可以看見廚窗裡堆滿着鞋子、衣服、帽子等等。而且人人可買，沒有限制，你想我心中該有怎樣的感想。連工人階級都有錢購買這裡珍異物品！

在學院裡，我們對於俄文 *Blat* 一字，深深瞭解了它的意義，這字繙譯起來就是所謂『奧援』，說通俗些，便是所謂『人事關係』。在今日的俄國，如無奧援，即使你在成績方面獲得了榮譽，也無法找到適當的位

置。找事的基本條件，必須有勢力的朋友給你辦法。

譬如像馬耶·克尼畢希夫及卡格諾微支的兒子，他們就不愁職業問題。畢業以前，早把位置確定了。馬耶是我班上的一位小姑娘，永遠落在全班的最後。跟她談話，顯得她很愚蠢。可是她自己說，她父母特別請了家庭教師幫助她準備考試。許多男同學追求她，她所中意者祇有一位名叫密納文的男同學。

密納文很漂亮，人也和氣。他也像我們那樣，起初穿得非常襤褸，可是與馬耶發生友誼之後，衣飾就華麗起來了。他們後來訂了婚。

常常有特務人員護送馬耶到學院裡來。從這一點，我們知道她的父親是要人，但仍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地位。一個女學生有汽車及司機，總是足夠其餘同學的敬仰了。

後來，馬耶與密納文在還未畢業之前，就結婚了。他立刻有了令人驚奇的皮大衣。密納文不敢把大衣留在衣帽間裡，甚至帶到課堂裡。後來，戰爭爆發，我聽說密納文第一個被派到軍事工程研究所去深造。在你們的民主國家，到現在為止，我還不曾聽見過，無能的要人子弟，其家族的勢力，在謀事方面，可以勝過他本身的學識和能力。

我沒有人事背景，說起來雖有些覺得誇張，但我有特別優良的成績。我知道爲了自己的前途，唯有用功讀書，不讓任何事物來攪擾我的讀書時間。也就是完全犧牲一切參加運動的機會，凡是像我那樣年齡的青年，一切正常的娛樂，都得捐棄。我想我在交際場合至今總有些羞澀之感，恐怕就是這樣造成的。

我用功的酬報，當其降臨的時候，方式頗可驚人。我接到通知，要我到建築學院裡的政治保安局特工處去聽候問話。

在學院的一層樓有一間只能一個人進去的房間。這是本院政治保安局的特別辦公處。那人年齡較大，微

微禿頂，穿着半軍裝；高統靴，馬袴，短掛。認識他的人極少，他一早來工作，關了那房間的門，就隱藏在裡面。門是常上鎖的。門上有一小窗，我敲門的時候，他先打開那扇小窗。

『我的名字是伊各·高曾科。』我說。

那特務人員沒有回話，他細細看了我幾秒鐘，然後回到屋子遠遠的那一端，在一大排檔案架上找尋什麼。

後來，拿出一個卷宗，顯然把我的找到了。隔了一回，他拿起一本拍紙簿，在上面寫了些什麼。重又回到窗口來，和顏悅色的問我學業如何。我告訴他一年來總是保持着前五名。他贊許地點點頭，遞給我一張紙頭。

『你拿了這個到伏恩考曼脫去。立刻去接洽。』

我驚訝得連謝都忘記了謝他。伏恩考曼脫是軍事分派站的名稱，我心中測度着各種的可能性。極爲不安。

大廳裡有許許多多人在靜候呼喚。隔了一會，喊到我的名字了。我走到窗口，報告我的姓名，神經緊張得語音都發抖了。那寫字桌旁坐着的年輕女人，當她把委派狀遞給我的時候，面帶笑容對我說道：

『不要慌張，高曾科，需要你所有的熱忱去應付你未來的研究工作。』

我不相信地看着那張委派狀。那女人仍舊笑着，倚在櫃臺上，把委派狀上的文字讀給我聽：

『即赴莫斯科之古畢希夫軍事工程研究所』，恭賀你好運道。』

她明瞭這委派的意義。研究所並不是普通的軍事學校，僅有兩三個月的訓練，而是高級的軍事教育機關。

到了研究所，我們這些學員，奉到簡單的通知，僅有十天工夫準備我們的入所考試。考試的科目爲高等數學、結構學、材料力學，及其他建造工程方面的課程。

我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兩天之後，就被召至研究所所務委員會去問話。

走進那間大辦公室，我發現委員會中有一位年長的上校，還有穿着政治委員制服的女人和一些階級較低的軍官。

我看到有一個寫着我名字的卷宗，放在上校面前。還有兩本成績紀錄簿，一本是建築學院的，一本是本所入所考試的紀錄。我對這本成績簿，很有把握，我知道各科都有優越的分數。可是那上校並不注意成績簿，而在研究我的卷宗。我不知道裡面說些什麼。

『把你的經歷……簡單說一說。』那上校說。

我就敘述我的歷史，這件事我已不知道做過多少次數了。當我說到母親曾在莫斯科讀畢高等婦女學校的時候，那女政治委員岔着道：

『你說你母親出身於塞姆森的農家家庭。在革命之前，農家的女兒，怎會在莫斯科受到高級的教育呢？』這問題有些意外。我從來沒有問過母親其中的原委，可是略一思索之後，從記得的各種談話中，找到了一個答案。

『母親在羅斯托夫中學畢業的時候，得過金質獎章。她是很聰明的學生，數學成績尤其優良。她的教師給她寫了介紹信給莫斯科高等數學學院的院長。此人名賈普立琴，他證明了母親優異的成績。母親一面讀書一面授課，以維學費及生活之用。』

上校慢慢點頭。

『這是可能的，』他說。『然而，在從前，農家女子受高等教育實在是非常稀少的例子。』他接着對我好象生氣似的厲聲說道：『可不是嗎？』

我已學會了應當如何回答。我很迅速說道：『是的，是的，當然是的。』

那上校微微笑着。他拿起我的成績簿指給那女政治委員看。他們輕輕說着話，然後那上校放下手來。

『你已錄取了。我們立刻把你的名字登記，過後再告訴你叫你研究什麼科目。明天你可以領取制服。』那女委員也給我握手，但顯然不甚熱烈。她似乎對我母親的故事還不大滿意。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奉派受訓為情報方面的密碼管理員。我對於被派走上這一條奇怪而危險的道路，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

可是，到了今天，我與安娜生活在自由世界，在這個世界，人類的努力，不僅可以保障生存，並且享受着祇有自由人民方能享受的樂趣，回想起我跟她在列寧圖書館的相識，那些危險的談話，以及後來在生活上遭遇的猜疑與欺騙的空氣，宛如一場惡夢，而這場惡夢很欣幸的現在已成過去了。

六 入『幕』之初

我在蘇俄『鐵幕』後面最初的一步子，是小心翼翼地踏着腳趾走的。古畢雪夫軍事工程研究所的教育，永遠迷漫着警戒，監視甚至猜疑的空氣。

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凡是密電員須受經常的偵察。國家對內對外的秘密都要經密電的傳譯，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就受到警告，幹這項工作，一定要受到嚴格的監視。除了週期性的偵察之外，還時常有特別的一段時間，由政治保安局的人員，不分晝夜，加以監視。

『凡是知道國家秘密的人，是要人，同時也是危險的人。』他們如此解釋。『一個人愈受信任，監視也愈須嚴密。譬如以你爲例，做一個密電員，就知道秘密工作者的真姓名和假姓名，以及他們的一切機密，不論在你方面或在特工方面，都不容絲毫放鬆。你要永遠記着，注意自己的行動。』

我們不准進菜館，因爲常有遇見外國人的機會。任何與外國人發生關係的行動，都視作自取絕路。

認識了新朋友，即使是蘇聯人，也得立刻報告。在沒有報告長官之前，不准與年輕女人相交。這一條例執行得甚爲嚴格。倘有疏忽，那女的和密電員都得受長時間的審問。而後者結果常常遭除名。

鄰居常常低聲告訴我，有人特地向他們探聽我的行動，我就知道特工在調查。這種調查漸漸成爲常事，使我毫無不悅之感。

民主國家的自由人民，倘有人不斷注意他的私人行動必將抗議，可是在俄國則一切變態了，我反而覺得爲了國家利益採取謹慎措施是應當的。

政治指導員馬斯俞尼考夫在講堂上教導我們要忍耐和虛心。切不可從外表去下判斷。倘使我們發現我們的官長，有許多自由的時間，有豪華的生治，不必羨慕。當時我很奇怪他爲什麼特別提到這一點，後來我明白了。

馬斯俞尼考夫，一位目如貓頭鷹的鸞背老頭子，告訴我們他年輕時在基輔當密電員時的經驗。他的化名爲『克立普多斯』，夜裡睡夢方濃的時候，情報處的司機往來敲他的門，要他立刻去翻一個密電。

我們覺得這個人，對於密電工作的知識非常豐富。他微微突出的眼睛，儒怯而甚至有些驚恐的表情，令人覺得他決非強者。但對於電報，有一種特別的敏感。他是個好導師，但常常要講到功課的範圍以外去。他的人生觀聽聽很有道理，而他的形貌未必能予以證實，使別人對他有可憐之感。一生工作得十分辛勤，但從

沒有培植他的膽量和勇氣，爲他自己撐起腰來。

最要緊的，常常提醒我們需有耐心，告訴我們這新職業的生活是很艱苦的。至於他自己，他有一次以可憐的樣子說，他住的公寓，傢具十分破陋，而自己則一天老一天了，但從不表示不滿。表示不滿祇有害處，沒有好處。

後來，當我在情報總局工作的時候，一天在國防人民委員會的門口遇到了馬斯侖尼考夫。他去謁見了總部的執事人員，他們告訴他等待國防委員會的任命。

『他們或許要把我送到前線去。』他牢騷地說。

我常想到這位可憐的人，後來究竟如何了局的，他掙到了軍事研究所的政治指導員，結果不過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前途並沒有舒適生活的保障。

我在情報總局裡，後來得到了一個優越的地位，相當高的薪金，每月一千四百羅布，那時工廠中優秀工程師也僅六百一月。這很高的數字，其實在物質生活方面，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因爲很少，甚至沒有東西可以購買，不過增加聲望而已。

情報局的職員，不准用辦公室裡的電話接談私事。樓下特別裝了一架爲接洽私事用的電話，由特工檢查每一個來往的電話。認爲可疑就給紀錄下來，報告主管者的注意。於是每一個人都特別具有戒心，丈夫跟妻子討論孩子的疾病，也不敢暢所欲言。

工作人員的神經，也顯然的常在緊張之中。工作的性質，需要我們常常保持謹慎和警惕，一舉一動都覺得四週埋伏着危險似的。

後來被派到阿富汗喀布爾蘇聯武官處工作的布羅金中尉，那時與我同事，有一次遞給我一個發往中國的

電報：

『除去金，交伊格諾辦』。

布羅金輕輕對我說，金完了。『金』當然是化名，作此措施的理由祇有莫斯科及駐華軍事情報的首長知道。

布羅金那種語氣，不禁使我追問道：

『你說『完了』什麼意義——不是槍斃嗎？』

布羅金勉強裝出笑容：『對啊。也許有一天，他們會發出一張關於你的類似電報，是嗎？』

我對這句笑話發笑。當時覺得這真是笑話，可是後來我在國外工作的時候，常常猜想，不知道莫斯科要發什麼有關我的秘密訓令來。

在我們工作的時候，常常碰到這種電報，每一個電報裡就包含着一幕悲劇，尤其是關於『O.S.N.』的。『O.S.N.』是『特種任務組』的簡寫。該組的首腦為葛羅貝夫上校，他那神秘而愉快的姿態，更足以增加該部的威風。這位上校對於表現自己，有其特別的譎詭，他把他那機關中的工作分為『乾』『濕』兩種。秘密派遣人員赴國界以外，是在『乾務』這個標題下組織的。如果要消滅一個危險的工作人員，就由『濕務』部分派出『專家』去辦。

有一位『濕務』專家，常常跟我們在一个飯廳吃飯。他是濃眉而陰沈的人，常常在同一桌子上獨自進餐。有一位朋友某次把此人指給我看，我以前是不曾注意到的。並且輕輕對我道：

『注意他那排勳章。每次你看見他的時候，可以數一數看。』

這個人到飯廳來吃飯的時候，總是穿着整齊的制服，我覺得他很平常而頗引人注意。有一次他發現我

在看他，他就對我怒目而視。我立刻低頭吃飯。

他常常會失蹤一個時期。有一會，他多時不見回來之後，我想起了朋友所提及過的勳章問題，我就好奇地數了一數。多了一個，而且一望而知是列寧勳章。

我告訴我朋友的時候，他輕輕一笑。俯身近我，低低說道：『我們眼看他的勳章在增加。他幹一次「濕務」，多一個勳章』。

我有些不明白，我問他這玩意兒是怎麼幹法的。

『這不是一個人幹得了的。譬如說，莫斯科決定要幹掉派在國外的某一工作人員，這人或許先有風聲躲藏起來了，那末第一步就要察訪這人的所在地。當地的共產黨就奉令去尋覓，往往必有結果。大體上，那被殺的人事前不會知道自己已列名黑單，也就來不及逃跑的。給幹掉的人。事前必經一個時期的暗中考察並記下行動。』

『得到這個情報之後，武官就擬具行動計劃呈報莫斯科批准。最後辦法確定之後，就派遣專人，以外交任務或類似的使命出去。他把那人殺掉之後，就儘速歸來。神不知鬼不覺，那不需要的人就給幹掉了，執行者歸來就領取勳章。』

我真有些覺得罪過。

『殺人竟可得政府的勳章——尤其是列寧勳章嗎？』

我的朋友仰身在椅子裡，細細看我。他聳了聳肩膀，回頭四面看了一眼，然後答復我道：『我的小弟弟，幹這項工作的人，在我們情報總局裡比任何人更多得到勳章的機會。話說回來，他不是冒着生命危險為政府執行了一項重要工作嗎？』

某夜，我帶着布羅金中尉去訪問安娜的寓所。我們坐着閒談的時候，電燈忽然滅了。安娜笑着，摸索到裝置保險絲的地方去。

布羅金擦了一根洋火照着她。

『怪事』，她說，『保險絲並沒有斷啊！』

她開門去找尋別的房客。布羅金突然道：

『回進來坐下。這是政治保安隊搜索外國間諜。』

我們都有些愕然。布羅金在繼續說話之前，先把門關好。

『這是很簡單的。政治保安隊倘使發現空中有秘密電臺的聲音，因為乾電池簡直無法買到，當然那電臺是用一般電流的。所以他們逐區逐區的關閉電流，關到那一區，聽不到電臺聲波的時候，就可斷定電臺必在那一區，就可着手搜索了。』

『每一區又分成若干組，再逐組逐組開通電流。確定在那一組範圍之內以後，或者停這麼一夜或兩夜，再發現聲波的時候，再逐街逐街的關閉電流。找到那一條街道之後，再用前法逐家逐家的偵察。當然很容易的把間諜搜索出來。』

在上次戰爭期間，身份證檢查得特別嚴密。你得像保護生命似的重視你的身份證。因為隨時隨地有被檢查的機會，你在莫斯科，如無身份證，決不能有一兩天的存在。查到沒有身份證的人，立刻拘捕懲罰，即使你證明遺忘在家裡，也需受巨額罰金的懲處。在城市之間是不能隨意旅行的。身份證，配給證，許可證，種種的證，用以網羅敵國間諜，同時也剝奪了所有人民一切最低限度的自由行動。

可是雖有種種的障礙，敵國間諜仍舊不免混跡進來。

莫斯科政治保安局一位密電員契別雪夫告訴我，他有一回截獲一份密電，而且給他譯了出來。那是一個德國間諜要求他上司，把紅軍所換發的肩章，趕速寄他。這個間諜顯然一定假扮着蘇維埃軍官混跡於莫斯科市內。

我記得我在情報局接事之後，他們命令我翻譯的第一個電報。那是從哈爾濱發來的。

那時我還不熟悉情報上所常用的暗號術語，當我翻到『音樂』一詞的時候，我拿去詢問領班拉古鐵諾夫中校。

『不，並沒有錯誤。』他說，『音樂是指發報機，而音樂家是指報務員。』

那電報報告總局，說有一位間諜人員，前奉莫斯科之令，曾把一架發報機暫時藏在某街的陰溝裡，他要求立即指令另一間諜趕快去拿出來。那份電報有如偵探小說，說明隱藏處在總督府附近，該處的詳細情形，甚至說到該區人民的生活習慣。

這一切都使我覺得十分勇敢冒險，但很顯然的，整個工作的安全性，就寄托在勇敢冒險的精神之中。

復電也由我經手翻成密碼。訓令他和那檢起發報機的人在哈爾濱會晤。會面的地點，日期，時間，特別標識和口令等都說得明明白白。

我們做件工作，往往等於每天都和那些海外間諜相接觸，跟踪着他們工作的進展。但有些化名，祇能遇到一次。我們推想這是專為某一特殊使命臨時指派的。或者，一個間諜有許多化名，每次只用一個，絕不重複。

在美國，在英國，在世界其他各國，都有數千數萬的蘇俄間諜散佈着。在自由國家分佈間諜，俄國還引為不足，對於它和盟國共同管理的地區，從合作開始的那天起，就有間諜在刺探有關對方的種種情報。我在電報中『接觸』到的許許多多間諜，各有各的經歷。有的經常有情報，有的間歇作報告。也常常有人不知所

從，前來請示辦法。有時，有人來報告，即有被『破獲』的危險，總局即予以特別的注意。指令都用電報打出去，金錢用種種方法滙劃出去，小至會晤地點的安排，新接觸的指定等等，都可從電報中窺見。

電令『除去』人員的事，發生在中國者最爲平常。有的人受到訓斥，有的受到獎勵。而『爲蘇維埃主義忠實服務』的官冕堂皇話在鼓勵海外間諜的時候，用得最多。

莫斯科應付散佈在全世界的間諜，在心理方面的運用，使我覺得歎爲觀止。詳盡的檔案，費了許多歲月和金錢所編成，裡面對於每一工作人員都有精密的記載，他的動機，習慣，弱點，以及充當間諜的理由等等。這種資料，在心理運用上需要的時候，都能發揮極大的效用。

人們給收買，利用以及拋棄，其中很多人在其本國有其重要的地位，有意或無意地被蘇俄間諜所利用。愛，恨，忿怒，怨尤，性格的強弱，懼怯與勇敢，人類種種的心理，都被那龐大、無情、效率很高的蘇維埃情報機構，利用爲獲得結果的工具。

在我們情報總局的院子裡，有一座兩層樓的白色建築。我起初不知道裡面幹些什麼，後來奉命前往參觀，這地方被稱爲世界上最新式的顯微照相實驗室。大部分的器材都是從美國買來的。

情報總局發往海外的文件，極多是印在縮小的照相底片上的。每一個外交使節，以及遞送外交文件的人，都攜帶着一包未經放大的底片，最秘密的函件，即在此底片之上。如遇危險，祇要打開底面的封條，曝露之後，文件的字跡就消滅於無形了。

整頁的文件，縮到最小的面積，往往祇有紐扣那麼大。

那實驗室的工作真可驚人。莫斯科附近有一家製造照相紙的工廠，其所有產品，完全供給這實驗室用，即此一點，可以表示這實驗室用人之多，化錢之大。

實驗室所有的職員，都是軍人，多數是在照相技術方面的各種專家。該室需用的器材，在情報總局，有最高的優先採辦權。蘇聯有若干研究所，專門研究照相問題與攝影新技術。

然而，在情報總局裡，常常因為神經緊張，掩蓋了那些有趣的工作。對於錯誤的懲罰之嚴，實令人恐懼，即使是小小的錯誤，也不會輕輕放鬆。少尉潘金科的事情，即爲一例。

某天下午，剛吃完中飯，克拉夫金科中校命令我們聚集在一間大辦公室裡，他宣佈情報總局局長伊里契夫的一個有關經管往來電報的潘金科的命令。

潘金科把一隻他認爲空的信封丟在字紙簍裡，以備焚化。字紙簍給拿出去在倒進焚化爐之前，工友發現信封裡有一張紙條，他細細一看原來是張密電稿，於是交給了主管人員。

潘金科活該倒霉，這是莫洛托夫給駐英大使梅思基的一張密電訓令。這是不常有的事，顯然莫洛托夫對於外交部的密電室不很信任，所以交給我們代他拍發。

局長認爲這是對工作的絕大疏忽，潘金科立刻撤職，交軍事法庭審辦。

潘金科當時也在場，面如死灰，我們雖都同情，但沒有什麼辦法。這種錯誤，誰都有可能。但是誰叫他碰到了莫洛托夫的電報，這還了得。

後來，我們暗暗討論潘金科將受何種處分，大家以爲一定會革去少尉職銜，送到前線『懲罪部隊』中去工作。

可是我們估計錯了這案子的嚴重性。

八天之後，克拉夫金科中校又召集了我們。他臉色灰白，抖抖的手指拿着那張命令，他宣讀道：

『前少尉潘金科，經軍事法庭判決，於今晨執行槍斃。』

七 德國兵快要打來了

六一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是當時在莫斯科的人所不能忘懷的日子。這是開始恐慌的第一天。

我在費爾雅埋頭於特種密碼技術的研究，像我的同伴一樣，對於戰事消息完全隔離。我們從報紙，收音機得到的報導，都有些不妙。但讀書，研究，體育訓練以及跑步等使我們忙碌得無片刻空閒。

進城的通行證簡直困難到萬分，由於偶然的機緣，我領到了一張，那天是十月十六日。因我完全跟外界隔離，那天所遭遇的種種，實在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我走出費爾雅的學校門口，恰好有輛卡車經過，我跳了上去。有兩個青年在車上談着。我坐到他們旁邊的時候，他們看着我的制服，就不再談話了。

「這幾天有些什麼消息？」我與他們攀談起來。我注意到他們很窘的面面相覷，就笑着說道：「我是學員，我們忙得連時事的發展都隔膜了。」

其中一位，顯然覺得跟我談話，沒有什麼危險，他說道：

「有什麼消息？有什麼消息？消息多得很。我們的工廠解散了。廠中委員想把保險箱裡的錢捲逃，可是給工人捉住，把他打得半死。人人都在逃難，但又不知到那兒去。聽說德國人差不多都要到莫斯科了。」

我很懷疑。時局固然不妙，然而決不至如此惡劣。可是，我周圍所看到的情勢，確乎證明局面是十分緊張的了。卡車走到一處，因為道路的擁擠，膠着無法前進，我就跳了下去。

街上滿是帶着包裹和箱籠行李的人。他們往各個方向奔跑，但不知道逃向何處。誰都盲目的奔逃而已。最奇怪的，乃是不平常的寂靜籠罩着一切，只聽見匆遽的脚步聲，造成了低沉的合奏。

我乘上了一輛前往母親住處的街車。車子裡早已擁擠不堪，滿處是箱子和包裹。好容易車子開到了高納雅廣場，我下車就衝在一個人的身上，此人頸子裡像項圈似的圍着一串香腸。在平常，這情形是會引人發笑的，可是那時誰都無心多看他一眼。

走了幾步，我碰到一個更奇怪的人。他好像在做夢，手裡拿着一盤烤子雞。他揀起一塊來給我吃。

『你吃一塊祝我的健康，』他說。『吃吧，因為什麼都沒有了。』

我接受了他，問他到底怎樣一回事。

『肉類合作商店和家禽合作商店都已搶光，』他說。『誰都逃難去了。』

我走到家，母親跟姊姊都在那裡。姊姊滿面淚痕。她所工作的科學研究所解散了。大門上貼了一張佈告，那可能是第二次大戰最令人慌張的一個文件。這佈告由莫斯科的蘇維埃主席具名，姊姊一字一字背給我聽：

『前線形勢嚴重，凡市民之無留居必要者，速離莫斯科。敵人已近城郊。』

莫斯科處處發生搶劫，派在各工廠的共黨委員都各自逃命，把預備發工資的錢捲入私囊，坐了汽車，往城外開去。可是路上擁擠萬分，車子像老牛似的勉強前進，很多給農民攔住搶劫。

工廠保險箱的被劫，使工人們都不名一文。他們原已艱窘度日，眼看沒了錢，糧食問題更加嚴重。於是闖到店舖裡，或偷或搶，這是維持他們自己和眷屬的唯一辦法。否則祇有挨餓。

各工廠平常使工人們畏懼的特務部門也突然不見了，這也是恐慌現象之一。若干特工人員落入工人之手，情形十分可怕。消息傳開，一些特工的首腦也就捲了金錢，溜之大吉。

莫斯科的生產機構，一切都突然陷於停頓。平常威風凜凜的那些主管人員，指導員，黨部書記，特務頭腦們大批失蹤，連同工人薪餉的毫無着落，使社會秩序大大紊亂。政府經過了一段猶豫的時期，發出嚴厲的

命令，維持秩序。幾名工廠負責人被槍決，以作例子。

消息傳到郊外，農民們組織了隊伍，阻止逃難的車子，用槍口對準着司機，勒劫所有的財物。後來，就有許多議論，詫異農民們從什麼地方得來這許多槍械。

莫斯科充滿着種種的搶劫和敲詐，都在暗中進行。有一個委員吞沒了工廠的工資，就有人以報告政治保安局爲威脅，喝令他不得聲張，把錢搶去了。搶劫盜賊的盜賊，再被另外的盜賊所搶劫，用同樣的威迫和要挾。

街車開得極慢。如果乘客抱怨，司機就咆哮起來：

「你再不閉口，我就把車子停在這裡！」

在一處，三輛卡車裝載了政治保安局的官員、桌椅、打字機等等東西，向郊外開去。一路爲人民所擲擻辱罵。在慌亂之中，人們對於特務的憤恨，更甚於憤恨德國人。他們記起了所受精神上的壓迫，身體上的苦刑，怨毒的種子，此刻都發作起來了。政治保安局的人也未嘗不知道。

我的姊姊瘦得多了。她的兩頰下陷。鐵路上顯然缺乏工人。科學研究所的人員被徵召去起卸火車的貨物，公務員、學生、甚至小學生，都派到了這種吃力的勞役。

酬報是一塊肥皂，或一兩磅麵粉或米。

「最令人痛恨的，」姊姊咬牙切齒地說，「人人得到了這種東西，都愉快非常。」

姊姊的正薪，加了延長工作的額外酬報，每月約七百羅布。可是戰時公債，捐稅，及其他種種東扣西折的名目，實際只能得到三百羅布。

我們討論逃難問題，我主張她們不走。看看公路上那種情形，我覺得擠在人堆裡逃難也是枉然的。至少目前有一間屋子住住，雖則這屋子也未必高明。

屋子裡亂七八糟堆着生火用的木柴，因為放在外面，一定會不翼而飛。爐灶裡出烟，牆壁十分污穢，原有油漆的地方，已處處剝落，掉了石灰的壁角裡露出了灰黑的木條。母親很抱歉地說，家裡僅有的食物，是一小片黑麵包。

我決定把所有的錢到黑市去給她們買些吃的東西。如果買不到，我想去搶，雖則身上這套制服有些不便。但好的決策，往往終止在設計的階段。

我後來回到費爾雅的時候，無線電部門正在毀壞器材。命令是非常斷然的：『凡貴重物品一律破壞。』這些大部分從國外買來的複雜而貴重的機器，都打得粉碎。其實大可以像校中首領們的汽車行李一樣，裝上火車帶走，但我們却遵照命令加以破壞。

我們走到車站，擠上了火車，後來到了伏拉狄米，我們奉當局之命集合。

『我曾經代表我們全體教官及學員籲請，』他說，『發武器給我們，把我們派到前線，保衛莫斯科。我們準備像其他的士兵一樣，願與首都共存亡。但上面說，你們有你們的工作。命令你們繼續學習，訓練成專門人材，而這種訓練祇能在後方的和平環境中進行。』

我們分了小組，命令要我們自己去找尋投宿的地方，到早晨再在指定的地點集合。

在伏拉狄米市區裡，我敲着一家的門，裡頭已擠滿了人。每家都一個樣子。難民、公務員、紅軍、政治保安局的人，還有游兵散勇已把伏拉狄米擠得水洩不通了。

後來，在市區以外的村子裡找到地方了，有兩位我們的官長早已投宿在那裡。一位老頭子歡迎我們，他

說他的兩個兒子都在紅軍裡服役，他和他的妻子和女兒。都願像接待兒子似的接待我們。他指指地板，這是我們的床位，我們也覺得心滿意足了。

這老頭子祇有馬鈴薯供給我們，我們堅持把錢算給他，同時從乾糧袋裡拿出麵包和糖，補充菲薄的晚餐。老人看見糖幾乎流出眼淚來。

「我們很久很久沒有看見糖了。你們真是我家的福星！」他興奮地說。

這一餐，我們有馬鈴薯和鹽，用茶過下肚子。吃完之後，老頭子問：

「德國人很近了嗎？」

我點點頭。「很近了——快到莫斯科。」

接着是沈默，隔了一會有一個同伴說道：

「倘使德國人打到這裡，你們準備逃走嗎？」

老人搖搖頭。他的老婆也同樣表示。「我們不能帶着田地逃難。」老頭子說。「我們不怕德國人。女兒

或許要走，但我們老的不準備走了。」

「但是，」我說，「你們不覺得害怕嗎？大家都知道德國人對於人命是毫不愛惜的。」

老人想了一想，他回答的話，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得啦，」他沒精打采地說，「倘使你恐懼什麼，也就不值得活下去了。我跟我的老婆，一生也經過得多了。我們覺得剩給我們的一切，已經非常有限了，所以也沒有什麼覺得可怕的。」

「德國人會殺人，搶劫和放火。」我的同伴說。

「是的，是的，說不定會這樣。但也不一定這樣。可是你祇要想一想，在戰前，多少像我這樣的農民給

消滅了，多少婦女孩子，爲了國家要糧食，使他們餓死。得啦，一切操在上帝手裡。或許上帝再會照顧我們一次。」

我們離開桌子的時候，那老農看着我們，從他的目光中，我們看到了俄國人民的忍耐與苦痛。從那天以後，我心中常常想——或許上帝會照顧他們。暴力和反抗似乎不再有什麼意義了。

八 紅 軍

前線的情形一天一天更趨惡劣。引以自豪的羅斯托夫也給德國人占領了，我們都覺得萬分沮喪絕望。這消息對於我尤其覺得尖銳，因爲我的叔叔伯伯和許多堂兄弟們仍舊生活在那裡。可是外祖母已過世了。如果她還在人間，她那仁慈的心，對於那些『沒有母親雨露的野花』，真不知會如何的苦痛。

失陷消息傳來之後，我們的首領把我們召集了攏來，用沈重的表情，把一份公文唸給我們聽。

『這是蘇維埃聯邦最高統帥史太林元師的命令。』他開始說。

他咳了一聲嗽，清了一下嗓子，我們都屏息靜聽。因爲從未有史太林的命令直接唸給我們聽過。

『放棄羅斯托夫，紅軍永遠沾辱了他們的旗幟。將領們有機會固守羅斯托夫，但他們沒有辦到。我已下令將負責的將領撤職降級。我們必須從敵人學習。爲了提高紅軍的紀律，我下令組織軍官的懲罰隊和士兵的懲罰營。這些懲罰部隊都開赴最前線，讓這些負罪的官兵，用鮮血來將功贖罪。』

『第一，』命令繼續這樣說，『我下令組織督戰隊，以政治保安局的忠實分子來組織，各配備以機關槍。這種督戰隊駐紮在戰志不旺的部隊後面，如果發現作戰不力或逡巡不進，立刻用機關槍掃射。』

『德國人組織了懲罰隊和督戰隊。我們必須同樣做，因爲德國人的紀律比我們高。然而，紅軍跟德國人

比較起來，我們有保衛祖國的崇高理想。紅軍是爲保衛正義的目標而作戰。爲了這種理想，必須有鐵的紀律。

『凡在懲罰隊中服務期滿的官兵，不再追究他們以往的過失，仍可恢復原級原職。督戰隊的人員必須慎選最可靠的官佐充任。』

史太林命令有一句嚴厲的結語：

『俄國人民在咒罵紅軍，因爲紅軍退却，丟下他們去做德國人的奴隸。』

接着這命令，俄國的報紙，廣播和電影，立刻展開鼓勵愛國的大規模運動。

局勢的嚴重和危險給強調着。長篇累牘的文章，充滿着感情的呼籲，坦白陳說祖國在極大的危機中。當時我雖沒有覺得，後來却發現那一時期，當局運用着一種新的宣傳技巧。

『共產主義』和『蘇維埃』等名詞不再提起了。一切都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擱在一邊。共產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也不再提起。一切都以『保衛祖國』爲主題。軍事英雄大被渲染，或者從墳墓裡掘出昔日的民族戰將。『俄國國土』一再的說到。到過北美，後來給大捧特捧的愛倫堡，他的名字暫時在俄國報紙上消失，因爲有人忽然想起愛倫堡不是俄國人。

報紙上的文筆，流行了坦白的新作家。例如政府贊揚的作家高巴托夫，就爲文描寫一個老婦人如何咒罵撤退的紅軍。

這種空前的坦白態度，給人民以印象，情形如何與已往不同了，現在都成了一家人了。俄國的傳統的舊風俗也復活了。還有俄國的民歌，俄國人的忍耐，俄國的常識，俄國的勇毅與自我犧牲，一切都在報紙上大大的強調着，而俄國英雄的勇敢故事，尤被大大的宣揚。

丟失羅斯托夫的顧立克元師降級爲少將。史太林命令中所提及的十位將軍，都一律革職。顧立克的名字突然自報上消失。後來我聽到他，他在國防部裡擔任着不重要的行政職務。

戰事持續下去就有許多被奪去兵權的將軍，在紅軍裡掛着空名。他們往往酗酒以自遣。葉夫斯鐵涅夫中將即爲典型。有一天早晨，我在福倫士街看見他喝得搖搖晃晃，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抖抖撇撇整理他頭上的波斯羊毛帽。憲兵惶惑地遠遠看着他。酒醉的軍官理應拘捕的，但將軍級的軍官他有特權，甚至可以槍殺普通士兵。

將軍的制服十分輝煌，而將軍是不准搭乘街車的。但因爲得到將軍的頭銜比得到汽車爲容易，所以很多將軍祇能走路，而他的下屬們却坐在電車或公共汽車裡。

『我們都不願走過福倫士街，高戈爾路或是國際街，因爲那裡走來走去的有很多很多的將軍和上校，我們行禮的手臂，簡直沒有機會放下來。戲院裡最近的位置是留給將軍們的，因爲不准他們坐在第六排以後的位置。』

這一切規定，目的都是增加高級將領的威望，可是美國和加拿大工人所住的家庭，都要比俄國將軍的住家高明得多。而國外工人住宅設備的完善，也非俄國將軍所想像得到的。

加拿大工人的老婆，無需爲了一個洋葱在長長的行列中排隊。可是一位俄國將軍的太太，得到一個洋葱就可引起無數人的羨慕和注意。這表示她是特權階級。

俄國將軍還常常有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威脅懸在面前。史太林有全權下此命令，而身爲將軍的人，失歡於史太林的機會特別多。

有一天，大家悚然地發現加里寧，蘇維埃聯邦的主席，意外地到了我們的情報總局來。我們知道他一定

有極重要的話要說，因為在俄國，祇有要人纔有言論的自由。

我們集合聽訓，儀式甚為簡單。甚至照例的介紹及恭維都省略了。加里寧發言的音調很低，坐在後面的人，簡直聽不清楚。

『紅軍在退却，』他說，『把俄國的城市和俄國的人民都丟在後面。俄國的土地從來不曾蒙過這樣的恥辱。我們的軍隊不如德國軍隊，我們的軍官不如德國軍官。我們對自己估計過高而對敵人估計過低。』

我們有些出乎意料。原以為這位政治局委員加里寧，一定以火爆熾烈的話來訓飭我們，但他顯然是一個悲觀沮喪的人。當然我們尚且不知道，加里寧所做出的態度，完全是蘇聯領袖故意在改變策略。他們發現了抽象的高調不足以鼓勵人民的愛國心，於是決定改變他們高壓的作風。他們裝出與人民同處患難的可憐樣子，使人民忘記了所受的苦難根本是殘暴獨裁制度所造成的。

加里寧說到後來，他的話似乎更加有些悽惻動人。

『目前患難中最惡劣的現象，』他先對四週看了一眼，然後接着說，『是我們的人民不知道將要如何的死去。他們不知道如何的犧牲生命。我並不是以政府地位說這句話，我是以一個傷心的普通俄國人民的地位來說的。可是我告訴你們，紅軍雖已暴露了弱點，但我們的黨將發揮力量，使俄國渡過難關。』

另外又有一次，我們集合了聽人誦讀一個對紅軍的『秘密命令。』那命令指出官兵在撤退的時候，把武器丟在戰場上，尤其是砲兵，爲了逃命，把大砲，白砲，迫擊砲等武器棄置不顧。此外，偷盜公物的案件，也成了平常的現象。

命令很乾脆：

『凡遺棄武器者，不必審問，就地槍決。偷盜公物者亦祇有一種懲處辦法——立刻執行死刑。本令須在紅

軍各部隊，各機關，各學校宣讀。」下面是最高統帥史太林的署名。

其後另外一個訓令，警告將領，凡猶豫逡巡而不立刻執行命令者，予以嚴重處分。史太林又命令，每一件武器，由專人負責，倘此人死亡，則責成其下一級的部屬。經管大礮的軍官，必須妥慎保衛，一如其保衛自己的生命。

命令說：「寧可死亡而保衛大礮，不應貪生而委棄它們。」

從這些極端的辦法和嚴厲的口吻，顯見丟棄武器之多而情形十分的嚴重。現在把大礮看得比人命更重。

史太林接着下令於兩星期內檢點所有的武器，立刻呈報，不得遲延。

守衛卡桑的總司令，曾經有過一個報告，使我們相當的驚異。這報告僅寥寥二三十字。我以無法相信的詫駭之情讀了幾遍，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伊凡諾夫少將對某一告假軍官發給額外配給品，余已下令將該伊凡諾夫槍決。」

我們大多數認識伊凡諾夫少將，至少見過的。他很得人心，慈祥和氣，絕無其他紅軍將領暴虐專橫的習氣。慈悲為懷的伊凡諾夫可能有此行為。真正活該倒楣，因為別人都會注意到額外的配給品，尤其像他的地位與聲望，更不會造成麻煩。外面暗暗流傳，說伊凡諾夫犯了更大的事故，所謂濫發公物不過作為藉口而已，但這樣小題大做，這種猜測和流言是在所難免的。

如果蘇維埃意欲利用伊凡諾夫的死，來懲儆濫耗或偷盜公物，那末結果是非常成功的。這立刻影響到我們這般學員，我們不得不特別留心到各人自己的箱子。我們大家都有仇人，他們羨慕着我們在情報總局做事的優越位置，現在機會來了，只要在箱子裡放上一二件軍用公物，就可舉發。我往往一天要檢點箱子好幾次之多。

在學員中間，有一位杜爾金中尉，在軍隊裡當政治指導員之前，是個鄉村教師。他後來被派到墨西哥，在一個駐墨使館武官處的地下工作團體裡從事秘密任務。

杜爾金在軍隊裡頗著卓越成績。他在受傷之前，憑着功勳，升到礮兵連的連長，紅軍在前線的情形，他知道得十分清楚，他是常常跟我閒談的。

他曾經告訴我，某一次全線退却，而重礮要有秩序地撤退最爲困難。別的礮隊已有丟棄武器的情形，而杜爾金的隊伍則不然。甚至一隊德國兵遠遠衝來的時候，他的隊伍仍舊隱藏在樹林裡，向敵兵轟擊。可是，這樣給德國人發現了他們的所在地，就受到德國礮隊一陣兇狠的轟擊。

撤退的路線，是到聶伯爾河邊，杜爾金帶着殘餘的部下退到那裡，已有不少紅軍的官兵在那裡進退維谷地徘徊着。一架業已毀壞的橋，常在轟炸與掃射之下。祇有極精游泳技術的人，方能遊過河去，這使大部分的人，無法嘗試，而受傷的人更屬休想。

杜爾金一臂受了礮彈破片傷，身體十分虛弱。兩公里外還有一頂橋，但誰也不知道是否仍未破壞。而且他自己很懷疑，流了那麼多血，是否能走那麼遠的路程。結果他決定一隻膀子靠近破橋，慢慢遊泳過去。中途尚有橋脚和浮在水面的殘破橋梁可資休息。德國空軍自空中攻擊是十分準確的，但他想碰碰運氣看。

一吋一吋地挨着前進，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杜爾金告訴我，當他游到一根橋脚邊的時候，早已擁滿了人，祇有給他們推開。他們只顧自己，對他受傷的膀子毫不憐惜。

一次，一根炸彎了的橋樑救了他命，否則他絕不能游到前面的橋脚。或許冷水有給他刺激的力量，好容易掙扎到了對岸，他看見若干傷兵給擡進一個大木棚裡。杜爾金蹣跚地走了進去，可是裡面的情形太壞，氣味令人不能忍受，于是又走了出來，寧願在冷空氣裡發抖。他發現一百碼以外，有一叢樹林，就挨過去躺着。

休息。剛剛輪定，一個炸彈炸中了那木棚，連棚帶人炸得血肉紛飛。

這次渡河，後來在紅軍之中一致認為羞恥之舉，使俄軍的紀律喪失淨盡，造成狼狽的敗北。一般人的情緒對此異常厭鄙，甚至有的同學對杜爾金竟公開蔑視，雖則他當時還受了傷。

杜爾金的故事，證明即使是十分英勇壯烈的戰績，倘與黨部的好惡不合，也是會給一筆勾銷的。黨部似在儘量的利用機會，打擊軍隊。

X X X X X

當德國人接近格拉斯城的時候，黨委員會實行着殘酷徹底的手段。凡是當地居民，到德國人佔領之後，可能與德國人合作的嫌疑者，都給列入一張詳細的名單。所謂嫌疑，也不過憑着一二黨員匆促的測度。當該城準備撤退的時候，政治保安隊的武裝人員就按單挨家尋索。先問姓，後問名。如果姓名與單上所列者符合，當着他家屬的面，立刻槍殺。

這樣不知殺了多少人，惟據半官方的統計，處決『潛伏的奸徒』數千人。

政治保安局的首領對這種暴行，大為讚美。凡是將要撤退的城市，一律如法泡製。『緊急應變』一個名詞成了黨員間談話的口頭禪。

在把姓名列入黑名單之前，絕不作任何調查。如果你不是黨員，你對於某一人的懷疑，就足以置那人於死地，我有一次聽見一位黨員，老老實實的說，這『真是肅清討厭份子的絕好機會』。

至於監獄和集中營，如果時間允許，則把他們搬遷。否則就集體屠殺，以防他們可能與敵人合作。

蘇維埃聯邦中的日爾曼自治共和國，因恐為德國人所利用，遂將全體人民撤退搬遷，所用手段的殘酷，簡直令人不能相信，雖則他們也是蘇聯的公民。政府不願他們為德國所利用，就下令在政治保安隊監視之下

，執行全民撤退。

這些不幸的人民，祇有二十四小時的準備時間，收拾他們可以攜帶的物件。排了長長的隊伍，走到附近的火車站去，老弱與病人，由各家自行照顧。

鄉村裡簡直撤退得闕無一人。那些幾天無人擠奶和餵食的母牛，引頸哀鳴，直到聲嘶力竭而死。當德軍佔領區的難民，首批逃入這個共和國境內的時候，簡直不能發現任何有生命的東西。這些難民進去之後，就在這個共和國城市村落裡定居下來，所有房舍什物都歸他們所有。

其後在契琴諾·因各虛和克里米·韃靼兩個『自治』共和國，也同樣實行這種全民移居的慘劇。

有時，德國人並不就來佔領，甚至始終沒有來，在殘破之區移殖萬萬千的難民，結果僅使政府添了無窮無盡的麻煩。必須餵養他們，否則德國人果真來時，成了他們絕妙的宣傳資料。所以不能不確定緊急救濟辦法，給這些爲了移殖而一無所有的共和國人民準備各種全國大感缺乏的供應品。

在情報總局裡，若干官長都暗暗承認這種措施的荒謬。有一次，紅軍情報人員在局子裡清理檔案，我注意到他們特別把有關『緊急執行』與移殖共和國人民的卷宗銷毀了。

可是共產黨的說教，無所不至而效力甚大，當時我竟衷心地相信，史太林這一類血腥的命令，並不是俄國歷史上的污點，而是證明史太林權力之偉大。

史太林利用紅軍，以及紅軍裡的政治保安人員，竟能毀滅那些共和國，正像他統治它們一樣的有效力。

九 『嫌疑者』的肅除

我回到莫斯科的時候，母親和姊姊度過了平常人所難於度過的種種苦難。可是她們却生存着，一九四二

年回到了那原住的小房間裡。她們都比年齡要衰老，尤其母親的形容，使我覺得傷心。她的神經，顯得異常疲倦，她的敏捷已經消失了。同時，她顯然挨着饑餓。

姊姊所服務的科學研究所，匆忙地撤退到烏拉爾的西佛特洛夫斯克，她無可奈何地帶了母親同去。無窮無盡的苦難，使若干人都死在半途。寒冷，風雨，和疾病又奪去了不少生命，倖存者精神的沮喪為空前所未有。後來科學研究所重又遷回了莫斯科。

母親不再批評蘇維埃當局。但她常常說，俄國必須征服德國人。

『到了那時，謝謝上帝，』她往往說，『情形也許會好些了。』

其時莫斯科正給恐怖籠罩着。

史太林的語氣之間，很贊成所謂對付『政治嫌疑者』的嚴厲辦法，全國各地都有白天在辦公室裡捕人的事。這是出之於故意，使它對一般人發生心理上的影響，而可怕的耳語從來不會不發生效力的。

這為史太林所親自鼓勵的清除異己運動，使人人自危，正常的生活隨時有受到威脅的可能。

早在戰事發生之前，政治局裡就公開談論到『嫌疑者』的肅清。卡格諾微支以政治局委員們從未聽見過的罪愆陷害鐵路運輸部長安特烈夫。說他與反對黨有關係，雖則這是很久以前，早成過去的了。安特烈夫的位置立刻換上了卡格諾微支。最近我自報紙讀悉，安特烈夫重又得到史太林的寵愛，不知卡格諾微支如何下落，倒是值得注意的。

史太林這種瘋狂的追逐『嫌疑者』，其最大的危險是在那些下級的政治人員，舉發政敵以謀進升，證據既沒有十二分的重要性，構詞陷害，自然不是困難的事情。在蘇聯，不論過去或現在，從嫌疑到集中營或槍斃間的距離是不並遙遠的。

現在回想起來，肅清「嫌疑者」的辦法，對蘇聯禍害之大，更甚於一群間諜或奸細。間諜和奸細，無論怎樣狡猾，他們所辦不到的事情，自私自利的黨領袖和官僚却易如反掌。至少有三件案子，我知道三位發電機工程師，因為有人密告他們「嫌疑」而被斥革。而三人的位置，即由他們的助手接替，以酬謝他密告的功績。

這種情形，對於青年的心理更有無窮影響。大家看得很明白，凡是安分守己的老實人，最易成爲被排擠的犧牲者。同時也很顯然的，一個青年工作者，愈能舉發別人，愈加得到上面的贊賞，于是有了雙重的機會，一方面得到地位的晉升，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忠於黨國。

接連有四年，所謂追逐「人民的敵人」盛行到瘋狂的境地。昨天舉發別人的，今天又爲第三者所舉發。政治局的委員斯丹諾夫在一次黨代表大會中竟至建議，我們必需把敵人分成三類：「敵人，次要的敵人，不顯著的敵人。」

大家都留意着身邊的敵人。黨書記們如坐針氈。情形發展到可笑的程度，蘇維埃的區域委員會，縣委員會的委員以及大部分的黨員，輪流地成爲嫌疑別人或被嫌疑的對象。起初你去嫌疑別人，等到你的威望建立之後。就一定有人來打擊你了。

有一位我們所欽佩的講師，他的遭遇可以作典型的例子。有一天他發表了一些意見，這意見可以從兩方面去加以解釋。壞的方面的解釋，立刻被人報告了校長，校長轉報了政治保安局。爭取時間是重要的，倘使在校長報告之前，有人先去報告了政治保安局，則校長就有庇護這講師的嫌疑。所以那一次，校長竟無暇向那講師調查明白，那講師就當着我們的面，在講堂上給捉去了。後來有人告訴我，那講師給釋放了，但永遠沒有回到學院來。

在那些日子，有人敲門，足使你膽戰心驚。你心中第一個問題：『我幹錯了什麼事？』如果找不到答案

，你就問你第二個問題：『我給告發了什麼罪狀？』當然也是找不到答案的。

政治保安局成了一般人的怨恨之府——他們的制帽有淺藍的帽頂，成了恐怖與鄙夷的表徵。人們在後面暗暗咒罵他們：『匈奴！韃靼！兇手！』

可是，別人愈是怨恨，他們從卑鄙的工作中，似乎愈能得到趣味。史太林不斷暗示，他們非常贊許政治保安局與人民的敵意，很顯然的，政治保安局的人員愈被人民怨恨，他們搜索地下分子時，愈有效率。工人有了不滿的表示，政治保安隊的特務走狗，自然不表同情，而很快很嚴厲地就鎮壓下去了。

政治保安隊的人員，都選擇粗橫，祇認識暴力而祇會運用暴力的人。一旦落入了他們的魔掌，就無法探聽到下文。他們以『失蹤』為對付人民的最大武器。倘使你的兄弟被捕了，你去探聽的時候，他的名字往往不在記錄之上。

『你弄錯了。』那特務人員一定這樣對你說，冷冷地看你一眼，警告你自己留神。

嫌疑狂幾乎控制了人們的每一行動。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當莫斯科危急的時候，我們撤遷到一個臨時校舍去。那是一所與外界差不多完全隔離的林業學校，在森林之中。這學校所雇用的女性清潔夫，住在數哩以外的鄉村裡。這鄉村距莫斯科有一千公里，甚至距火車站也非常遙遠。其中的人口，幾全屬文盲，愚魯而窮苦。可是有一天，我們的首領艾蕭夫上校，召集了我們，很嚴肅地警告我們，對於那些清潔女工要特別留意，因為他根據報告，其中或許有若干『間諜』與『分化份子』。

從此以後，我們暗暗懷疑着那些窮苦的老太婆。甚至在自修的時候，都把教室鎖上。現在想來，覺得不值一笑，但那時是深信不疑的。

我們有一次——僅有的一次——到過村莊去。我們所得的印象，真是傷心慘目。

我們到那裡，恰好是吃飯時間，目睹着集體農場的農民，排着隊，擠在一間醜陋的食堂裡，等待一塊像拳頭大的麵包。隊伍一直排到一間充斥着煤烟的小屋裡。我們聽見有爭吵的聲音。因為有人越過了隊伍，而那發麵包的不肯發給他。

排過了領麵包的隊伍，再去排另一個隊，領取一木碗泥漿似的湯。這種『湯』和麵包，足使一般人起而反抗的了。

我想到我們在總局裡抱怨伙食的不良，此時真覺得內心慚愧。比起了這般農民，我們所吃的，簡直成了奢侈階級。我也是農家出身的，對於強迫人類，生活得離禽獸不遠，心中不禁起了極大的忿怒。但，當怒火上升的時候，立刻給平素所受的訓練壓抑下去了，對於蘇維埃制度的任何現象，不准我們用批評的目光去觀察。我一點沒有夢想到，世界上竟有國家，對於這些不平之事，可以自由發表演論，而不必恐懼集中營或死刑。

共產黨的訓練，教導我們看見悲慘現象的時候，必須想到資本主義下的農民，生活還要惡劣。

我們在學校的學員，也常常挨餓。我們常吃豆湯，有時一天三餐，毫無變化，也沒有別的饌肴。流言說艾蕭夫上校和他的朋友克里俞可委員，領到我們的食品不在少數，但大部分給他們換酒吃了。他們的營養都很好，而大家知道他們常常舉行宴會。他們當然從什麼地方獲得不少酒，而代價呢？伏特加是不易買到的，大部分是物物交換而來。

在都市裡，例如莫斯科，蘇維埃政府很奇怪地暗暗鼓勵着黑市。我猜不出理由何在，但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確是事實。

只准官長前往購買東西的店子，當它們發售伏特加酒的時候，行列總是排得很長，因為他們知道，伏特

加可以交換麵包，肥皂，牛奶等等東西。原來購買的人，很少自欲的。官長們把買來的伏特加交給妻子，到黑市去換取各種物品。

人人恐懼着特務，而他們最兇狠的武器，是削減你的食物配給。而他們所得最大酬報——也就是額外配給。

俄國的人民，固然挨着餓，像狗似的爭奪着麵包皮，但也有令人觸目驚心的對照。安娜的兄弟顧塞夫曾在柴奇工廠經管過伙食。柴奇是莫斯科一家很大的飛機工廠，專造各種試驗性的飛機。

有一回，他常去領取食品的地方突然缺貨。因為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工廠，而工人無食物不足以過活，若干要人就特許他們到政府物資供應處去領取。

顧塞夫奉命帶了卡車司機，前往公路上的第十號去洽領。這地址似乎是錯誤的，因為那一段簡直很少房屋，更沒有倉庫了。可是車子開到那裡發現一所木房子。上面懸有十號的門牌。顧塞夫敲門，就有一位帶槍的士兵開了門。他要求顧塞夫和司機拿出證件來。細細審閱了文件之後，士兵就指着一條狹窄而幾乎不能辨認的小路，那小路一直通到樹林裡去。

『沿着這條路開過去，一直到有人來阻止你。』他說。

他們就把卡車往樹林開去，大約走了四分之一哩的土路，到了一處，以鐵絲網為樊籬，門口的武裝衛士揮手叫他們停車。

查閱了他們的文件之後，那人又打電話到莫斯科的機關裡加以證實，然後開門讓他們進去。

這政府物資供應處是秘密的，但驚人地廣大，當他們看見四面堆積的食品，眼睛都幾乎睜了出來。大堆大堆的烟薰魚，成干的薰火腿，糖和麵粉包堆得像小山，各式各樣的罐頭，還有許許多多以噸計算

的，顧塞夫和司機但聞其名而不會嘗過的東西。倉庫之大，內容之豐富，似乎把整個俄國的財富都搬到這裡來了。

後來顧塞夫告訴我，東西如此之多，若說圍籬之外，就有人民挨着餓，簡直令人難於相信。那倉庫管理員看見了顧塞夫臉上的表情，顯然很覺得有趣。

『你怎麼樣？』他高聲笑。『今天肚子不餓嗎？』

顧塞夫呆呆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啞啞地問道：

『你是說……我們可以吃一點嗎？』

『儘你吃，』他指着四周圍的東西，接着很正經地說，『祇能在這裡吃，除了公文上所開列的東西以外，都不能帶出去。』

顧塞夫和司機有些喜出望外，數年來第一次的開懷大嚼。當他們動手裝車的時候，顧塞夫有些不舒服了。他的胃不習慣於如此慷慨地接受款待。

管理員看他靠在卡車上，作噁嘔吐，不禁放聲大笑。

同時，在這一區的「平民」，每天祇得到一小塊麵包，再把它分成數份，俾能度過一天。在饑饉飢腸的狀態之下，這需要極強的意志以克服這種誘惑。有的人頗能忍耐，有的人早上就把一塊麵包吃光，讓其餘的時間挨餓。有的人寅吃卯糧，到月終的幾天祇有空着肚子過日子。

麵包當然可以從黑市買到的。白麵包一百廿羅布一磅，黑麵包一百羅布一磅。然而這決非一般工人力量所及，他們最多也不過三百羅布一月的工錢。我看見許多工人就住在工廠裡，因為沒有力氣來回的走路。

小孩根本不算一回事。在營養不足的情形之下，像蒼蠅似的自生自滅。

同時，在那些饑餓的歲月，現在仍舊如此，蘇維埃官僚之濫費公款，也是值得一提的。他們要升到一個有資格參與宴會的地位，中間要經歷極長的時間。於是一個小小的題目，就可用來作為宴會的藉口。例如縣黨部書記的生日，就可以大開華宴。

在戰時，我從報上談到許多政府宴會的描寫，每當外國的軍政要人，如邱吉爾，羅斯福之類前來訪問，必款之以盛筵，上級官僚與下級官僚的行爲，如出一轍。浪費的宴會是官僚們的特權，而窗子外面就有老百姓在挨餓！

自上至下，包括地方的許多委員會書記及委員之流，他們不僅飲食取之於公，連家裡的傢具都是公家出錢買的。

俄國從來沒有供養過這樣一個寄生階級。他們在社會上形成一個偽善腐化的階層，以人民的汗血供給他們揮霍。無論你對外如何的宣傳，這種人民目前總是生活在極度的貧乏饑寒之中。

這些人民，也是現代俄國的最多數大眾，爲了一小塊麵包就得排上半天的隊。衣服不過是些破布。更惡劣的，他們沒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官僚們却給他們的太太，從外國買進裝飾品來。

莫斯科官場中曾經發生過一個笑話，有一位重要書記的太太，某次出席大宴會穿了一件拖地的長袍。這件衣服是他丈夫因公赴倫敦帶回來的。當然化了不少錢，而且也確乎美麗。不幸的是，席間有人識別，原來這是一件睡衣！

戰時美國會有許多食品送到俄國來，但一般老百姓連看都沒有看到。大部份分配給各級的官僚。美國的接濟，就如此地幫助了特權階級，在戰爭期間，並沒有吃到苦頭。

史太林格勒之役以後，我目睹一位將軍宴客，桌上放滿各式的美國罐頭，伏特加酒，和調製的饌肴。十

個俄國家庭可以吃一個月的東西，給一小團體腦滿腸肥的客人，一餐都吃完了。而且最令人傷心的，這般人自己深信有此享受的特權。他們並沒有神經病。人民的苦痛是不在他們心上的。

蘇維埃制度之能維持不墜，其關鍵就在這裡。

大小官僚群絕對忠於蘇維埃，因為這樣就有吃有喝，有家庭，有宴會，也有享受。大批的軍隊也是如此，因為軍隊裡吃得好。當局勢危急的時候，機警的政府，使前線的配給，好到無以復加，於是在後方的部隊也頻頻要求調到前線去。

在民主國家，決不會相信控制食物是一個絕大力量。但若政府對於批評當局者或不納租稅者，以減少你家庭的食物為懲罰，那麼你們也不會等閒視之了。

此外還有別的特權階級如青年團。上面，據我估計，約有五百萬共產黨員。我遇見的許多美國和加拿大人，他們似乎覺得凡是俄國人都是共產黨。其實不然。因為黨員的特權以及晉升高級位置的機會，追求者甚多，但並不是容易得到的。我進青年團，因需三個黨員的簽字，耽擱了兩年方把手續辦完。

黨員對於申請入黨的新黨員，往往不願簽字介紹，因為介紹的新黨員日後倘有不安行動，必須連帶受累。給我簽字的那三位，我不知他們後來遭遇怎樣的處分，想到此事，令人戰慄。

進黨有三個階段。第一步是同情者，第二步是候補黨員，第三步方為正式黨員。察看是異常細密的，從一個階段跳到另一個階段，都要經過當局者縝密的考慮。由此，你可瞭解五百萬黨員如何成了堅決擁護蘇維埃制度的忠實分子，他們享有特權，有特別的配給，如果失歡於上層，就有死亡及受難的恐怖。

桎梏俄國人民，另外還有一條鋼鍊，就是那殘酷而無所不在的政治保安局及其龐大的特務網。在政治保安局存在的一天，決沒有陰謀推翻蘇維埃的可能。原因很簡單。大家的思想早為食物所占據，想望着更多的

配給，而擔心配給的被削減，人人知道供給政治保安局情報即等於享受特權。

假使有兩個人密謀反叛，很可能其中的一人，就想到向政治保安局去報告另一人。倘使那陰謀的範圍大些，其中一定有人轉到念頭，覺得陰謀終究不會成功的，他出賣了朋友或許可以換取一官半職。

一直到最上層都是如此，倘使有人在史太林面前把手插在口袋裡，他就有行刺的嫌疑，立刻可以槍斃。站在史太林的背後也是如此。

X X X X X

我回到莫斯科，發現很少舊友留在那裡。多數到了前線去。許多我所熟悉的人，形貌改變得幾乎無法認識。有人竟不客氣的責難我故意不理他們。有的似乎對於我的制服發生誠懼之心，我跟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用簡單的字句答復我，患患離開了。『猜疑』的毛病，傳播極廣，可靠的友誼已不再存在了。

在母親的住處，情形也不見愉快，屋子的污穢，她們身上的衣服都發出汗酸的氣味，因為沒有肥皂洗滌。坐到桌上吃飯的時候，祇有一碗湯，那味道使我無法下咽。

姊姊笑了一聲，對母親道：

『你當然知道，他在那裡比我們吃得好。』

母親恐怕我不悅，沒法用別的話岔開去，可是我絕不介懷，因為她們骨瘦如柴的情形，早已說明了整個故事。我問她們要不要把我的湯分了吃掉，她們立刻都伸手過來。

我去參觀了建築學院，糧食缺乏，使教師們受了極大影響。他們沒有油，湯稀薄得有如清水。他們瘦得令人不能認識。尤其是一位繪圖設計的教師，他瘦得成了一架骷髏，他老了，他已走進了『老人階級』，對於蘇聯的用處業已消失。我們知道他正給有計劃地削減糧食。這種削減乃是無法可想的向例如此。數月之後，我鬆了一口氣，聽說這老人死了。

十 間 諜 中 心

軍事情報也歸情報總局兼辦。經過我手的電報，有軍事的，也有非軍事的。其間諜網之狡獪，往往令我
不勝驚奇。

俄國の間諜網，至少比別國的多一種便宜之處。就是它的絕對殘酷。殺人是合法武器，官面堂皇的駐外
使館，做種種陰謀詭計的事情，乃是日常所固定的工作。

舉例說，帶着發報機潛至德國後方的女間諜，她們與前線的參謀機構有直接接觸，刺探軍隊的調動，軍
火貯藏的地點等等，這固然重要，而她們更重要的任務為監視地下分子的活動。

大部分的地下分子，潛居於敵方的森林之中，從事破壞鐵道，炸毀橋梁，割斷電話電報線交通，把德國
軍隊強弱的動態報告莫斯科。這班勇敢的俄國人，連日常的配給食物都斷了來源，常常在饑餓的邊緣。

在別的盟國，總有種種方法接濟這種敵後遊擊人員，如夜間用飛機投擲供應品等等。可是莫斯科是不幹
的。

『投擲糧食或軍火給他們，』我們的首領解釋給我們聽，『他們因此就躲躲藏藏不肯出去活動了。倘使他們
感到饑餓，他們就會冒險去襲劫德國人的倉庫，而當他們彈藥將要告竭的時候，也就會去襲劫德國人的軍
火了。』

對於這般地下人員，在敵後作孤獨無援、凶多吉少的鬭爭，莫斯科全無感激憫惜之意，暗暗讓他們餓死
，讓他們缺乏彈藥及醫藥而被淘汰，而把這些人稱譽為英雄，向海外大大宣傳他們不怕死的精神。

經過那些女間諜，情報總局對於地下游擊分子的行動，知道得十分清楚。

在白俄羅斯的德軍占領區裡，有一般秘密工作人員。某次給他們首領一個詳細的指示電報。這個指令牽涉到一位醫生，這醫生是俄國人，表面上與德軍合作，實際是蘇維埃的秘密工作人員。

那醫生在一千德兵的軍營裡當醫生。情報總局以正經的口吻訓令他用毒藥放在德國兵的飯食裡，毒死他們愈多愈好。電報是發給一位地下工作的領導者，命令他轉達醫生，並且說：

『毒藥已着飛機投擲。收到後即復。』

隔不到幾天，又給那領導者一個電報，祝賀他下毒工作的成功，並且命令他幫助那醫生逃走。

克里姆林宮絕對沒有人道與道德的觀念。如果在中東散佈虎烈拉，能使英國受極大的惡劣影響，不論俄國跟英國在作戰與否，我可以斷定俄國必然會採用。克里姆林所擔心者此舉或許會被人發覺為俄國所為。死掉數千數萬人民，則克里姆林絕不會動心。

一九四二年有一天，總局的飯廳裡出現了一位極漂亮的姑娘，簡直無人不感動心。她的穿戴，完全是外國貨，美麗而大方。頭髮金黃，膚色白嫩，體態均勻。常帶着可愛的笑容。表情顯得一派天真。俄國話說得很牽強。

我們自然切切私語議論她，立刻知道她是從美國暫時回來的女間諜。九月以後，我們就不再看見她，大約她又到美國去了。

情報總局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外國專家——法、英、美、德、保加利亞、土耳其、波斯、中國、日本等等都有。其中大部分早已入了蘇聯籍。工作得十分熱心，都很可靠。多數為共產國際所雇用，他們在本國就當共產黨員。在報導組工作者較多。若干最可靠的甚至參加行動組的工作，在外充當間諜。我很驚訝為什麼外國人如此可靠，他們說都是經過試驗而有卓越的成績。

『二名外國人，給俄國的幫助，往往抵到一百個本國人，即使最有訓練的俄國人也不如他們。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知道得特別清楚。』熟悉情形的人這樣告訴我。

外國工作人員，同我們一樣，受到嚴密監視。他們的勤於工作，簡直令人詫異。我們的外國語，主要是由外國人教的。在戰時，德國人工作得最爲勤勞，日夜不停。我們對於他們的工作熱忱往往引爲笑談，但同時也欽佩他們。

我深信他們都是他們本國的共產黨員。全世界的共產黨員，除了忠誠於蘇俄之外，別無效忠的對象。我在加拿大揭破的間諜陰謀，即爲明證，甚至加拿大的國會議員，也有人充當蘇聯的秘密間諜。

爲了這個原因，我覺得任何犧牲，縱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祇要讓全世界瞭解，任何國家都不能以寬大態度去對付共產黨。他們不講道義。也沒有人道主義去約束他們的作風。他們是敵人，他們的工作，並不效忠於他們頭上所飄揚的國旗。他們祇論目的，不擇手段，那目的就是推廣蘇維埃思想。

如果不信，終必自食惡果。

蘇聯與外國大學交換留學生，又是蘇俄培植間諜的另一巧妙方法。使未來的青年間諜直接在外國受訓，將來以外交任務爲掩護，從事他們的間諜工作。

有一天，我收到一個要我譯成密碼的電報，使我更正確地瞭解了所謂『交換學生』所包含的真正作用。這電報是訓令紐約的一個監督，要他剴切教導那裡的蘇聯留學生，表面上務必做出一個普通留學生的樣子，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能承認與情報組織有關。

『必須一再向他們表明此意，』那電報中說，『他們的根本目的爲吸收外國語言文字的知識，以及明白所在國人民的性格及其習俗。將來對於他們做情報工作必大有用處。』

我常常奇怪美國和加拿大報紙的天真，它們的社評，大大宣傳蘇聯與西洋國家交換留學生的益處。它們說這可以增加國際友誼及互相瞭解。在我們俄國人看來，覺得這種意見實屬天真可笑，俄國派遣留學生的唯一目的，為訓練未來的間諜，使他們先行熟悉工作所在地的環境而已。

戰時，有一個派在德國的間諜，化名為『馬爾』。莫斯科懷疑他與德國的特務有勾結。易言之，他在玩着兩面的秘密任務。懷疑的起因，由於某一次『馬爾』報告盟軍轟炸柏林的損失，有不情不實之處。

『馬爾』答復莫斯科的詢問，那電報是我經手翻譯的：

『什麼損失？我沒有發表損失，上星期盟軍飛機也不會來空襲過。』

這使莫斯科發生懷疑了，因為當時轟炸之後，盟機攝有被炸地點尚有黑煙冒起的照片。

『馬爾』以『我的奮鬥』一書為密碼的底本。我通常所用的密碼，是以數字來代替字母的，這有無數的變化。譬如說，在這一星期，以『十二』來代替『M』。下星期也許變成『七』了。『我的奮鬥』的密碼，在我所用的密碼中，也許是最困難的一種，但『馬爾』的設想甚為巧妙，因為這本書在德國，乃家家戶戶所必備，而不會引起什麼懷疑。他祇要告訴我們某頁某行第幾個字，因為我們早已知道所指者是那一本書，翻譯他的電報，簡直等於沙裡淘金。

『馬爾』每一次打電報來的時候，我們的領班拉古鐵諾夫中校皺着眉頭，遞給我們，說道：

『聶斯太普（德國特務）的電報又來了。』

可是，莫斯科的懷疑，對『馬爾』絲毫不露痕迹，也不再指派他任何新任務。他仍時時有消息來，給他的錢都秘密放在某處，叫他自己去拿。每次都換一個地方。如果『馬爾』果真私通德國特務，那放錢的人不

致爲『馬爾』所陷害。有一次，給了他一個電報，指定他到某一隱藏之處去拿錢，這電報引出了有趣的結果。

『馬爾』立刻復電抱怨，他說指定的那所房屋早已給盟軍飛機炸毀了。我們就向主管建議，請他電告『馬爾』其中必有錯誤，因爲『馬爾』上次的報告，明說柏林並未遭受盟機轟炸的損失。主管大笑，他說他另有辦法。當然是設計將『馬爾』永遠肅除。

他叫我把我紅軍俘獲的德軍詳情電告『馬爾』，命令他在德國散佈謠言。納粹對於散佈謠言，必處以死刑，而且執行得很嚴格的。

『馬爾』回電說，散播謠言是極危險的工作，但他想竭力做去，但是爲了這額外的冒險，他要求另外給以金錢。

主管看到這電報時咒罵了一聲，繼之以發笑：

『這倒是傷腦筋的！』但『馬爾』所要求的錢却終於得到了。

X X X X

多半因爲我略懂德文，所以我經手的電報，大都是德國與瑞士方面的。

瑞士是對德間諜工作的重要中心，許多在德秘密工作人員的電訊，都是越過邊境，從瑞士發來。後來，派在瑞士的重要人員，西雪，露茜，和亞歷山大給破案了。不知道瑞士政府對這幾個人怎樣處置的，因爲他們之不利英美，並不下於不利於德國。

派在哈爾濱的有一位『阿爾勃脫』，他老是來電要錢。莫斯科總是這樣答復他：

『你得到了情報，就可以得到錢。』

後來，這位阿爾勃脫克服了他對日本人的恐懼，竟出去刺探消息了。他發來的情報說，哈爾濱車站運到了許多水箱，一師團日本兵即將開到。莫斯科立刻答復他，這種情報僅為表面的觀察，不中用。

阿爾勃脫繼續發來一些報告，仍舊是偶然所見或道聽途說的東西。他一再的要錢，可是有趣的是，雖不完全照他的要求，但莫斯科也應酬他一些，雖則他的情報認為毫無用處。或許莫斯科有一個政策，故意貶低那些情報的價值，使間諜們不致希望高的酬報。同時，或許可以藉此刺激他們工作得更為努力。

這樣那樣的情報，從千千萬萬的間諜，每天報告到莫斯科，我相信現在還是如此。莫斯科對於他們，總是要求着最大的工作效率，任何冒險在莫斯科看來總是算不得一回事。下面一段話，可以代表莫斯科對於間諜們的態度：

『任何間諜，我們都並不認為有特殊價值，並不認為可以忍受他的素餐尸位。如果我們爲了達成某種任務而擔心失去一個工作人員，那末就很難獲得有價值的成果了。我們有許多間諜，如果甲做不到，自有乙願意做的。』

X

X

X

X

在我們的辦公室裡，常常收到中國來的電報。在中國的工作人員顯然熱心於互相報告劣跡，我們所經手的電報，其中很多令人討厭的瑣屑事情。

中國的環境很適宜於同事間的傾軋。因爲他們在那裡，除了必要之外，生活是與中國人民相隔絕的。重慶很少娛樂場所，如電影院，戲院及音樂廳等。俄國工作人員有事無事借題舉行宴會，結果總是喝酒爭吵。因爲那裡天氣太熱，帶家眷者極少。這就容易影響同事間的關係，而造成若干糾紛，爲了與中國女人的不名譽關係而召回大使館人員的事，也就數見不鮮。

蘇聯人與當地中國人民的關係，從電報去判斷，似乎並不良好。然而有不少人請求繼續留在中國，大半因為在那裡可以自由購買英美貨物，拿來販賣賺錢。

在這方面，蒙古發生了一個特殊現象。運到那裡銷售的蘇聯貨物，却在國內無法買到，因為都是特別為出口而製造的東西。但在蒙古，有錢購買這種奢侈品的，却祇有俄國人。因此蘇聯對蒙古的出品，有相當部分為蘇聯人民用蘇聯金錢購買了去。政治保安局的調查發覺了這種現象，無需專家的計算，就知道這種貿易對國家不利。于是就訂了條例，對此事加以限制。

苗爾尼高夫上校，蘇聯在華的情報網即為其所組織，他是出名的密電碼專家，從國外回到莫斯科，于是我，以及安其洛夫和羅曼諾夫三人，得到允許去訪問他。

我們發現上校住在一間擁擠的小房間裡，傢具極為簡單，但四面散放着種種的小東西，其中有國外帶來的鏡子和粉撲等等。

知道我們的訪問目的之後，他頗為欣悅，他說他願把中國的生活情形告訴我們。但在開始談話之前，他先開着留聲機，唱了幾張他所喜愛的華滋舞曲。

『在中國的生活情形很苦，』他告訴我們，『因為天氣太熱，而吃的東西也不配胃口。可是令人慰藉者，中國的反間諜工作，並不使我們受到太大的煩擾。我們的工作很繁忙。我常常接連三四夜不睡覺，把偷來或買來的重要文件攝取照片，因為那文件到天亮時仍需歸還原處。與莫斯科來往的電報，也需費很多時間，如果你們派到中國工作，不要以為生活是簡單的。』

上校很坦白承認他與大使的爭吵，大家知道大使有不公開來源的大宗經費。

『你們在這裡，』大使常常對使館人員嚷，『我就是史太林！』

我們從他的談話中間，後來明白苗爾尼高夫之所以與大使不睦，因為大使不准給苗爾尼高夫以拍發電報的優先權。可是，他後來給報務員以賄賂，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苗爾尼高夫講他的中國故事，顯得他的機智是無窮的，但他的機智大部分得力於金錢。

有一晚，他跟一位華籍間諜人員約會在郊外街角。剛碰面，警察迎頭奔來。苗爾尼高夫不否認他的腿都發抖了，因為當場捉穿，那簡直是生命交關的事情。可是他的靈機一動。伸手到口袋裡摸出三張五十元的美鈔，遞到那警官手裡，指指前面的街道。那警官一聲不響帶着部下走了。

那華籍間諜人員從小巷子裡溜掉了。苗爾尼高夫慢慢定了心，走向大街去。大約兩條馬路口，他超過那警官，他似乎毫不認識苗爾尼高夫似的。

『在中國，金錢萬能。』他說。『倘使你有錢，你甚至可以收買一個部長。』

我們覺得最有趣的，他竟騙到了某大使館藏在保險箱裡的重要文件。他沒有說出大使館的國別，我們都有相當訓練，所以也不會追問他。

『這件事情的中間人，是我在某次招待會席間所遇到的一位青年秘書，』苗爾尼高夫講述那故事。『這青年顯然完全同情共產主義思想，因此他打聽我，怎樣纔可以得到允許到蘇聯去訪問。』

『我很疑心，我就建議他明晚可以到我地方來吃晚飯。他似乎受寵若驚，準時來到了。我請他喝了相當多的伏特加，知道在酒力之下，他一定會透露一點什麼東西。那晚離散之前，我斷定他不過是熱心仰慕蘇聯，並沒有做慣特工。』

『一星期之後，他又來看我，重又問我到蘇聯去的辦法，我就告訴他，最方便和經濟的辦法，祇要拿事實「證明」確乎忠誠地同情蘇維埃主義。他對我這個引逗極感興趣，頗願一試。我就請他明晚再來，他果真

來了。

『我所建議的試驗，是從大使館的保險箱偷出文件來，用特製的照相機，攝取照片，即行歸還。至於如何進行，我會教他的。那秘書對於這個試驗辦法，似乎頗有些擔憂，我就告訴他，凡事有益於蘇聯的，終必對他的本國人民有益。這宣傳發生效果了。他同意一試，我就細細把辦法告訴他。』

『那青年按照我的指示，開始在大使館裡工作得很晚纔離開。一夜復一夜，同事們習慣於他的歸去甚晚，也就不起疑心了。同時，他留心大使的種種生活習慣，尤其探得大使在辦公室的時候，保險箱的鑰匙總是放在書桌抽屜裡的。』

『有一晚，機會來了，大使也工作得很晚。他走出辦公室來，命令那秘書坐在大使的對面辦公桌上，叫他留意代接電話，而大使則轉身往盥洗室去了。』

『大使出去了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可是已足使那青年拿出我所供給他的一罐蠟，把那保險箱鑰匙打了一個蠟印。這蠟印不消幾天工夫，就送到蘇聯邊境的情報隊，做成鑰匙從外交郵袋裡寄來了。』

『以後的事情就比較簡單了。不過必須大使館裡絕無一人的時候方好動手，因為打開保險箱時，有鈴子會自動發聲的。』

『我就選擇一個機會舉行宴會，把大使館裡的職員都邀請了。在那時，他們對於他們所謂「赤色盟友」的招待，誰都決不會拒絕。我並且告訴那青年秘書，一定用名貴的酒，至少把大使留到半夜。』

『到適當時間，那青年溜出客廳，奔回大使館去。工友一點也不起懷疑，因為常看見這勤懇青年工作得很晚。那青年絕不耗費時間。斷定那工友在另一層樓忙於收拾的時候，他先把警鈴捺住，開箱時不讓它發聲。』

『一次開始之後，以後簡直容易得可笑。莫斯科贊美這些文件爲非常有價值，因爲可以幫助他們時時獲知它在中國的競爭者有些什麼計劃。』

『那秘書對於這件事情幹了有多久？』羅曼諾夫問他。

『相當長久，直到有一晚，他從保險箱抽出鑰匙的時候，一半斷在鑰匙孔裡了。他千方百計想弄它出來，可是毫無辦法。他打電話給我，急得不得了，我就告訴他，明天這件事發覺的時候，他必須若無其事的也跟着大家表示驚訝。他有很好的成績，我老早就教導他，在跟同伴談話的時候，切不可表示親蘇的見解。』

『第二天上午，大使到辦公室後一小時，那青年所擔憂的事情果真發覺了。他想開保險箱，可是鑰匙戳不進去。細細查察之後，發現鑰匙孔裡斷着半截鑰匙。』

『於是詳細的調查，但秘書非常鎮靜。大使懷疑着館中一個又一個的職員，仍舊毫無具體結果。後來他提出若干職員的名字，包括那青年秘書在內要求召回本國，這纔把問題解決。』

『那秘書始終沒有到蘇聯來過嗎？』我搶着問。苗爾尼高夫放聲大笑。

『沒有。可憐的傢伙，我想他一定抱怨蘇聯做的鑰匙不結實，誤了他的前程！』

X

X

X

X

在莫斯科，各國的大使館也常在俄國特工嚴密監視之下。日夜的注意，甚至推廣到那些使館裡的每一個職員。

距離使館，一條街口之遙，總有三四輛汽車，由政治保安局的特工等候在那裡，如有車輛從使館出來，必跟踪而去。這簡直非常公開。還有派在使館門口司『保護』之責的衛兵，也很公開。使館中人，都知道這些衛兵都是特工，隨時報告館中人員的行動，連極不重要的職員，也爲他們注意的對象。

這一些還是表面的監視。真正搜集情報的那是些外面無從覺察的特工，隔壁房子裡的一個園丁或管家，也許擔任着極重要的秘密任務。當大使館職員注意那些公開監視他們的人時，另一批特工正不露聲色地在進行他們的工作。

莫斯科若干大使館，爲了節省經費，往往雇用俄國人做他們的技術人員或僕役，這使蘇聯政府十分合意，給政治保安局以無比的機會從事刺探的陰謀，而這種雇員都會受過秘密警察的訓練。從戲劇學校裡出來的漂亮女學生，經過間諜技術的訓練後，教導她們何種情報爲政府所需，以及如何獲得這種情報的方法，就去應徵當各使館的厨娘或其他雜役。

情報總局有一位蓋爾金上尉，他的遭遇，最足以證明蘇聯特務對於莫斯科的外國使館注意得如何嚴密。因爲有一位官員負有外交任務要到英國去，派蓋爾金拿了那官員的護照到英大使館去辦簽證手續。在平常情形之下，簽證手續是由外交部代辦的。但因事情很緊迫，而蓋爾金那天未穿軍服，穿的平民服裝，所以就派他去了。

蓋爾金到了英大使館，說明來意之後，大使館很客氣，很幫忙，在半小時內把一切手續辦好，蓋爾金欣然而去。他還沒有走完一條街口，剛要轉彎的時候，突然有兩人從兩邊走來，緊緊抓住了他的手膀。

『幹什麼？』蓋爾金駭然問。

『不要作聲！』其中一人說：『跟我們來。』

蓋爾金不能動，心中很憤怒。

『你們是什麼人？』

其中一人反問道：

『你到英大使館去幹什麼的？』

『這不關你的事。』蓋爾金說。『你們有什麼權力這樣阻止我去路？』

『你等會兒就會明白的。跟我們來！』

此刻蓋爾金稍稍有些明白了。

『好吧。』他讓步說。過路的人開始聚攏來看熱鬧了。『放鬆我手臂，我不會逃走的。』

兩人中之一，對其他那人點頭示意，於是都放了手。然後指指前面的街道，蓋爾金舉步走去，兩人緊緊跟在後面。跨過馬路的時候，一輛街車駛過了蓋爾金與那兩人之間，蓋爾金在前面站着等他們。當車子駛過，回頭看去，只見那二人急得面如死灰，急急奔過來，發現蓋爾金沒有逃走，他們大大鬆了一口氣。如果真的脫逃，那兩人是要吃不消的。

到了一個警局，政治保安局的特工代表就細細盤問着蓋爾金。蓋爾金拿出證件，並且說明到英大使館去的任務，那特工就打電話到情報總局去。隔了好一回，纔問明白，認為滿意，把蓋爾金釋放出來。

那年夏天，蓋爾金一天乘在街車上，發現坐在旁邊的就是過去會拘捕他的二人中之一，他們就像朋友似的交談起來，那特工笑着告訴蓋爾金道：

『那天把你釋放之後，我們有一個月時間，常常監視你的行動，你自己覺得嗎？』

蓋爾金頗為詫異。

『爲什麼？』他問。

那特務聳聳肩頭：『哦，還不是爲那回事情。』

十一 國際騙局

九六

莫斯科於一九四三年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盟國大為贊美，認為此舉足以增進蘇聯與民主國家間的諒解。實則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國際騙局。

讀者或許還記得，故羅斯福總統曾經明白指斥共產國際為合作與諒解的最大障礙。他說俄國在國內需要共產制度，那是它自己的事情，可是共產國際明白表示其目的在組織國外的革命，造成共產主義國家，這就大大妨礙國際的友誼了。

共產國際於是解散了，被蒙蔽的民主國家覺得非常欣悅。

祇要留心一下報紙，就知道以前共產國際中的要員，都不難找到了新的任務。其重要領袖，都保留以供更廣大的蘇維埃計劃所錄用。他們都成了蘇維埃新殖民地的『總督』。狄米脫洛夫做了保加利亞的狄克推多。貝羅脫做了波蘭的總統。陶雷士及杜克洛斯在法國共產黨裡身居要職。所以，玫瑰花雖用別的名字去喊它，而它的顏色還是紅的。後來加拿大間諜案所展現的真相，尤其明明白白告訴大家，即使沒有共產國際的分子，蘇聯也可以在一個民主國家中，達到它的目的。

那一年，從醞釀到實行『解散』共產國際，我在情報總局中所擔任的職務，使我成爲一個清清楚楚的旁觀者，我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修畢了密電訓練的學程，被分派到總局做事。在當時，若干階段的發展，其真正的重要意義，雖非我們所能瞭解，可是我們始終所親自目睹，這種資料也許爲許多國際問題專家所不會知道的。

到一九四三年，紅軍的情報總局擔任着双重任務。它職掌着國外及前線的情報工作。因爲國外活動的增

加以及特別重視這一部門的工作，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蘇維埃政府正式把情報總局分成戰略情報與戰術情報兩大部份。

海外各國在大大恭維『解散』共產國際，而我們在『內部』却奉令以局中大部份的力量放在國外情報方面。在局子裡面，一般人都預料戰略情報將來會獨立成一部門，擴大系統，並把最能幹最可靠的工作同志放到那一部門去。當時政治保安局的情報處以及海軍情報局等都有類似的改組。

總局改組之後，範圍擴大得等於一個大部。克魯泡特金門廣場的原有房屋之外，又占據了士納曼斯基十九號數層的大廈。還有些附屬的建築，包括攝影材料工廠和印刷大量公報及報告等的印刷廠。

總局並接管若干研究及訓練機構，包括莫斯科及鐵夫里斯兩個外語軍校，紅軍的情報研究院，以及在邊境各種情報訓練所，密碼訓練班，無線電訓練班，和訓練間諜和特務的許多學校。這類學校散佈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布枯等郊外。總局設在莫斯科，另於卡巴洛夫斯克，烏發、基輔、奧德薩、及巴登等地各設分局。

共產國際『解散』後，這個代替它的情報新機關，在莫斯科的總局就有五千名工作人員，其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軍事情報接替了共產國際的任務。成爲蘇維埃在民主國家中積極活動的第五縱隊。我們的『秘密』訓令，說明工作的最後目的，爲從內部去破壞民主國家，到必要時給予致命的打擊。同時，戰略情報方面人員的『日常工作』，爲將各國政治，軍事，經濟各種動態及趨勢，作正確詳盡之報告。

並且特別強調達成最後目標及搜集情報的最好辦法，應在不知不覺中滲透民主國家的重要機構，在政治，經濟，軍事機關的重要地位，安置蘇聯的特務人員。

蘇聯政府對這新的情報機構，如何重視，我們從史太林簽發的一個命令可以看出來，他將情報總局局長伊里契夫提升至中將地位。

戰術情報部門在契尼砂夫街辦公。其任務為從前方以及緊接前線的敵後收集情報。在那部分工作的一個朋友告訴我，軍官們常常談到『將來和平後』的工作。

『你們以為我們的工作，僅以戰時為限嗎？』戰術情報的處長問一些青年技術人員。『我們的平時計劃，可以給你們更光明的前程，將來慢慢地詳細告訴你們。你們中有許多人都要受訓，訓練的東西，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用處，可是我勸你們好好學習。耐心地等待，你們會發現在國家的地位，其重要性遠過於今日。』

在戰略情報處，設立了『特別交通組』，凡懂得外國文字的人都調到這一組工作。這一組掌管着國外各地情報人員所發來的電報。

情報資料組在各組中組織最為龐大。克洛樸夫少將任組長，雇用着數百專家，處理從海外各個人員各種來源寄來的資料。再以國別分科，科的下面，又分政治經濟等股。有關科學及技術的情報則轉交綜合組。

組織似乎很繁複，但我在『內部工作』的那一年，業務進行得甚為順利，而範疇則日益增加。尤其是大批的專家，不斷來自各種專門學校，令人覺得規模的非同小可。

凡是需要的情報，由於那些專家的鍥而不捨，很少得不到結果的。這一點，那些自以為把秘密保衛得十分周密的國家，應當加以注意。

探問一項消息，同一電報往往發到全世界二二十個地方。有一個類此的『緊要』探問電，意欲獲取美國某一項科學新發明的秘密，因為性質過於專門，我已忘懷了它的名稱了，但我至今記得，這個探問電的結果

，使我們密電科中人人覺得驚奇。在美國的兩個間諜都無收穫，可是派在加拿大和英國的工作人員，却把全部的情報報告上來了。

常常有些要人旅行盟國，或是大使館裡一些喜歡高談闊論的職員，不知不覺中把國內保守得十分嚴格的秘密在國外洩露了出來。因此，蘇聯想探聽一個『緊要』秘密，在它密佈世界的間諜網，很少得不到結果的。因此之故，若說原子炸彈的製造秘密，目前蘇聯尚有不知道的地方，我很懷疑。如果還有一二不明瞭之處，必在想盡方法刺探，不僅在美國，而在其他各國，凡能得到一點一滴資料者，莫不儘可能在搜集。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我從渥太華俄國大使館私下拿出的文件之中，有一個電報底稿，僅為八月二十七日，即五天以前發給莫斯科『局長』的，譯之如下：

（第二六六號）局長鈞鑒：自『巴都』處收到十七種有關野礮及無線電探索器問題之最秘密及秘密文件（英、美、加、均有），及一九四五年科學研究秘密報告，共計七百頁，儘一日之時間，將所有文件攝影就緒。日內將再有相等數量之文件可以到手，惟僅能留用三五小時，當非一架照相機所可竣事。余認為將國立科學研究所全部案卷加以查考，實有必要。前奉二百五十六號電未見復示，對於攝照文件之工作，或將發生妨礙。上述文件，仍交原人帶奉。『格蘭脫』，一九四五、八、二七。

『格蘭脫』是柴鮑丁上校的化名，他是蘇聯派在加拿大軍事情報的首領，『巴都』是加拿大人鄧福·斯密士的化名，他從前任職於國立科學研究所，現在正在執行五年徒刑。

上面這個電報，不過很平常的一例，表示蘇聯在國外如何不厭求詳的搜集資料。七百頁的最高秘密和秘密文件，日內還有同等數量的東西。柴鮑丁的目標，正像他自己在電報中所說的那樣，他要把英美加科學家的發明報告，『全部卷宗，加以查考！』

這種資料，究有多少用處呢？我無法回答。但既包括如此浩繁的卷宗，總有重要及寶貴的東西。我于是想，柴鮑丁的機構還是建立不久，餘如華盛頓，紐約及倫敦的機構，規模還要大，時間更要久，則活動的範圍，勢必更可驚人！

美英兩國顯爲蘇聯間諜所最注意的目標。我在情報總局特別交通組服務的時候，大部份的電報來自美英兩國。其餘各國的電報在該兩國電報的洪流中，宛如滄海之一粟。

華盛頓蘇聯大使館裡的軍事隨員薩拉也夫，所用密電員即有五名之多，即此一端，可見其向莫斯科的報告，如何的繁多。

『英美當局對於我們如此衆多的間諜，爲什麼不能發覺呢？』我有一回這樣問。

我們的組長笑着說：

『我們在那些國家，間諜的衆多，就是我們的力量。當局摧殘其中的一名，又注意到旁的方面去了，于是其餘九個人就自由存在着。』

那天下午，他又走到我辦公桌前對我說道：

『那些同情蘇聯的外國友人，對於我們也有極多的幫助。』他遞給我一張尙未翻出的密電。『這是一位在美國政府身居要位者給我們的情報。他不僅供給我們的使館武官以各種資料，有求必應，並且他本人對於重要國策還有影響的力量。這樣一個人，抵得到二十名間諜。』

『至少二十個。』我也這樣說。

這一類有資格的美國朋友，姓甚名誰，我們是不知道的，但很顯然的，他一定是政府要員之一，他那種有利蘇聯的言論，常常爲報紙所引述。

這種人也是用錢收買的嗎？

我以爲不然。許多追隨共產主義路線的人，他們私人都很富有而與大企業有關。而且其中很多人，我可以斷定，他們也並不贊成把美國變成共產主義國家。那麼，他們爲什麼那樣竭力爲蘇聯的利益辯護呢？

就我在渥太華蘇聯大使館的經驗，得到一個答案：他們被種種的恭維所麻醉。

有訓練的蘇聯間諜，用恭維爲換得情報的代價。那些『外國朋友』給邀赴約會，用無上的熱情贊美他，恭維他。他常常以私人地位做『蘇聯朋友』的座上客。他的耳朵熟習於機巧的言論，連他自己都不覺得，完全是共產黨的一套說法。他自以爲得到蘇聯朋友的信任，于是把他們有權知道的機要情報，很得意地透露了出來。

熱烈豐盛的俄國宴會，加之以無數的伏特加乾杯，自然而然地影響他們吐露機密。

有許多要人，都喜歡在報上出鋒頭。在這些年頭，高唱『偉大的蘇聯盟國』，發表一些『讓我們瞭解蘇聯』的演說，或是組織『對蘇友好協會』，都是他們出鋒頭的途徑之一。

『解散』共產國際，無疑又給了他們一個好機會，盛贊『這是蘇聯友誼的切實表示。』這種人，實是最有價值的蘇聯間諜。

十二 德國俘虜

紅軍捉到的第一批德國俘虜，引起了情報總局相當的興趣。他們是在德軍閃擊前進時被俘的，我當時頗以尊敬的目光看他們。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使我們相信紅軍是世界上無敵的軍隊，現在不能不以坦白的好奇心研究這些驚人的戰士。他們與俄軍最大的不同，在於態度的傲慢。

德國是高傲的民族，他們深切知道德國兵掃蕩俄軍，一如疾風之吹弱草，頗使國際震驚。每當盤問他們的時候，起初他們鄙夷地報之以冷笑。有的俘虜對俄國官員尤為無禮，但這個情形不久就改善了。當局曾有命令：

『對待俘虜愈乾脆愈好。如果他們不肯說話，用刺刀對着他們。』

到一九四二年，德俘就毫無傲氣，差不多都肯開口了。這種態度的轉變，無疑是由於德國人的作法自斃，因為納粹報紙上登載了許多俄國對待俘虜的『暴行』。過去欲以傲慢來恫嚇別人，現在都柔順以求自保了。政治保安局開始『訓練』德義俘虜。很奇怪的，有些竟派到總局跟我們一同工作。給他們的通告，稱他們為新成立的自由德意志聯盟的會員，但他們的實際工作，我們祇知道一部份。

從我所經手翻譯的電報，略可窺見端倪。有一封發給羅馬，化名寫『福立克斯』的法文電報，可以透露這些戰俘的作用之一。那電報指令『福立克斯』道：

『小心別為他人所見，前往下列地址(地址略)，將下列信息轉交某某婦人(姓名略)：「其子愛麥虞咸現已被俄軍俘獲。甚為安好。囑為問好。他要求她儘可能給你協助。並警告該婦人，如不肯幫助或報告義大利當局，則其子將受死刑。』

『福立克斯』即有復電，說那母親不僅願意幫助，並且還帶他去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這兒子在羅馬擔任相當重要的工作。母親聲淚俱下的要求，那兒子立刻接受了。『福立克斯』告訴他，不僅可以救他哥哥的生命，對於『重要』工作，還有金錢的酬報。與羅馬通訊僅賴無線電，但『福立克斯』說，此項困難即將克服。

這並不是僅有的一案。用類似要挾手段造成的間諜究有多少，我無法估計，但從我們經手的電訊去推測決非少數。

有一次，我在盥洗室裡，遇到幾個被監視的德國軍官，他們是住在地下室中，被帶上來的。因為讓他們從街上走過，認為不甚妥當，所以就叫他們住在總局的地下室裡。

其中有一人臉容慘白，精神頹唐。頭上裹了血染的繃帶。顯然他是受了特別的逼迫，所謂自由德意志聯盟的會員，受這種逼迫者決非少數，雖則外界的宣傳，說他們都是出於『欣然的自願』。

當戰局於俄國有利，俘虜成百成千的時候。也就沒有時間一一盤問。送到後方集中營讓他們自省。其中許多高級軍官，大都利用為自由德意志聯盟的宣傳資料。

當情勢困難，無法把戰俘送到後方的時候，就集體鎗決。

X
X
X
X

總局有三個食堂。一為低級軍官，二為高級軍官，另一為最高級要員進餐之用。局長和副局長則在辦公室裡吃飯。他們連刮臉剪髮也是在辦公室裡做的。若要辨別一個軍官的真正重要性，祇要看他在何處吃飯，或在何處剃頭。

戰局的轉變，使軍中實行了新的『紀律規則』。隨時隨地向長官敬禮的命令頒佈了。軍官不准攜帶超過於一定體積的包裹。設立軍官俱樂部之後，釐訂了禮節的規章。一個將軍，如遇士兵不向他敬禮，他可以罰他在街上站立五至十分鐘。

組織了特別的巡邏隊。糾察莫斯科街上的敬禮事件。我們奉令留意不敬禮或敬禮而姿態猶豫的士兵。上峯以為士兵若不虔誠敬禮，表示他們蔑視官長。我們隨時注意到犯規的人，須向街上的武裝糾察隊立刻報告。他們就檢查那士兵的證件，轉報主管官長。

違犯者立受懲罰。甚至少尉以迄少校的軍官，也常為高級軍官報告而受懲處。最平常的處罰辦法是命令

他們站崗半天，常常有不少的軍官受到這種處罰。

對於要人的保衛也特別加強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沿着河邊的道路，經過克里姆林宮前面的公園。從總局回到我們的臨時宿舍莫斯科旅館，這是繞圈子的遠路，可是我喜歡這一帶的風景。

那天，我走過去轉了彎，正想瞭望景色的時候，看見一輛光澤漆黑的長長汽車，停在石砌的短圍牆外面。

這樣漂亮的汽車，在莫斯科街上是不常見的，頗引起我的好奇。我走過的時候，我放慢脚步，細細看着。

『走過去！』

我很驚訝地看見另一輛汽車往人行道開了過來。其中兩個穿政治保安局制服和兩位便裝的人。我急忙轉身，沿着馬路走過去。在這利那間，我看清了所以特別戒備的原因。有三個人正從公園裡踱出來，我立刻認出中間一位，乃是政治局的安特烈夫。他穿着一件共黨要人間很流行的皮領大衣。臉色呆板而有倦容。旁邊兩人，都是穿着政治保安局的上校制服高統皮靴。

我站住敬禮的時候，看見三人後面遠遠還跟着一大批特工人員。

我走到諾佛卡門尼橋的時候，不禁再看一看這要人，於是停步假裝俯視河流，又偷偷地舉目望過去。安特烈夫正走進他的黑色汽車。另一輛空汽車開了過來，那些衛護的人都鑽了進去。那輛喝令我『走過去』的車子早已開過來了。

車子的行列很快排齊，開過橋來。我很謹慎地不敢用手去接近右邊大衣袋，因為我帶着一支白朗林手

槍。

當車子行列過去之後，我當時想：

『爲了一個人的散步，要這許多人和車子，浪費着精力和時間。』

後來，我在渥太華，看見國務總理，以及英美各國的要人，都獨自在街上走路，很覺奇異。我最初總要站住看看他們的周圍，有沒有秘密警察。

在戰時的莫斯科，政府人員出門總是擔憂遇刺，我想現在的情形，只有更加厲害。但就我記得的說，不會聽見發生過這類的案子。這樣特別的戒備，似乎是預算着今天，明天或遙遠的將來，總有一天要發生。無數政治保安局的特工專作保護要人的工作。他們是專家。

除了特別的場合，如閱兵之類，史太林從不在公共場所出現，在他偶而露面的時候，也遠遠地在大批衛士的保護之下。政府要員自克里姆林宮到他們夏季『官邸』去的時候，全程都有特別警衛保護。特務們隱藏在路旁許多窗子和門戶的後面，如果路旁住家有人有絲毫的嫌疑，立刻給趕出去，遷居別地。

這種保衛要人的嚴密，使我相信從蘇聯內部發生革命是不可能的。大批的特工，因此享受着特別的食品和衣服配給，自滿於這種尊榮，深深知道祇要保持不發生亂子，也就足以永遠保持自己養尊處優的地位。

X

X

X

X

在對德戰爭的後期，蘇聯官僚對於戰場歸來的兵士，顯然費了一番苦心的思索。他們所注意的倒並不是這般人的善後問題，而是防備他們的造成風波。

有一天，在飯廳裡，我們給介紹了一位黨的執行人員，名奧塞洛夫，他是專管戰場歸來的士兵問題的。『你以爲這些戰場回來的老兵，他們會鼓動糾紛嗎？』有人問他。

奧塞洛夫聳聳肩頭。

「我們有兵士對付這些搗亂分子。」他說。

我們都一聲不響。心想把後方的兵士變爲憲警，去管理戰場回來的勝利紅軍，這是不對的。他好像猜透了我的思想，繼續說道：

「在戰時，人人都有他的職責。一個人在莫斯科有其職責，那些祇會放槍或運輸彈藥的人，沒有理由自己認爲是特殊階級，應享特別權利。那些士兵倘有這種態度，」他拍了一下桌子，「我就不客氣，叫人把他們趕出去，請他們換個態度再來。」

如此對付戰場歸來的「兵士」，不僅是奧塞洛夫個人的辦法，乃是政府一般的決策。黨的官僚起初恭維這批軍人爲我們的英雄。但不久改變了語氣，討論到未來的巨大任務，呼召每一士兵如何準備在平時有所貢獻於國家。

某晚，我在車站等火車，有兩位喝醉了的退伍軍人高聲談話。

「我們打了那麼幾年的仗，我們得到了些什麼？」其中一個抱怨地說。

「沒有。什麼都沒有。」第二個軍人用同樣的高聲嚷喊。接着轉過臉來，對着其他的候車客人，繼續說道：「我們把我們約束得一天緊一天，要把我們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喘不過氣來！」

「我不賣賬！我不賣賬！」另一個以破鑼似的嗓子嚷。

一個憲兵粗魯地從我旁邊擠過去，走到那兩位軍人的面前。

「莫斯科是禁止軍人喝醉酒的。」他嚴肅地說。

兩人不理他。其中高幹兒的一位仍舊向群眾訴說，他說等一筆津貼等了幾個星期都不會到手。他身軀很

雄偉，臉上頗有風塵之色。憲兵去拉他的膀子，那高幹兒低頭看他。

『你是什麼人？』他諷刺地大笑。『我們在前線流血，你躲在後方過安逸日子。現在你來管我們了，滾你的蛋！』

他掙脫了憲兵的把握，憲兵又去抓另一個矮小的人。那人也正在大怒之中。

『滾蛋——你這狗！』他嚷喊，四圍的群眾暗暗發笑。大家都想看看那憲兵終將如何處置，顯然同情着那兩個喝醉的兵士。

兩個警察搶上前去，各人抓住了一名軍人。那憲兵讓開一步，忿然拳擊那兩手爲警察拉住的高幹兒軍人。

群眾大大不平，蜂擁而前。

『不要動他們！』『他們吃够苦頭的了！』『走開！』大家這樣叫喊。

『憲兵一手拔出手槍，一手高舉，示意叫大家不要作聲。群眾立刻覺察了他們剛才的侮慢權威，都靜着不聲響了。』

『這些是反蘇維埃分子！』憲兵指着那兩軍人說，『他們在作反動宣傳。』

那高幹子軍人反唇相譏：『你如到過前線，你就不會這樣的說法了。』

『你們看他說什麼話？你懂得我的意思嗎？』那憲兵掌頰着那無法動彈的兵士。

『你們聽着……聽着，俄國的同胞……！』那高幹兒軍人正要開口，給來了很多的憲兵把他阻斷了。在幾秒鐘之內，兩名軍人給拖出火車站，我們默默站在那裡，甚至不敢討論這一幕痛心的活劇。火車來了，大家上車。

我回頭望望月臺。一切都沉寂好像剛才不會發生什麼事故似的。

十三 安娜——我的妻

我似乎覺得從小就認識安娜的。可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中午，微雪之下，利用我半小時的午餐時間，前往辦結婚手續的時候，我陡然想起，自從那天在列寧圖書館羞澀地初次交談，其間不過經過了四個年頭。

忘記了那時的戰爭，忘記了大家都轉輾於艱苦的路途之上，忘記了我跟六個人同住一屋。安娜的愛，給了我突然的曙光，莫斯科的慘痛生活，好像得到了酬報。那天好像整個的世界沐浴於和平的陽光之下。

但安娜似乎較為現實。她皺着眉頭看看天上凝聚的暗雲。『到註冊局路還很遠呢，伊各。我希望不會耽誤了你的工作。』她微微有些氣急，因為加緊脚步要趕上我。因為奔跑，加之以尖利的寒風，在金黃的頭髮之下，她雙頰飛紅。深藍的眼睛微帶憂慮的表情，我握住了她的手，說道：

『你已經成了賢慧的妻子了，為些小問題擔憂。放心笑笑吧。總之，我們不會天天結婚的。』

到了註冊局，不過在簿子上簽個名，並不需要很多的時間。既無儀式也無所謂慶祝。在蘇聯，結婚這件事不過是兩個人由單身變為夫婦，由官方加以承認而已。像我這樣一個熱忱的青年團員，對共產黨有着無窮的抱負，在教堂結婚是當然絕對的談不到。對於教會如有絲毫的承認傾向，立刻能毀壞自己的前途。

從註冊局出來，奔回情報總局去，仍舊遲了三分鐘，得到嚴厲的申斥。如果解釋我為了結婚，那是無用的。而且我也不必奢望受人祝賀。很可能受到當局的批評，因為他們早有把我派到國外工作的動議。既在總局工作，就無法逃避。三分鐘的代價，甚至有超過羞辱和被責的。我常常看見不少公務員，天沒有亮，就離

開了郊外的家庭，僅僅爲了不致遲到，在車站的木樑子上等待若干小時。遲到的罪過是嚴重的，他們寧願在黑暗中坐着打瞌睡，外面的寒風夾着雪片吹到他們豎起的衣領裡，恐怕脫了火車。

那天下午，我的心全不在工作上，這又引起了上司的責備。然而上司的不愉快臉容，仍不足降低我興奮的情緒。我與安娜於一星期之前就決定結婚，但無法選擇一個雙方都適合的日子。她仍在建築學院讀書，她上課的時間與我的辦公時間是衝突的。我在總局當夜班，常常要到天明方始完畢。結果就選擇了中午那短短的餘閒。

結婚以後，過了十天方有慶祝的機會。等了好久，纔有閒空的那晚，我買了些香腸，麵包，一瓶伏特加，和一些較爲和平的酒。把這些東西得意地帶到安娜家裡。從各種條件去衡量，她家是比較富有的。因爲她父親從事重要的科學工作，因此與衆不同，住着兩間屋子。他對我的印象很好。新的丈夫，對於岳家毫無禮物，面子上有些說不過去，我於是告訴他，我所有的財產，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之外，還有一只破箱子裝着一些替換的內衣，他却絕無不愉之色。

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做父親的，祇希望你成爲安娜的好丈夫！』接着又問道：『你住在那裡呢？』我把住址告訴他，並且說，我的房間裡，連我一共住着七個人。安娜的父親搖搖頭。

『那是沒有法子住的。住在我家裡吧，直到你們另外能找到適當的住處。』

我真喜出望外。這兩個房間的家庭，在我看來，無異於皇宮。

我把『婚宴』的食品放下之後，立刻奔回去接我母親與姊姊。可憐的母親，爲了參與這個『大典』，費了很多時間換衣服。實際上沒有什麼問題。她祇有一件『好衣服』，而且已經舊得很多的了。

一路到安娜家去，我第一次注意到母親是如何的衰老。也許因爲我心急，所以覺得母親特別的走不動

路，比從前特別衰老了。

我把母親介紹給安娜一家人的時候，至今記得當時的得意情形。我們是農民出身，但母親是有學問的，是個優秀教師。她的言談舉止，都很大方。與安娜母親一見之後，就暢談起『過去的好日子』了。在歡暢的空氣中，安娜的父親對我們不斷露着笑容，我覺得應當打開酒瓶的時候到了。安娜的父親也欣然同意。我從破籬笆上揀來的木柴，在爐子裡熔熔燃燒。

我們唱歌。喝了酒應當唱歌，這是俄國人的習慣。安娜也興高采烈。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晚，母親吻着安娜，對我說道：

『我最大的心願達到了。』

X X X X

安娜是我平生得益最多的伴侶。她有女性的溫柔與切實的思想。我每一決策都要商得她的同意——尤其是那最重大的一次。

我發現自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兩種相反的情緒磨折着我，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農民習性，要我抓住機會爲無數不准說話的被壓迫同胞說話，反對那恐怖的共產主義，這種猙獰的制度，它剝奪了人類生、愛和追求快樂的天然權利，人類對待人類的殘酷，史無前例。另一種情緒，也是全世界做家長者所普遍具有的——要我避免危險的途徑，不要使死亡和苦難降臨到我所鍾愛的家屬和本人身上。

我把情形告訴安娜，並且說明履行責任，總是一件艱辛的事情，我無意逃避事實。前面有極大的危險，我願意冒險——但我能要求她以及我們的孩子，跟我分受這種危險嗎？

安娜使我成功。她毫不猶豫地給我下了決斷，叫我選擇了責任的途徑，我從她那裡得到了堅定不渝的信不

心。

到了那一天，也就是不平常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我覺得在天地之間，唯有安娜是我的真正朋友。我拆斷了我與蘇聯間的橋梁。我的同事變了要我生命的仇敵。而外國的當局把我看成冒險家。全世界祇有安娜扶持着我，鼓勵着我的勇氣。

我對於這決策的正當，絲毫沒有懷疑。甚至在最困難的一段時期，我想到了國內無數受苦的農民，很慶幸自己爲了他們最後解放的此一行動。不論巨細，任何爲他們揭開鐵幕的努力，對於那些善良人民，多少總有好處的。但是好幾個月的調查，繼之以長時間的一再審問，有時構成我神經上無可忍受的緊張。往往失眠，在黑暗寒冷的長夜，我躺着左思右想，直到天明。

我常常覺得安娜在我身旁轉動，聽我的動靜。接着輕輕問道：

『伊各，你醒着嗎？』

我們就談起話來。双方同意選擇這艱難道路的決策，它發生的力量，使我們得到安慰，而我們的談話，總是鎖定了心理上的緊張，使另一艱難的日子，覺得值得過下去。

X

X

X

X

在我們結婚的那年，殘酷的冬令代之以春天，接着可愛的夏季來了，安娜在她莫斯科家庭的附近，種了一園蔬菜。在園子裡並且種了一些馬鈴薯，這是在餐廳裡間歇地得到允許買來的。

這菜園對於日常生活有極大的重要性，因爲當時配給食物的困難，群眾爭購，已成無秩序的狀態。婦女給群眾踐踏，或是被擠在牆壁上受傷的不幸事件，已有發生。擠購公物的行列中，發生高聲喊救命已屬司空見慣，大家也不加注意了。我自己也曾爲了獲得一些在民主國家小店裡都堆滿的平常物品，跟列人擠、推、

嘍，原始的欲望，使我忘記了尊嚴。排隊購物所發生的不幸意外，成了一般人日常談話的可怕資料，餓着肚子的兒童，使他們覺得無恥卑鄙的行動可以得到滿足的酬報。

接着有一天，安娜告訴我懷孕了。

起初我很得意，因為我是一向愛好孩子的，但一想到生活上的負擔，也就快樂不成了。糧食的情形，日見惡劣。我知道安娜在建築學院裡的飯食，不足以維持她身體上的新需要。她所喝的湯，稀薄得有如泥漿水。沒有油。不久之後，她的牙齒就出毛病了。

唯一補充她食物的辦法，是把我所應得的饌肴，偷偷地留出一半，帶回家去。我倘使得到一片肉或一個肉丸，就把它切而為兩。一半自己吃，一半放在口袋裡帶回家去。麵包也是如此，因為質地比店裡買的好。別的軍官也是同樣給太太這樣辦的。

後來我想出一個辦法，偷偷把一隻小鍋帶進飯廳去。女侍同情我，給我另裝一鍋，在她裝的時候，暗暗留心着管理員的目光。

安娜的情形未見改善，我就不吃午飯，把所有的東西都裝進鍋子裡去。門口雖有人守衛，但他們也是結婚的人，假裝着沒有注意到我鼓起的外衣。

安娜疑心起來了。

『伊各！』她問，『你自己究竟吃了一些沒有？』

我把她的問題支吾開去，坐着看她吃，自己做出毫不關心的樣子。在那一段時期，我睡到床上總是想東西吃。我在夢中舉杯，夢見大碗的熱湯，半夜醒來的時候，似乎還可聞到它的香味。我當時從沒有想到在別的國家，一般人的生活，都要比我們優越。我唯一的目的，是想改善我在總局的地位，職位高些，配給也多。

些。

某晚，安娜的姊姊來看她，給她帶了一條保藏已久的鹹魚。兩人就拿來煮了一鍋湯，她們叫我吃些。我實在受不了那腥味，她們却把我的那份也吃了下去。

在她懷孕的數月之中，安娜從沒有吃過一口水菓。而我則五年沒有看見水菓了。我也忘記了像樣的肉排應當是什麼式樣的。

十四 出國消息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情報總局中國科的科長忽然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裡，他問了我許多有關我個人歷史、教育、專長等等的問題。他沒有告訴我這些問題的用意何在，問完就叫我出去了。

回到自己辦公室裡，我立刻去見密電科的克拉夫金科，問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他事前也一點沒有得到什麼消息，猜想上去，大約要派我到中國去工作。

我聽過過一切關於蘇維埃在華工作的報告，雖也知道那裡的情形也很艱難和吃力，但這個消息使我覺得十分欣喜。我對於炎熱的天氣，陌生的民族，怪異的習俗，以及那裡蘇俄工作人員的互相排擠，我都不以為意。莫斯科生活如此的單調，猜忌、窮苦，換換環境，總是覺得可以歡迎的，我心中雖這樣想，但不敢說出來，我祇對克拉夫金科道：

『到國外去服務倒是很好的，可以把我所學的一切付之實用了。』

我好不容易等到下班回家，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安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却並不覺得可喜。

『我所希望的倒不是中國。』她鎮定地說。『就我所聽到，那裡的糧食與生活也不見得高明，並且還聽說

因爲對日戰爭的結果，共產主義的革命鬧得很兇。」

我却有些耐不住了。

『可是安娜，至少生活比現在有些新鮮的變化。』

『咳，伊各！』她說。『我們不能祇顧新鮮有趣。』

我覺得慚愧。她是想到了我們那尙未降生的嬰兒。

『那末怎麼樣呢，安娜？』

她嘆了口氣。『有什麼辦法。派你到中國去，你祇好到中國去。但我想在這裡就一耽，等孩子下了地，我健康可以旅行和適應新天氣的時候再來。』

這辦法是令人不快的，但我繼續思念着中國。在此後的數星期內，我儘量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總局的同事伊格納鐵夫上尉他曾到過中國，我去請教他，他鼓勵我，他說『你不會發現中國的情形索然無味。』他的故事也有不愉快的描寫，但我並不把不愉快的方面放在心上。我暗暗作了些小小的準備，以防匆匆命我成行。

有一位懂得中國語言的徐寧，他借給我一冊初級的會話讀本，我一有閒空即翻開研讀。

在這個時期，說話特別留心，避免熱心出國的表示，因爲熱心出國，將被解釋爲不滿意莫斯科的生活。不滿蘇維埃的人，是永無出國機會的。

去冬就有過這樣的一個案子。有位少校奉派赴華盛頓，一切文件，連護照都到手了。在他啓程之前兩天，他對總局飯堂的司賬員高聲嚷道：

『這裡的飯食，可能是莫斯科最惡劣的了。讓這種臂脚厨子糟蹋東西真太可惜了……』他回頭時對同伴

說道。『至少我祇有兩天工夫來忍受了。』

司賬員立刻對局長伊里契夫中將寫了一個報告。第二天早上，那少校接到通知，奉局長諭，不准出國。把不滿的人留在國內或集中營裡，這是一貫的政策。批評與不滿，認為是性格的弱點，一個人在小事情方面表示弱點，則遇到大事情，也無法表現強毅的性格。派到國外去的人常被嚴密的監視，但一個人內心的活動當然看不見的。而且人們到了外國往往改變性格。這是情報總局最大的困難問題。選派到海外工作的人，一方面希望他們靈敏，思想活潑，但同時又恐怕他們過於狡猾或有不滿的傾向。

有一天，我奉令去謁見國務委員會的古特里蕭夫上校。我走進他辦公室的時候，心臟跳得很不舒服。這位上校，我將永不忘懷他，他是總局裡有限的好人之一，發現了我的不安，他指着一隻襪子，很友誼地笑着說：

『坐下，高曾科，不要心慌。我相信我們今天的談話一定使你很愉快的。我問你，你對於到海外去工作，覺得如何？』

『倘使我的工作能够裨益於蘇維埃主義，那末任何地方我都樂於去的。』我說。

古特里蕭夫上校靠在椅背上輕輕發笑。

『這話不錯。你老實說，你喜歡到國外去嗎？』他用這樣親切的方式問我，有些出乎我的意外。

『是的，上校同志，我很願意。』

『爲什麼呢？』

『因爲我還年輕，旅行及海外的經驗，可以幫助我爲國家服務的進展機會。』

上校用鉛筆輕輕敲着桌子，很隨便的問道：『倘使在你的旅行中，發現環境和習俗，你覺得比國內爲

，你願意長住下去嗎？」

「不，」我很迅速地回答。「更切實的辦法，是找尋別國所以勝過我們的原因，作詳盡的報告，希望我國也能仿效施行。」

上校又露着微笑。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我面前。

「對的——祇要你能謹慎小心，控制你的衝動。我曾經調查過你的背境，覺得很合意。你很適宜於海外工作。蘇聯以外，有一千二百萬以上的共產黨員，而每一個黨員有十至十五個支持者，從這一點就可知道海外工作的重要性了。」

接着他又興奮地說道：

「到戰後，這種海外工作的組織，將製造歷史。我們早已計劃好，早早的侵入法國及法國殖民地的政府與工會。義大利、德國、日本、戰敗之後，經過短時間的饑餓混亂，我們的運動必會成功。在中國，已經進展到蘇聯訓練的軍事領袖，正向政府採取實際行動的階段。南美與古巴，我們已有鞏固的基礎。至於美國，我們認為戰後的不安，加之以全世界革命勢力的伸張，也不久可以成爲共黨控制的國家。英國，是我們最需要的目標，因爲它的勢力，現在伸展到四大洲，關於這一工作，高曾科，將來與你有直接的關係。」

我設法遏制自己的熱望：

「是派我到英國去嗎？」

他搖搖頭。「不，不是英國，而是英國勢力範圍中一個肥沃的國家。我們準備把你派到加拿大去。你覺得怎樣？」

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可是我強自鎮靜：「這對於我是非常合式的。」

上校讚許地微微一笑。

『自然是。加拿大是個大國，居民並不擁擠，有無窮的資源。近幾年來，尤其戰爭開始以來，黨的成
功，在該國簡直超越了最樂觀的預期；但尚有重大的障礙要克服。作爲軍事行動之前的分化工作，黨採取一
種比較和緩的對策，先集中力量設法獲得各種工會的控制權……』

『怎樣控制呢？』我岔着問。

『這與你沒有直接關係，』上尉說，『你的工作，根本是在軍事情報方面的。然而我認爲對於派赴國外的
工作同志，應該大體上明瞭海外工作的輪廓，以免在他們直接有關的工作以外，因爲一無所知而發生危險的
言行。至於你所問的如何控制工會，我可以告訴你，其方法爲滲透。』

接着再作詳細的說明：

『所謂滲透，就是派有訓練的同志去加入工會。他們施展手腕，在工會的會場裡，漸漸露出頭角，受人
注意。到後來，他們採取激烈行動，爲工人的權益而提出要求，提出抗議。我們的同志往往能在工會中占據
要職。這樣，自然能控制工會，使他們的決議完全合乎共產主義的路線。可是，我說得夠了……』
他看了看錶。

『還有一位同志要來看我。從現在到六月，你有許多東西要學習。你儘可能把有關加拿大的書籍讀一
讀。』

他從桌上拿起一本小冊子來遞給我。封面上有大大的『機密』二字。

『海外服務人員應當遵守的各種訓令，這裡都有。』他說。『在工作之餘把它細細讀一讀，動身以前是要
交還的。你把那些條例熟記在心。這些條例都預料到出國人員在資本主義國家遇到困難時，應如何對付。在

最後核准你出國之前，先要考你一考對於這些規律的認識。』

這些規律，我至今記得很清楚。

『應注意結交的人，尤其是婦女。資本主義國家濫用婦女從事反間諜及情報工作。特別警告你，在火車上要格外小心。火車上的環境以及閒空的時間，往往使敵對的秘密工作人員有機會得到你的信任。最妥當的應付辦法甚為簡單：不與任何外國人作真情的談話。』

至於金錢——絕不能向外國人借錢。

『使你的妻子，在上街購物的時間，要有合理的節制。婦女在購買東西的時候，常易越出軌道。』

『上街必需戴帽子。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能不戴帽子，以免引起注意。』

『按時給工役等以小賚，如心中無特別的目的，不能多給。不能與一般人標新立異。』

『不能接受外國人的禮物，正如你不能接受他們的友誼一樣。』

『從來不得比你的客人或主人喝更多的酒。與外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必需有清醒的頭腦，堅定的措詞和機警的心靈。』

此外對於如何參加集會，在館子裡應當如何，在地下火車上應當如何，甚至如何雇車等，都有詳細的指示，處處有警告，要防範外國人的欺騙。

其中有一條說：『美國人尤其會在友誼的假面具下來誘惑你。他們喜歡用自由隨便的態度接待你，使你不知不覺中鬆弛了戒備之心。他們假裝友好把秘密告訴你，尤其喝了酒，你就很容易墮入彀中。不要相信美國人的虛偽友誼，他們是最危險的外國人。』

第二天就忙於假造和記憶自己的『出身和履歷』。每一名在國外工作的蘇聯人，他所說的出身經歷都不是

真的。這必須熟記在心。外國使領館簽證護照時所問的身世履歷，都是這種假報告。

不吐露真情，有其特別的用意。

外國當局如要電令駐莫斯科大使館調查某一個蘇聯工作人員的時候，大使館往往無法進行秘密調查，舉例說，蘇聯派出國的人員，其國內地址，所填者總不是莫斯科，而外國使館除莫斯科外，絕不能在別的城市調查什麼事情。所以，蘇聯駐外使館的工作人員，他們無從知其真正來歷。目的是使外國當局不能知道所派人員的真正工作性質。次之，此法足以防止外國的反間諜工作，無法經過那工作人員的家屬，與之發生聯繫。我報告加拿大移民當局以取得護照簽證的籍貫履歷，也和別人一樣是假的。

指導我的人，要我所填的籍貫是高爾基城，當時我就問道：

『如果加拿大當局問我高爾基城的經濟技術學院爲什麼派我出國，我怎麼回答呢？』

那給我假造資歷的人，甚至頭都不會抬起，說道：

『你祇要告訴他們你以學習性質被派出國。倘使他問你更多的問題，你就裝作不懂。他們一定以爲蘇聯人員的辦事無效率，就讓他去好了。』

我記得，後來曾與美洲科的副科長達希夫司基商討我的『資歷』問題。

『現在已經決定了，』他說，『把你作爲屬於武官之下的職員。如果加拿大當局要知道你的工作性質，你說據你所知道的是讀報，翻譯和秘書工作。密電工作必須守絕對秘密。因爲密電工作一定會引起反間諜特務的注意，使你的生活不舒適而發生危險。』

達希夫司基遞給我一疊紙張。

『這是你完全的「履歷」。由我們歸卷，把一切詳情都用心的記好，你是不准持有抄本的。』

我動身到加拿大之前的數星期，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去領取護照，那主管人員對我說道：

『發給你的是文職護照。所以你把軍職隱藏起來，你的地位是駐加大使館武官處的一個文職雇員。』

派赴海外各大使館去工作，除武官之外，最後取決於屬於共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五人委員會，這永久性的委員會，由中央黨部，政治保安局，軍事情報局，外交部及海外貿易部五機關的代表所組織。凡是外交、商務、塔斯社，電影以及臨時性質的代表工作，都經這委員會委派，目的要使所派的人員，能滿足五方面的需要。而這五個機關，尤其是政治保安局和軍事情報局，都想在外交人員的掩護之下，儘可能多派自己部門的人出國。因此常常引起意見的齟齬。

我記得有一次，情報局想利用一個空缺在倫敦派一間諜人員，而頂着海外貿易代表的名義。貿易部就行文情報局，說：

『所提出的人，並不明瞭商務。』

情報局就答復道：『這沒有關係，他可以學習的。』

這爭執就提交最後決定機關，共黨中央委員會。經過審查後，中央委員會批示說：『既屬情報工作，就不必考慮商務知識。如被派之人不適用於情報工作者，當另行遴選。』

情報總局勝利了，而事實上，貿易方面所需要的是一位工程師。行政效率誠然是談不到，但這可以證明蘇聯對於情報的重視。

達希夫司基曾經給我們作過若干次演講，我們覺得很有趣，同時也有可笑的成份。

他警告我們避免在交際場中失態。他說帶着太太出席宴會，必須指導她們如何辨別客人和僕役。

『一般的說來，』他說，『僕役們也帶着蝴蝶領結，禮服畢挺。俄國太太們未見世面，往往也跟僕役們去

握手。這必須注意的，因為主人和賓客解釋為這是無產階級外交家特別的行動，與僕役握手，表示她們的階級同情。」

他又說到加拿大，他說他對該國的知識不多。

「我祇是從美國路過加拿大，」他說。「派你們前去的主要目的，是儘可能收集一切有關加拿大的情報——我們關於加拿大的正確資料很少。」

接着他從保險櫃裡抽出若干美國和加拿大的報紙和刊物。

「北美的報紙，對於你們的工作，必有相當幫助。他們的採訪消息，報紙不僅刊載別國的秘密，連自己的秘密也會透露出來。收集情報，有時也要碰運氣。你看……」他翻開一本美國雜誌來，指着一個複雜的圖表。「你看這是美國海軍的組織系統詳圖。非常完備。你如果自己要去得到這樣一張圖表，先得在海軍部裡聯絡一個人，但報界如果這樣的幫忙，那就簡單得多了。」

美國報界如此的天真，我們都覺得好笑。

「讀這種刊物的時候，」他繼續讀說，「起初或者很不易辨別何者為謠言，何者為事實，但經過年把工夫，你就很易成爲一位專家。記住，莫斯科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計劃都有興趣。不要遺漏報上的每一條消息。一切都加以研究。重要的東西，須譯成俄文寄回本國，但必須斷定那情報是完全的，不要忘記每條情報所刊載的報章雜誌名稱和出版月日。」

「不要把片段的資料寄回來。也不要濫於收集。在讀報的時間，每人留心一個部門，慢慢成爲那一部門的專家。常常要設法求你們外國語文的進步，則能瞭解更多。向莫斯科投寫報告的時候，必須簡明。對於時事要注意其最新的發展，以免情報陳舊落後。堅定你的政治意識，祇有弱者，纔會相信那謬誤的資產階級思

想——所謂西方民主主義……」

後來，我奉令於六月乘飛機前往，我急急回家告訴安娜。

「我們可惜不能同行，」她嘆了一口氣，「但我乘船也許更適合我的身體情形。船上有醫生，或許在必要的時間，可以得到幫助。」

我突然想到，安娜分娩的時候，不僅我不在旁邊，或許四週是陌生人。

「安娜，」我對她說：「你爲什麼不留在國內，等到生產之後再動身。這裡有我的母親和你的母親照顧你……」

「不，不，不，伊各！切不可轉這個念頭。倘使等待，說不定上面忽然變了主意，到孩子下地之後，他們永遠不准我出國了！」

那晚，我到母親那裡，告訴她，我奉派到加拿大的事情，一切都已準備好了。我除了說幫助武官工作外，其餘的職責是不能說的。

母親慢慢點點頭。

「這很好。很久以前，在我們的課本還沒有改編的時候，我記得在教科書上，加拿大被描寫爲一個富饒的國家，地曠人稀，極有發展的餘地。那裡食物一定多得很……」她停了一停，用一種羞澀的語調對我說道：「伊各，你或許能把我跟安娜一起帶去吧？」

母親忸怩地微笑，好像自己覺得她的設想有些不可思議。我注意到她臉上疲倦消瘦之色。她太瘦了，她想到了加拿大食物的豐富，也欲前往。

我立刻到總局去請求達希夫司基少校。

『抱歉得很，高曾科，』他說：『你不能帶母親。妻子可以帶的，但父母不行。這是絕不通融的規律。』
『但爲什麼道理呢……？』我問。

少校嚴正地答復道：

『我對於規律，從不發生疑問。我祇有服從。我勸你也是如此爲妙。』

我到了加拿大很久之後，纔明瞭派赴海外工作人員的父母是留在國內，充當着非正式的『人質』。我明白這道理之後，就留心渥太華大使館裡的同事，他們至少有一位尊親尚在人間。我並且知道，年輕工作人員出國，必須有父母之一，仍舊住在蘇聯，也是選擇條件之一。

十五 柴鮑丁與加拿大

那天早晨我乘飛機從莫斯科出發，認識了一位平生所遇最複雜的人。此人爲尼古萊·柴鮑丁，以後我的生活與他有難解難分的關係。

『這位是柴鮑丁上校同志，』我們同赴渥太華的羅曼諾夫少校給我介紹：『他是我們的武官。』

我忘記了穿的是文官服裝，舉手行軍禮，等到發覺，很侷促地放了下來。他們曾經囑咐我，絕對不能露出軍人身份，因爲護照上寫明我的職務爲：『譯員兼秘書』。

柴鮑丁皺了皺眉頭，高聲大笑。

『你應當忘記這個習慣，高曾科！』他緊緊握我的手，說：『而且，最要緊的是，不要如此拘禮。一個文官在區區一位上校面前，不會如此惶恐的，你不會注意到嗎？至少一位將軍的威風纔能引起文官的敬意。』
我覺得很寬懷。對下屬如此想得周到和隨便，這是以前所不會有過的習慣，我心中不禁發生了感激之

情。初次相見的熱誠印象，我常常記得，後來得到他被『暗殺』的消息，使我十分悲悼。我揭發了加拿大的間諜網後，柴鮑丁被莫斯科強迫召歸，消息傳來，說他在歸國的船上『失蹤』，莫斯科後來雖曾否認，但這是很難相信的，我斷定柴鮑丁一定代我受過了。

柴鮑丁是大規模間諜網的組織者和首領，如果不是我的揭發，這間諜網今天還在刺探你們的原子能秘密，你們的國防計劃，你們政府的種種機密。柴鮑丁成爲主要的犧牲者，自然是必然的結果。

他身材高大，儀表漂亮。他一定受過很好的教育，用俄文演講起來，修辭的雅麗，令人覺得頗爲動聽。克里姆林宮選擇他擔任這個重要職位，理由很明顯，除了他的能力和在情報方面的廣博經驗，柴鮑丁的儀表，處處表示他是個軍人，而那時紅軍在民主國家正享受着極大的聲譽。

安娜送我到飛機場。後來，我們奉命走上一架美國製的DC4飛機，我與安娜接吻告別。她輕輕對我說道：

『自己當心，伊各……你……你等我到加拿大來嗎？』

寂寞的陰雲立刻掩蓋了新奇的前途。我緊緊握住了安娜的手，不知如何開口。勇敢的安娜立刻堆下笑容。把我輕輕推開。

『不要這樣，伊各。飛機正等着你，上去吧。下個月我就到加拿大來跟你一起了。』

默無一言，我轉身往飛機趕去。事實上隔了四個月，安娜方到我地方來。她是十月到加拿大的。

在四天的航空旅途中，柴鮑丁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伴侶。他常常談到他在軍中服務的經歷，他在軍中曾以戰兵軍官頗著功績。他談說這類故事的時候，往往提到將領們的名字，總是附加一句說明：

『後來，在清黨的時候，這人槍斃了。』

而且很感慨的說，『我很奇怪，我爲什麼沒有給槍斃？』

大家高聲發笑，而柴鮑丁的笑聲最高。他拿出一瓶伏特加來，這是大大違反空軍規則的，我們『偷偷』地舉杯祝賀他的『安然無恙』。

翻開我的日記，對於這次飛行有許多興奮的記載。

當我們的運輸機在艾特芒吞城的機場將要降落的時候，我用安全帶把自己緊緊縛住，從窗子裡望望機場外面的房屋，因爲機身的震動而似乎都在搖晃。一切步驟雖曾經過國內官長的訓示，但當前的情形，似乎都有些異樣。飛機落了地，滑到一個飛機棚的旁邊停下來了。我慢慢解開安全帶，很留戀對於熟悉的俄國作此最後接觸，好像有些不願走上這奇異、可怕的外國國土。但柴鮑丁却毫無猶豫之態。他第一個走出飛機。

我走到陽光之下，即有一群青年坐在卡車上疾馳而來，顯然是搬卸行李和郵件的。他們都穿着制服，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是皇家加拿大空軍的制服。大概我一定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所以其中一人笑着高聲嚷道：

「喂——約瑟好嗎？」

我莫名其妙的看着羅曼諾夫，他也搖頭。這句英語我是懂的，但不知道『約瑟』兩字指的什麼。如果我們當時明瞭那『約瑟』兩字指的是約瑟夫·史太林，我跟羅曼諾夫真不知要如何的吃驚了。在那樣情形之下，我們祇有照着訓令辦：『如有懷疑，就裝着不懂，不要開口。』

我們對於加拿大的知識，立刻無望地糊塗了。

我們當然看過許多關於加拿大的參考書。可是我們居住的那艾特芒吞大飯店，食物如此之豐盛，大街上店舖裡衣服、糖果以及各種奢侈品之堆積如山，這些都是想像不到的。還有無數的汽車，而坐汽車的人顯然並沒有什麼官職，真令人驚異萬分。我們從艾特芒吞繼續乘加拿大國家鐵路的火車到渥太華去。路旁的麥田

，延展無際，土地、森林、湖泊以及城市鄉村的房屋和園地，處處反應着這國家富庶。

我們在餐車裡，恰好查票員來查票。不知爲了什麼，柴鮑丁對他說過，我們是剛從俄國飛來的。茶役聽見了這談話，隔座穿着加拿大軍服的人也聽到了。我們自己沒有注意到，差不多整個車廂的人，都知道我們纔從蘇聯飛來的了。我們奉令一切要保守秘密，儘量說謊，使別人不知道我們的事情，所以弄得很窘。而柴鮑丁和羅曼諾夫都穿着制服，自然無法隱瞞的了。

困難是在我們不知道如何應付這些陌生人，他們似乎很友好愉快。在那三夜兩日的旅程中，跟我們說話的人，差不多都是這樣開始：

『近來俄國的情形怎麼樣？』

我們自然答復得很當心。誇張着祖國的偉大和神妙，而注意着他們的反應。真有些令人不解，他們都相信我們的每一句話，點點頭說道：

『戰時，你們的表現真不錯！』

有的說道：『史太林一定有他的辦法！』或者是『共產主義這東西，一定有奧妙，能產生你們那樣的戰士！』

離開艾特茫吞的那天下午，我在火車過道裡碰見羅曼諾夫，他剛從別的軍人房間裡喝了酒走出來。

『我無法拒絕他們，』羅曼諾夫用俄國話說。『他們似乎都是親蘇的。然而都是資本主義者。』

我也有同感。

『不僅如此，』我說：『他們似乎一點不怕特務人員。你不是也聽見那軍人在酒排車裡大大批評政府的辦理兵役嗎？』

羅曼諾夫作了一個惶惑的表示。

『我簡直不懂。他們似乎無所顧忌。我乘機問他兵役的詳情，他告訴我的許多事情，甚至我寫到日記本上的時候，自己都有些猶豫。他竟說魁北克和盜泰利奧等省的不睦。反對國務總理的人很多，他說政府如果此刻不好的幹下去，戰後給共產主義一個他媽的好機會。』

羅曼諾夫聳聳肩頭，接着說道：『那時我在車子的另一端，還有四個人聽着那軍人的高談闊論。兩人發笑，另外兩人似乎也贊成那種議論。其中一人笑着問我，俄國是不是也有言論自由。』

『你怎樣回答的？』

『我說我們有的。』

兩人都沉默了。大約隔了幾分鐘，羅曼諾夫方始開口，他低聲說道：

『我們告訴他們關於俄國的事情，你覺得他們都相信嗎？』

『他們都相信的。』我說。

『這是很有趣的民意表現。』他說時有些猶豫。

我心中也想：加拿大爲什麼也要變成共產主義呢？任何方面都比蘇俄好。羅曼諾夫想有同感。他看了我一眼，立刻回頭望望，好像在提防有特工在窺探我們的思想。

『吃飯的時間到了。』他忽然說。接着又想到了別的事情，問我道：『艾特芒吞的店舖裡，擺滿了手錶，你留心到嗎？』

我點點頭：『怎麼沒有注意到！火車上差不多人人都戴着手錶。我不知道到了渥太華，我們能不能也買一只？』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一定有許多可笑的地方，好像剛剛降生到民主世界的嬰兒。但是你們所毫不重視的每一樣小東西，你們談話的無拘無束，你們坦誠的報紙，你們所享受的豐富食物，這一切的一切，對於從饑餓而被桎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前來的我們，都成爲奇境中的奇事。

起初，渥太華武官處祇有我們三個人。那時工作很少，而三個人的情誼又非常融洽。柴鮑丁上校，羅曼諾夫少校和我，很自由地討論着各人的印象。我們同去看了許多電影，而每當片子演到緊要關頭羅曼諾夫總是在座位上呼呼入睡，成爲我們的笑談。柴鮑丁之爲人，很容易跟他一見如故，他常常爲我尋到被邀請的機會，到郊外去玩，去作游泳等消遣。我等於上了天。渥太華的美麗，夏季天氣的可愛，食品之多，令人無法相信，還有館子、電影、大店舖、人民的絕對自由，綜合起來造成夢一般的美景。

不久之後，武官處其他的職員也陸續到了，柴鮑丁在衞其街買了一所房子作爲我們的工作根據地。工作逐漸正式了，我們的關係也公事多於私事了。不再有郊外遊玩之事。柴鮑丁把所屬職員粗粗分成兩組：外交與技術。屬於外交組者有柴鮑丁，莫鐵諾夫，羅各夫，後來還有杜馬希夫。他們都穿軍裝。我的密電任務因需保守秘密，所以穿便裝。

我漸漸感覺我那套衣服的不高明，這是灰黑色的，按莫斯科的標準當然算非常漂亮的了。我從情報局的特別商店裡選來的，凡出國人員都在這店裡購領「洋裝」。從衣服上的牌號去看，這是從立陶宛一家店舖沒收來的，對我的身裁略大一些，而且皺紋很多，但這已是上等貨色了。照莫斯科黑市的價格，這套衣服，連了外套，袜子、內衣、襯衫、領帶等，要值一萬五千盧布。

雖則太大，太多皺紋，可是我第一次穿着在莫斯科街上走過的時候，却引起人人注目。比起旁人來，這衣服着實出色。我平生第一次感覺到別人把我看成要員。

有一天，我在莫斯科「紅門」車站等待安娜的時候，却惹出了意外的麻煩。安娜遲遲不來，我發現有幾個便裝的人，從各個方面注意着我。在情報局服務的經驗，告訴我這些是政治保安局的特工，可是我有恃無恐，因為身邊帶有情報總局的證件。

因為想避開他們，我就往街上走，可是從一家玻璃窗裡反映出來，我是被人跟隨着。我就走回車站。安娜還沒有來，我就決定回局裡去了。正在這利那間，兩個監視我的人走了前來，要我跟他們去。我被他們在保安分局裡扣留了幾個鐘頭，因為他們不承認我的證件，打電話到保安總局，保安總局再向情報總局證實之後，方始釋放，全無一語向我道歉。

這套衣服，在渥太華簡直醜陋萬分，令人憎厭，可是在另購新衣以前，我有很長一段時期，注視着裁縫鋪的櫥窗。

X
X
X
X

幾天之後，我被派到大使館的密電室。該室主任奧斯本斯基給我許多工作的規則。奧斯本斯基後來調到華盛頓擔任同樣的職位。

他把隱藏在樓梯欄杆裡的電鈴指給我看。按了鈴之後，然後走上二樓。密電室在二樓獨占一部分，與外界隔絕，一扇鋼門遮掩在絲絨門帘的後面。拉開門帘，必須把臉放在門上的一個孔穴，讓裡面當班的人，在開門以前，知道進來的是什麼人。

經過了第一道門，然後等待守衛者給你把第二道更大更厚的鋼門打開。進了第二道門，即為鋪着地氈的走廊，有若干鋼門開到幾間小房間裡。窗上的玻璃都漆着白色以防透明。外有鋼柵保護，晚間更有鋼的百葉窗。

在辦公時間，奧斯本斯基辦公室裡永遠開着收音機，爵士音機，流行歌曲，商情報告，雜七夾八的開個不停，目的不在娛樂，而在使裡面的談話不致被人窺聽。

走廊盡頭的兩個房間裡，各裝焚化爐，隨時焚化字紙和文件。一般職員只准用左面房間裡較小的焚化爐；僅有奧斯本斯基可以進另外一間，裝着大焚化爐，這是特別到吐命吐定製的。

要裝這樣的大爐子，因為以備萬一的時候，能迅速燬滅大批的案卷、密電本、報告、文件等等。政治保安局派在加拿大的首領貝夫洛夫，他說這爐子是他設計的，開玩笑地說道：

「大得可以燒掉人。」

這使我心中暗暗害怕，我常常想究竟是不是作此用途的。我逃走之後，我想大使館一定恨不能把我燒化在裡面。

接到電令，如要銷燬一本密電碼，同時必有命令組織一個委員會，監視這稀小的焚燬工作。這委員會包括武官，密電員，機要主任，和「隣居」的代表，所謂隣居乃是指政治保安局方面的人員。

到執行的時候，奧斯本斯基把那密電本親自動手，一頁一頁撕下來，放進爐火中去。他一頁一頁數着，專心注意着。他往往手指發抖，滿頭大汗。

大使館的秘密是無人敢談論的。亂說亂講有極大危險。有時有人說了無關的話，就有人報告，而受嚴密的盤問。任何不滿之言，無論如何的細微，都被解釋為「反蘇」，犯者往往立刻被遣送回莫斯科。我們最怕的是，如有錯誤言行，被列入「黑名單」。如果知道你的名字已在單上，也不給你辨白的機會。因此祇要在同事中有了仇敵，就极易排除你——這種心理極難使工作有愉快的環境。

某晚，我檢起一份新近從莫斯科寄來的『布歇維克』報，上面登着一篇記述美國工業發展的特稿，作者是有名的經濟學者伊夫琴尼，他用『伐加』的筆名，他描寫戰時美國工業的進步情形，大致是正確的。但他描寫工人生活，實是一派胡言亂道。他說他們在可怕的奴隸制度下受苦，餓着肚子，住在破陋得慘不忍睹的家庭裡。他描寫監獄，說資本家以恐怖強迫工人生產。他說那些工人爲了完成『新的生產數字』，死在機器旁邊。

如果我在國內讀到這樣的文章，必信以爲真。但親眼看見過加拿大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形之後，我乾乾脆脆斥之爲：

『說慌！』

其時同在屋子裡的安其洛夫，問我什麼事情。我就把那篇文章扼要的說給他聽，安其洛夫也笑了。可是他立刻警覺，改變着正經態度道：

『伐加比誰都看得清楚，』他說：『大體說來，我告訴你，你想得太多了。』說完站起來，昂然而去，把我留在無窮的恐怖中。幸而以後沒有發生什麼下文，我想我未被報告。而安其洛夫本身却有一個案子，使他倖免於難。

他在莫斯科總局裡認識的一位年輕女人，他知道已分派到華盛頓蘇大使館充當秘密工作。他是個獨身漢，就做出一件很自然的傻事。他給她寫了一封恭維備至的書信，在他投郵之前，我們讀了都放聲大笑。

兩天之後，華盛頓來了一個給柴鮑丁的密電。嚴詞譴責柴鮑丁，說他太糊塗，竟讓兩大大使館之間，有這種『危險的通信』。

柴鮑丁勃然大怒，向發抖的安其洛夫嚷道：

「你幹什麼！你發昏了嗎？在海外工作不容許你有這種胡鬧行動。再有這種事情的話，立刻送你回莫斯科去！」

這其實，是稀小的事情。但足以表示我們是被管制得如何嚴密。

我們到渥太華不久之後，海立法克斯蘇聯領事的助手顧森科來訪問我們。柴鮑丁似乎很熟悉這位顧森科的，毫無保留的告訴我，他也是「我們中人」，當時我還不甚明瞭。可是，他們兩人之間會有極長的秘密談話，他走後又有三次交換情報的書信，其中有一封是關於加拿大從西岸將飛機工廠移赴東岸的事。再後來，海立法克斯領事館另有一位職員因公前來，在餐廳裡；我一眼就認識他是曾在情報總局受過訓練的朋友，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蘇聯領事館也是它間諜的巢穴。

一九四三年的七月，我們到了加拿大大約一個月光景，柴鮑丁接到海立法克斯加拿大海軍的正式請柬。柴鮑丁派羅曼諾夫少校代表，叫他張開眼睛看。」

羅曼諾夫回來的時候非常高興。我跟柴鮑丁坐在武官辦公處的會客室裡，羅曼諾夫滿臉笑容的衝進來，他沒有注意到我在旁邊，向柴鮑丁報告道：

「你或許要嘉獎我的成功，上校同志！」一面把若干文件放到柴鮑丁的辦公桌上。其中有一份，我望過去，在右下角標明是海立法克斯軍港的詳圖。上端印有「機密」二字。

柴鮑丁站了起來，臉上有驚奇之色，他用手指摸摸那些文件，然後看着羅曼諾夫問道：

「你從那裡得來的？你要知道在這匆匆的訪問期間，當着加拿大海軍軍官的面偷竊這種文件是不智的，他們一定能够偵察出來……」

「上校同志！」羅曼諾夫搶着說。「有一個軍官他很隨便的借給我，祇要我仍舊歸還給他。我真有些不相

信，但事實是如此！」

柴鮑丁低首細細研究那地圖。沈默了一會，他自言自語道：「可能是假的。」

「我也這樣想，」羅曼諾夫說。「可是我在參觀的時候，細細校對地圖上的每一座建築。這地圖絕對無誤。」

「我簡直不瞭解這些加拿大和美國軍官，」柴鮑丁對我說：「他們竟把我們看作自己人一樣。」

十六 人事糾紛

渥太華的蘇聯使館人員，顯然生活在民主森林中一個隔離的天堂，同時也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勾心鬪角的具體實例，可是不久就使我有厭倦之感。我從密電室窗戶的鋼欄柵裡呼吸到清新自由的加拿大空氣，可是前後左右，爲了稀小的事情，常常有醜惡的爭吵。僞善的大使館，原只有薄薄一層道義的表皮，這種傾軋與排擠，使這表皮也撕開了。

老朋友羅曼諾夫少校，在嚴重的困難之中。誠然，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不好，但最主要者，那些裝作他朋友的同事，常常在用暗箭傷他。

事情開始於塔斯社駐加主任施維以諾夫的請客。宴請一個大報的新任編輯。客人之中，有羅曼諾夫和大使館一等秘書貝洛斯鐵考夫，及其結婚僅有數日的太太史馬金娜。

據外面流傳的故事，當我們初來的時候，史馬金娜是在使館的秘書部門工作，她使羅曼諾夫得到印象，認爲她很有意於他。羅曼諾夫進行到什麼程度，我無從知道，但他後來發現這女人若不是政治保安局的正式特工，至少是與特工有關，因爲羅曼諾夫的一言一動都給報告了。

那晚宴會席間，普通的酒以後，繼之以威士忌，羅曼諾夫愈喝愈陰沉，而貝洛斯鐵考夫及其太太則愈喝愈快活。

羅曼諾夫突然之間向他對面的貝洛斯鐵考夫高聲說道：

『你對於你那姨子老婆爲什麼如此得意？她不過是個特務賤人！……』

貝洛斯鐵考夫勃然大怒，臉色發白。他傾身過來，掌摑羅曼諾夫的嘴巴。羅曼諾夫一手搶住，使勁拖住，把一等秘書拖越桌子，於是桌上的瓶子、碟子、饌肴、銀器、花瓶等等滿地亂滾。數人合力排解，方把兩人分開，將羅曼諾夫送回了家去。

羅曼諾夫在白天清醒的時候，辦事勤奮，與同事也和氣，柴鮑丁很喜歡他，所以想把上面的亂子，作爲一種酒後鬧事的平常事件，設法給他掩飾過去。而羅曼諾夫喝醉闖禍的事，原已不止一次了。

但此次貝洛斯鐵考夫事件却比過去大得多，至少給柴鮑丁的一個助手莫鐵諾夫中校以機會，用冷箭去傷害他的上司。他乘柴鮑丁暫時離開渥太華的那天，給莫斯科發出了下列的電報：

『茲呈報羅曼諾夫少校的荒唐行爲。他已打過五次架。在武官寓所的前面，於大街上跟羅各夫少校打架。在宴會席間喝醉好幾次，都需要別人擡着回家。在宴會及社交場合總是表現挑釁的態度。在塔斯社宴會席間毆打大使館一等秘書貝洛斯鐵考夫。柴鮑丁非但不責罰他，還替他辯護。三天前，他在自己寓所請客的時侯，與捷克軍官打架，在扭作一團的時候，拉掉了捷克武官的袴子。柴鮑丁夫婦及高希考夫均在場。第二天羅曼諾夫沒有辦公，柴鮑丁替他解釋，說他生病。我認爲必須作嚴厲處置。』

這電報翻了密碼，下面用莫鐵諾夫的化名『蘭芒』具名。接着又有第二個報告：『羅曼諾夫荒唐如故。柴鮑丁不欲採取嚴正辦法。蘭芒。』

我雖注意到莫鐵諾夫的此項陰謀，可是經驗教訓我守口如瓶。如果告訴了柴鮑丁，那末莫鐵諾夫一定知道是我『說』的。

接着是莫鐵諾夫展開他更大的陰謀傑作。

到了紅軍節，柴鮑丁照例須把武官處的得力人員向莫斯科保舉獎勵。名單中並未列入羅曼諾夫——柴鮑丁究竟是個正直軍人。

他把名單的草稿寫成之後，當着我面交給莫鐵諾夫，說道：

『我忙得很，你給我照着規定的格式填一填吧。』

『是的，上校同志！』莫鐵諾夫拿着出去了。

後來，莫鐵諾夫趁柴鮑丁極度忙碌的時候，把表格放到他辦公桌上。柴鮑丁沒有時間細看，就照例簽了字，揮手叫助手拿去。

莫鐵諾夫把表格交給我譯成密碼的時候，我的眼睛都突出來了。在下半頁多了一句文字：

『羅曼諾夫少校達成我交給他的使命，我建議應予獎勵。』

這句話，加了以前兩次密告的電報，足以誣陷柴鮑丁的說謊，以及他的不盡職責。我擡頭看看莫鐵諾夫，發現他向我緊皺眉頭，好像準備應付我的任何異言。我耐心裝着一個笑容，如若無事的點點頭。

他顯然在玩着有計劃的狡謀，使莫斯科懷疑柴鮑丁的辦事效率，把羅曼諾夫的名字加進名單，其陰謀已發展到最高峯。

我把莫鐵諾夫竄改的表格，再細細一看，又發現商務參贊處的蘇古洛夫少校，也在裡面。蘇古洛夫最近得過獎章，照例不應再行保舉。這又可使莫斯科發現柴鮑丁辦事的糊塗。

我譯好密碼，寄往莫斯科，心中決定默不作聲。莫鐵諾夫這傢伙是不好惹的。不久，莫斯科的命令果然來了。

『羅曼諾夫因其可恥行爲，立刻遣送回國，職務暫由安其洛夫兼代。局長。』柴鮑丁有些目瞪口呆。

『莫鐵諾夫！』他喊。

莫鐵諾夫奔進辦公室來。柴鮑丁把電報遞給他，『你瞧一瞧！』

莫鐵諾夫細細讀了一遍，舉目看着柴鮑丁。我當時覺得他曾飛速的看了我一眼，但我裝作在研究一份公事對他不加理會。

接着是大家默無聲息。莫鐵諾夫和我都不能猜透將有如何的下文。接着柴鮑丁用拳頭拍着桌子，忿然說道：

『貝夫洛夫那王八羔子幹的！』

我不敢看莫鐵諾夫，但把這件事歸咎於政治保安局身上，我想他一定大大鬆了口氣。

莫鐵諾夫立刻恢復了他的輕鬆態度。『我以後總也不願把貝夫洛夫請到家裡了。人家當客人待他，他却把無關緊要的事情暗暗報告，可憐的羅曼諾夫竟成了他的犧牲品。』

X X X X

武官處還有兩個職員的遭際，也是使大家有不快之感。

在慶祝紅軍節的期間，古特烈資夫奉派到加拿大西部的若干地方去演講。他的講稿由莫斯科發來，譯成英文，叫他背熟了去發表。如果聽衆提出問題，他奉的指示是：

『用模稜的措詞回答，而最好是不予答復。』

古特烈資夫大約熱心過份，他的答復，超越了上述訓令的範圍，引起了報紙的述評，完全與共產黨的意願相反。他受了嚴厲訓斥，雖曾向報界更正，說記載有誤。

還有一位武官處的繙譯員雷文中尉，也是犯了類似的錯誤，他派到多倫多去向加拿大的一個青年集會致詞。第二天，他的相片和講詞在多倫多一家報紙上登載了出來。

回到渥太華，就被莫鐵諾夫喊去大罵一頓，甚至房門都不關閉。我們從外面清楚地聽着莫鐵諾夫在誦讀多倫多報紙有關雷文演講的剪報，大約是這樣的：

『蘇聯需要世界各小國的友誼，而不能忘記它們對蘇聯的不友好態度。它們到蘇聯去尋覓友誼時候，蘇聯會記得它們過去的不友好行爲。』

莫鐵諾夫歇了一歇，就斥責雷文道：『你知道你這是胡說亂道嗎？你完全與莫洛托夫外長反調，莫洛托夫最近的演講，保證世界，蘇聯願與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發生毫無私意的友誼。我奇怪柴鮑丁上校竟會派這樣的糊塗東西出去演講！』

不幸得很，柴鮑丁不會把此事報告莫斯科，或者因為他事情太忙，或者他不願把小事擴大。但莫鐵諾夫或貝夫洛夫却報告了，莫斯科立刻有電報來，謂雷文的言論，乃是『政治的文盲』，並令飭柴鮑丁立刻設法提高屬下人員政治警覺性的水準。

在武官處一次會議席間，莫鐵諾夫大大誇張這個雷文事件，他說：

『情報人員對外必須避免露面。一個情報人員的照片竟在報紙上登了出來，他祇有辭職改業。』他又說道：『現在人人都認識雷文，他還能和間諜人員接觸嗎？』

這是我在會議席間，第一次聽見公開承認，蘇聯是在加拿大作大規模的間諜工作，凡是大使館和武官處的人員，個個與『間諜』直接發生關係。

我開始感覺這間諜活動的於心不安，經過是這樣的：安娜到加拿大來了，我們的孩子安特烈也已出世，渥太華塞姆山德街五二號公寓的房間，令我意外的滿意。我其時在加拿大已有相當時間，認識加拿大的自由選舉，確是自由的，言論自由也真的，工人不但能自由說話，且能自由罷工。

我寓所附近有一家水果店，這店子的老闆，在不知不覺中，他對於我的決策發生了深刻影響。他是立陶宛人，年紀很大，簡直不會受過學校教育；他的一言一語決非宣傳。除了他店舖裡橘子、梨、桃、香蕉等等水果的豐多之外，他說的話常常使我驚訝。有一次，我問他加拿大即將舉行的大選，他高聲回答道：

『我這次決不投自由黨的票——上次我不選他們，這一回更不投他們的票了。』

說這話是在戰時，而自由黨正掌握着政權，使我覺得十分驚異。後來他又告訴我，他爲了被侵害財產，控告渥太華市政府，這真使我們更加奇怪了，人民控官，在蘇聯完全是聞所未聞的。這水果商人，到加拿大來約有十五年，對秘密特工，絲毫不存誠心。他是不認識我的，連我的姓名都不知道。可是他對我無所不談，莫斯科人民就絕對不敢。他周圍的許多水果，也是莫斯科人民所多年未曾嚐到的。

共產黨統治世界的計劃，就是以這些人民爲征服的目標，我心想。即以這水果商爲例。他正受我的羨慕。但我們却要摧毀他。這一顆懷疑的種子，那時已深深埋在我的心中。我當時不敢承認。現在想來，却早已存在的了。

我們常常恐懼着被召回莫斯科。因爲這祇要一紙電報。裡面用一個老套的理由：『另有任用』。所謂『另有任用』，可能是發配到西伯利亞效力。我們甚至對升遷的命令都發生懷疑，因爲常有人接到『升級』命令回

到莫斯科就『失蹤』了。其原因，往往爲那被犧牲者久已遺忘的不慎言論所造成。也可能是仇敵的誣告，被告者絕無解釋的餘地。蘇聯政府不信任他的人民，是它制度的最大缺點之一，同時也是使在『鐵幕』之下工作者，常常不能放心的原因。

我慢慢聽到許多醜事醜聞。有一位商務參贊手下的工程人員吉森諾夫，某日在夏都勞里飯店的酒排間裡跟我喝啤酒，他告訴我，他忙了一個早晨奉令爲莫斯科採辦五十輛兒童腳踏車。

『我自然定購了五十三輛，』他笑着說：『我們部分的三位同事各人留下一輛，一起報公賬。』

『但莫斯科買五十輛什麼用呢——作爲仿造的模型嗎？』

吉森諾夫不禁大笑。

『從你的經驗說，我的伊各，你還不過是個小孩子。這些腳踏車是政府要員們的公子小姐用的。也像別的東西那樣，直接運送到克里姆林，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當然啊。一批一批的皮貨，衣服，鞋子，照相機，獵槍，收音機，錶——凡是想得到的奢侈品應有盡有。他們定購的衣飾，都有尺碼，我們慢慢從這種尺碼，可以推斷這是政治局那一位用的。做大亨不錯呢，是不是？』

『但賬單呢？——你給他們一個一個分別送去？』

他又大笑了，喝了一口酒，用秘密的神情告訴我道：

『別傻了！不必把細賬開到莫斯科去的。都是算作商務參贊處的公費，而商務參贊的報銷是從來不發生批駁問題的。』

我詫異得默不作聲，政治局的一舉一動，在莫斯科是無人管制的。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民主國家，必引起無窮的攻擊，但克里姆林宮對於財政是從來不公開的。

杜馬希夫中校前來接替羅曼諾夫的職務，造成了武官處更多的不睦。柴鮑丁最後還想保持羅曼諾夫，叫我發了一個電報給莫斯科：

『杜馬希夫不適宜於這裡的工作。』

莫斯科巧妙地回電說：

『杜馬希夫原在總局任事，主管人員認為成績優異。在你指導之下，對新工作必能勝任愉快。局長。』

另有一電，吩咐杜馬希夫的化名為『梅侖』，但第二天又有電報來改為『達爾文』。我想大概前面那個，或許早給別人用過的了。有種種跡象證明莫斯科對杜馬希夫的印象甚佳，柴鮑丁也就無話可說了。

我在總局裡早已認識杜馬希夫，曾有兩次帶他見我的母親。可是他帶來的消息，却不是令人欣喜的。爲了談話的方便，我跟他風景如畫的里多河邊閒步，一面談談家鄉的情形。

『我離開莫斯科之前，曾與你的人告別，』他說：『你的姊姊在工作，你的母親則就在家裡。生活很苦，要我告訴你多寄些吃的東西去。她說她自你別後，祇接到過一次。』

我覺得十分驚異：『我至少寄了十次給她。到了那裡去了呢？……』

杜馬希夫岔着道：『對啊，我想你一定寄得很多的，但我告訴她，在這年頭，有什麼辦法呢？偷竊在俄國已成流行病，我想任何饑餓國家都是如此的……』他指着我們走過的一個加拿大家庭，『男人做工回來，可以放懷大嚼，不必考慮到糧食問題。糧食和吃飯成了人生的重大問題，簡直是最不愉快的現象。』

我們默默地走了一大段路程，然後杜馬希夫好像在心中辯論很久之後，說出一個結論來：

『自由企業實在是偉大的事情！』

我看看他，驚異萬分。這種論調是極端危險的。我所受的訓練，像警鐘似的在腦子裡響着。杜馬希夫猜得到我的感想嗎？我看看他的側影，他似乎一點也不會注意。爲了穩健，我就把談話的題目移轉詢問他總局裡若干老朋友的近況。

回到辦公桌上，我的情緒並不好。想到遺失的那些食物郵包，母親的生活情形，杜馬希夫的議論，可能他是前來充當特工的，使我有點擔憂。次之，柴鮑丁正在大發脾氣，因爲加拿大調查局正在調查盜泰利奧省政府秘密警察所揭發的案子，說加拿大共產黨接受了蘇聯大使館四萬元的津貼。

大使下緊急命令，任何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俱不准答復新聞記者的任何問題。柴鮑丁接着召集武官處全體職員，警戒大家對外國人，尤其是記者，說話應特別小心。

柴鮑丁於開過會後，同我一起到密電室，查看我給他發出的電底。他心不在焉地翻閱着檔案。

『你可知道，』他對我說，『渥太華有家報紙把我的姓名牽連到那四萬元的津貼事件。』

我駭然的擡起頭來。

柴鮑丁看我吃驚，他堆下笑容說道：

『當然，我沒有給他們這筆錢。然而誰知道，也許貝夫洛夫或古薩洛夫經手的呢？』

大使館立刻感覺到報界對此案探詢得無微不至。一等秘書貝洛斯鐵考夫，正式否認蘇大使館曾給加拿大共產黨四萬元助其競選，一本正經的說，蘇大使館係蘇聯政府駐加代表，對加拿大內部的選舉事項，毫不發生興趣。

莫斯科對此事却意外地甚爲鎮靜，惟令飭柴鮑丁將詳情具報，並說明何以牽涉到了他的名字。這訓令使

柴鮑丁有一時期十分不安，直到後來調查明白，報紙上不過偶然的說到他罷了。但我却很奇怪地問他，爲什麼報紙剛一刊出，莫斯科就知道了呢。

柴鮑丁指指壁上掛的加拿大地圖。

『在這一個人口不滿一千二百萬的國家，』他說，『有五個情報系統與莫斯科發生直接關係。每一個組織都樂於把不利於另一組織的消息趕快向莫斯科報告。最近我偶而發現渥太華又多了一個蘇聯的情報網，隸屬於莫斯科的陸軍情報局。』

我一定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柴鮑丁笑道：

『哦，不必驚奇！有時雖覺得有些討厭，但這樣效率更高。』

四萬元這件案子之後，大使館一切防備得更爲嚴密。我不知道他們防備些什麼，柴鮑丁身邊常常帶着手槍，命令衛兵檢視他們的武器。管大門的人，奉命每日於下午七時以後，無論給什麼人開門，都得拔出手槍，準備萬一。當班的工役每小時查看辦公處的房屋門窗。柴鮑丁呈請莫斯科，准其將大門換上堅韌橡木的新門，並在武官處房屋四周，加立木柵，以防可疑的行人接近房屋。

有一天早晨，當班的發現雪地上有一行脚印，一直通到貯藏室的窗口。於是大加偵察，結果除了增加緊張情緒之外，別無所得。

大使館機要室的主任阿雷克薩希金，開始檢查每一張辦公桌和保險櫃。從大使辦公室，到商務參贊處，然後又想檢查武官處的房屋。但柴鮑丁乾脆予以拒絕。於是紛紛向莫斯科打電互相指責，柴鮑丁的理由，以爲阿雷克薩希金有權注意文卷的安全，但無權檢視文卷的內容。結果是柴鮑丁勝利了，但莫斯科命令他自行檢查。他往往夜裡突然到辦公室，第二天早晨召集同人，拿出夜間被他所發現未經歸好的文件。他嚴厲訓斥

，使我們常常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在抽屜或辦公桌上遺留真正重要的文件。我們還恐懼着別人的過失，牽涉到自己頭上，因為一個人在遭遇恐懼的時候，往往爲了自已的安全，什麼卑鄙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蘇聯國務署，對於進口物品限制得原很嚴厲，在那一個時期，似乎比以前更嚴了。引起了相當不愉快的猜測。

莫斯科寄了一張詳盡的單子來，凡是海外工作人員歸國時不准攜帶的東西都列在單上。其中有一項爲『毛線編織法』一類的書籍。那晚我問安娜，這是什麼用意。

『那是很顯明的，』她說，『這種書籍將告訴人民，外國有羊毛線，婦女們可以編織毛線衫、袜子等等……』

安娜很憤慨的說，『這可以使俄國人發生懷疑，官方所描寫的民主國家，都是騙人的話！』

我幾乎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不知不覺地驚恐地往後面望了一望，看看有沒有人在窺聽。但我們的寓所裡並無別人。這是我們獨有的小小堡壘，有其神聖的秘密。安娜那樣自由爽快的說話，正如民主國家家庭裡一模一樣。

這許多思想，立刻在我的腦海泛濫，好像安娜的話給我開了閘。這種思想使我驚怕得祇有默默坐着，原想警告她的話也忘記了。對的，安娜的話完全對的！我突然覺得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那些同事，都十分可厭。

第二天早晨我從秘密卷宗裡，把海關進口規章翻了出來，細細加以研究。對啊，禁止的目的正就是安娜昨夜所說的。

普通的刊物如生活畫報時代週刊等都是嚴格禁止的。不要說這些刊物的畫片文字足以影響蘇俄人民的思

想，就是紙張之佳，也足以引起欣羨之感。

像清潔所用之真空吸塵機也是不准帶回去的。理由很簡單。左右鄰居的太太們對這民主國家的神奇東西必大感興趣，如果聽說民主國家人民家家有此一具，更要詫異了。

帶回汽車，僅限於『特殊情形之下』，而必須爲『普通型式』的汽車。但我們都會聽見過一個故事，華盛頓使館裡有一位上校武官把一輛福特車帶回莫斯科去。海關上一位當班的政治保安局的少校對他乾脆說道：

『你不需要這車子。』

上校忿然地去找情報總局的要員鮑夏高夫中將，他答應想辦法。官階高辦法也大，中將把汽車領了出來放到情報局的車房裡。上校去拿車子，那管車房的人很驚奇地看看他：

『你說誰的車子呢？從美國運來的福特嗎？這是鮑夏高夫中將的車子。他說有人給他從美國帶來的，叫我替他檢查一下機件。』

上校垂頭喪氣再去找鮑夏高夫。鮑夏高夫很不耐煩地說道：

『我很奇怪，你老是把這些小事情來麻煩我。總之……』他指着面前的幾張公文，『我剛接到這公事，要我調一個上校派到蒙古邊境去，你到那裡當然用不到什麼福特車了。』

上校的汽車公案就此了結，但那車子本身却還有下文。有人把這事情密報了克里姆林，于是一紙命令，把這車子送到克里姆林的車房去。

羅曼諾夫動身歸國之前，他到我的辦公室來研究海關的進口許可規則。

『連吃的東西都不能帶多少？』他高聲說，把單子放回到我辦公桌上。

他眼睛血紅，面色陰沉，自從有了召歸消息之後，他日夜喝酒。甚至對於答應設法保留他的柴鮑丁也頗不滿意。羅曼諾夫懷疑他並沒有替他設法，或者還促成了他的被召回國。他一方面又擔憂着到了莫斯科不知要被如何發落。

我在空閒的時候，幫他買東西，多買了些鞋袜之類的小東西，好像他作爲搬夫等的小費，因爲金錢在俄國沒有多大價值的。我還給他核算賬單和發票，因爲海關上的特工，都是詭計多端，處處想法揩油的。羅曼諾夫也知道這門檻，所以托我特別買了許多包皮紙和繩索，免得他們藉口包裹破碎，竊取東西。

離別的那晚，羅曼諾夫在他的寓所裡請客。大家都對羅曼諾夫表示同情，連暗暗報告他的莫鐵諾夫亦復如此。吃喝得甚爲放浪。羅曼諾夫酩酊大醉，人事不知，給人擡到火車站去。

羅曼諾夫走後，不愉快的暗潮越發緊張了。羅曼諾夫那晚酒後說出了許多卑鄙事實，大家都擔心着別人聽到沒有，而事後又在如何的談論。

職員間的競爭又換了新花樣。武官處的人，都藉口工作未畢，拖延到辦公時間以後，好在簽退簿上，列入『延長工作』欄內，這是經常要報告到莫斯科的。這種競爭漸漸發展到十分無聊的地步，我們假裝着工作，看誰能就得最久。後來柴鮑丁也覺得厭煩了，下令除特別核准者外，任何人都須工作到晚間十時。

至於柴鮑丁本人，他似乎失去了以前的自信。他感覺到終將遭遇不幸——那陰謀的網，似乎一天一天的緊上來了。莫斯科對於他挽留羅曼諾夫的請求，不加接受，表示他的力量業已衰微。後來他懷疑到莫鐵諾夫在中傷他，武官處的空气，也就不愉快到了極點。儼然分爲兩派。

後來，一九四四年九月的某一下午，就發生了晴天裡的一個霹靂。

柴鮑丁把我喊到他的辦公室裡。他在看一封信，從桌上那撕開的封套看去，我知道是剛從莫斯科外交部

袋裡寄來的。

『並未說明理由，』柴鮑丁讀給我聽，『局長諭令高曾科及其家眷立刻歸國。』

第十七 第五縱隊

那天下午，我工作的時候，如失魂魄。突然召我歸國，把我的腦子弄得太糊塗了。甚至柴鮑丁的態度都有些可疑。是不是暗中有人在監視我，發現我對於加拿大太熱心，而鄙棄着蘇維埃的一切。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說話一向小心，甚至在密切朋友與『最安全』的環境之下，也從不隨便說話。安娜反蘇的批評，給別人聽去了嗎？不，安娜在別人面前，說話也是十分謹慎的。難道我們家裡暗暗給裝了收音的電線，我們夫妻的談話都收錄了去嗎？這倒使我陡然一驚，但繼而一想，這也不可能的，因為我並無可疑之處，貝夫洛夫未必如此偵察我。我也並沒有被懷疑的理由。

後來我做完了工作，機械地把密碼本收藏到保險櫃內。戴上帽子大衣，在門口簽了退，走入微微的秋雨之中。

在漸漸發黑的街道上慢慢走去，完全忘記了下雨和時間遲了。可憐的安娜，我怎麼告訴她呢。簡直想不出被召歸國的原因。還有到了莫斯科將有怎樣的遭際呢？我聽見過許多歸國失蹤的事例，千真萬確，一點不假。

後來我走上塞姆山德街，但走過五百一十一號並不進去，信步到了那一端的街角。默默站了一會，還是想不出解決辦法。傷心地一步一步走上自家的樓梯。

安娜來開了門。

『哦，伊各，你使我等得很擔心——你遲了。爲了什麼……』他停嘴看看我：『你渾身都淋濕了！什麼一會事啊？』

我招手叫她進去，把門輕輕關上。

『是壞消息，安娜。』

她兩手放在嘴上，眼睛驚恐而睜得很大。隱瞞是沒有用的。我乾脆地說：

『我們給召回了。柴鮑丁今天下午接到的命令。』

安娜兩腿跪到了地板上。她並不哭。默默地看着牆壁。我扶她起來坐到沙發上。

『可憐的安特烈！』她隔了一回說。『我以爲我們的孩子可以在這個國家生長。現在我們不能不把他帶回國去，在不幸，饑餓與無望中生活。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無話可說，也無法可想。自從被喊到柴鮑丁辦公室之後，這問題一直困擾着我的腦子，而一籌莫展。我們默默的吃飯。樓下的一家人家正在舉行晚會，我們可以聽見高聲的大笑，壓倒了收音機的舞曲。當我撿起一塊毛巾幫着安娜擦碟子的時候，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一個可怕的念頭，舉目看我。

『伊各，』她喊我，『你闖了什麼禍嗎？我剛才祇想到召歸莫斯科對於安特烈和我不利。你……你……你曾經有過什麼行爲，足以使他們送你到礦裡去做苦工或進集中營……？』

『我不知道有什麼使莫斯科要懲罰我的事情，』我岔着說。『但誰知道，也許在不知不覺中有什麼行動呢？今天我心中慌亂得不能講話。明天想把這件事跟柴鮑丁談一談。』

那夜我細心地籌劃着如何跟柴鮑丁商談這件事情。第二天當柴鮑丁有工夫聽我報告的時候，我強調表示大使館，尤其是武官處非常缺乏人手，而我在大使館的補習學校裡，英文成績甚好，如果認爲我必須自密電

室出來，或者可以調我翻譯情報的工作。

『是的，』柴鮑丁很同意我的見解，『但莫斯科已有決定。我想電呈局長請示，請他重新考慮，在無人接替以前，允許你仍留原職。』

三天之內答復來了。莫斯科同意柴鮑丁的建議，命令我『暫時』仍做密電工作，這使我大大的放了心。因為密電工作表示政府和當局對你仍很信任，仍舊認你為蘇維埃的忠實公民。

那晚我趕回家裡把好消息告訴安娜。很出乎我的意料，她似乎並不高興。

『讓我們面對事實！』她冷靜地說。『這不過延緩時日而已。我們終有一天還要面對這危機的。到那時怎樣呢？』

我突然轉到了一個念頭。一個陌生的聲音借着我的嘴巴說話——我一向努力在腦子裡建築的那道堤防，突然給衝破了。

『我們不回去，安娜！安特烈有資格在這個國家發展他的前途。你也應當像別一個加拿大女人那樣生活。我們可以收拾東西逃到加拿大的別處，甚至美國。我們可以改名換姓。我做別的工作……』

安娜伏在我的懷裡，低聲哭泣。

『我贊成，我贊成，伊各。』她隔了一回說。

把我心中這個久蓄的意願說出之後，感覺到大大的輕鬆。骰子終於擲下去了，最安心的是安娜完全同意。我無需再向她說明此舉的危險，因為她知道得很清楚。也無需吩咐她保守秘密，因為稍稍透露，即有生命之憂。但我有一件事必須囑告她的：

『我們除了表示委心任運等待召歸之外，千萬不能給人以別的印象。』我說。『祇要有一點點的興奮表

示，認識我們的人就會發生懷疑。倘使貝夫洛夫有了懷疑，我們的計劃就完了。」
安娜點點頭。我們相視微笑。危險的決策，也有其不可形容的趣味。

秋去冬來，冬天又轉變到春天了。我對於蘇聯間諜網的看法，有了大大的改變。在外交掩護下所偷來的秘密情報，對於我已不再是與自己無關的平常資料。它們在企圖把加拿大，美國，一切民主國家成爲蘇聯附庸的大陰謀中，一點一滴地構成了重要的因素。

因此，蘇聯在國外這種大規模的間諜事業，在我的目光中，也有了它新的意味。它威脅着這個民主國家的存在，而這個國家，正是我偷偷計劃着想要隱藏和寄托我本人及家庭的。

我覺察到爲了要削弱加拿大的後方，蘇聯政府辛勤地在這裡建立第五縱隊。連外交官員都參加。而加拿大的共產黨已失去了政黨的意義，變成第五縱隊，以備未來的戰爭之用。而在平時，這第五縱隊處處醞釀不安，尤其在工人之間。

我深深地痛恨我也在參加的這種蘇聯陰謀。我目睹着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如何以全力援助蘇聯。一船一船的物資往俄國運去，而冒險運送犧牲着不少的加拿大生命。在援助『盟邦俄國』的口號之下，各方面踴躍捐款。但同時，蘇聯政府却在散佈間諜網培植第五縱隊，以備有一天，從背後給加拿大以致命的打擊。

在我們武官處這個小小的團體，所有的外交代表，都備有電影照相機及普通照相機。莫鐵諾夫和羅各夫想盡方法獲得邀請去參觀軍事設備，總是帶着照相機。以紅軍中校和少校的地位，他們在一切軍事根據地都能得到熱烈的招待。

柴，鮑丁的照相部已組設完備，由高希各夫主持，加拿大當局祇知道高希各夫僅是武官處的一個司機。爲了避免渥太華四五家照相材料店引起懷疑，我們隨時都奉命到別處搜購。有一天，從國內的外交郵袋裡寄

了三大匣照相紙來，算是特別的謹慎。

加拿大國立科學研究所的間諜，有時送了許多秘密科學報告來，於是臨時動員別部分的職員，來協助攝影工作。因為拿來的文件，往往在八小時內必須歸還，故須漏夜從事。後來茫脫里爾的情報人員在一牙藥店的掩護之下設立了一個照相室，方始感到輕鬆。那裡的攝影與放大洗曬任務，由化名為『高里亞』的人擔任，此人的詳細來歷我始終沒有發現。在卷宗中祇記載着他是茫脫里爾的『書信收轉人』。在柴鮑丁的記事簿中，在『高里亞』標題之下，也祇有簡單的說明：『他是一位青年藝術家。在攝影部門工作。』

有時，莫鐵諾夫和羅各夫等獲得了特別重要的照片，則直接用外交袋寄到莫斯科後再行洗曬放大。

我們在國內，即使攝照中央委員會的房屋，也得沒收照相機。所以某一個星期一，柴鮑丁竟有不可思議的巨大收穫，真令人驚奇之至。

柴鮑丁十分得意的告訴我，加拿大陸軍參謀處的軍官，如何邀請他同到賈克河去釣魚。

『你是想不出其中的奧妙道理的』，他說，『但我知道那裡附近有一個極重要的工廠，名為賈克河工廠。而最近莫斯科正命令我搜集有關該廠的資料』。

（那時我還不知道賈克河工廠在加拿大研究原子炸彈的工作中，佔着極主要的地位。）

『我就帶着照相機前去，』柴鮑丁說，『我就問那主人，我能否照幾張風景放到我的照相冊中去。主人說，當然可以，他把船划到光線較好的地方。這秘密工廠的照片，今晚就可寄到莫斯科去了……』他拍拍一個紙包，『這真給莫斯科一個無價之寶，對嗎？』

柴鮑丁常來問我，莫斯科對他這一工作，有什麼批評的電報沒有。他像學生等待分數揭曉那樣焦急。電報來了，自然是發給『格蘭脫』的，『格蘭脫』是他的化名。

格蘭脫鑒

第一一四三八號

(復二二二一號來電)

速電告請你釣魚的主人，與該廠有什麼關係，他在何處工作，你與他的關係如何？如若可能，再將該廠的外形詳細描述。

局長。

有兩個間諜，化名爲『安納士』與『格雷』，常常供給我們有關加拿大兵工廠的情報——地點，生產量，外表的形式等等。莫鐵諾夫對於加拿大的兵工廠，橋梁以及其他有關軍事設備的目標，作過一個詳細的特別報告。

『格雷』後來慢慢成爲蘇聯在加間諜網中的重要人物。他是加拿大人，真名爲格爾遜，其時在渥太華的軍火供應部服務，現在正在執行四年的徒刑。

他是麥克吉爾大學的畢業生，得有地質學的科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在柴鮑丁的記事簿中，我發現一段記載，知道格爾遜早在一九四二年即在『達維』(蘇古諾夫少校的化名)的指揮之下，擔任我們的間諜工作。它說格爾遜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開始工作，並供給礮彈及礮的資料。

一九四四年四月，柴鮑丁曾叫我翻過一張發給『局長』的電報，謂可利用格爾遜太太在羅馬尼亞的熟人太多，傳遞秘密函件。

另外一個電報，可以略見格爾遜金錢收入的情形。

局長鈞鑒

第二六三號

前經指派格雷竭力設法保持其舊有職位。最近與其晤面，據告在不久將來將大舉裁員。屆時無法保持舊有職位了。他建議在渥太華設一地質工程事務所。格雷原爲地質工程師，主持此項機關甚爲合適。

費用預算如下：房租每年六百元，雇員一人，每年薪金一千二百元，辦公室設備一千元，格雷薪津一年四千二百元，共計每年七千元。請批示。格蘭脫。

這個電報發出不久之後，我就離開武官處，柴鮑丁的建議是否為莫斯科核准，就不得而知了。但一般說來，尤其是起初，金錢問題並不成為間諜們的主要動機。柴鮑丁一再警告我們，與人接觸的時候，金錢的問題應出之以謹慎。

『記着，』他常常笑着說，『他們是同情我們的主義。他們的研究團體，使他們覺得思想重於金錢。但日久之後你或許會發現他們對於金錢的熱心——尤其是派他們執行我們命令的時候。』

在柴鮑丁的秘密卷宗裡，有些關於加拿大『勞工進步黨』組織秘書卡爾的紀錄。這卷宗告訴我，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段時期，至少給了他八百五十元，同時為了一張虛偽的護照，有三千元由他經手賄賂加拿大外交部的護照局。卡爾原索五千，後來莫斯科來電認為『此數過鉅』。以三千元為最高限度。那張假護照是發給一個派往加利福尼亞的蘇聯間諜，由卡爾去向貪污官吏買來。

由於我所懷抱的新理想，漸漸使我完全瞭解，這種所謂『細胞』組織，如何使正直的公民，變成了無恥的奸細。我可以斷定，多數間諜在他們與共產主義者發生關係之初，都是竭誠想藉此而改革加拿大。漸漸地，共產黨的影響力使他們覺得，不擇手段祇要達成目的是對的。陰謀的氛圍使他們逐步逐步的放棄了坦白，正直，愛國，宣誓神聖等道德標準，從守法公民變成了被蘇聯利用的第五縱隊。

瑪麗·衛爾希即為顯著的一例。她現在被判了三年徒刑，原是在渥太華的英國駐加高級專員公署任事。一九三〇年到加拿大來初為速記打字員。那時是廿五歲，她是倫敦經濟學校的畢業生，有很好的學歷。能操法德俄和英語。

她的工作成績很好，一九三九年調到登記室，一九四四年升為助理登記主任。她的職務是登記來往的函電。除了極少數的卷宗外，凡是機密性質的案卷，都經她的手。

從我在武官處所取出的文件去看，衛爾希於其被監禁的十年前，就與共產主義發生關係了。她也參加了那種討論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團體，這種團體在當時知識階級之間是極為時髦的。她慢慢熱心起來，閱讀了許多共產主義的書刊。接着就有人請她加入了『研究團體』。到一九三六年正式成為加拿大共產黨的黨員，直到該黨被宣佈為非法，改了勞工進步黨的名稱，她還是黨員。

在一九三五年，她在研究團體裡遇見了福萊德·羅絲（此人現被執行六年徒刑），這位間諜就勸衛爾希把在高級專員公署工作時所獲悉的任何有價值情報，可以報告出來，那末對於共產主義將為極大的服務。

我想衛爾希起初供給的情報，一定受到羅絲的恭維，受寵若驚，于是她就完全忘記了在保密法之下她當初的宣誓了。

在柴鮑丁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的發文表上，登記了第一〇九及一一〇號的『抄件』及『節抄件』，這是莫斯科加拿大大使威格雷斯給加拿大總理金氏的兩封信。為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和十一月三日所寫。發文表上註明『機密』字樣，並註明供給資料者為『艾利』。

柴鮑丁的間諜名錄中，記載着『艾利』即為瑪麗·衛爾希女士的化名。

值得注意的是，衛爾希經過了共黨第五縱隊巧妙技術的訓練之後，潛移默化，她對於洩露自己所宣誓保守的機密，良心毫無掙扎。同時，她的犯罪行為，也並沒有受到大宗的金錢賄賂。

還有一位蘇格蘭人大衛·高登·羅南上尉，充當蘇維埃間諜，他為共產主義而作的犧牲，真令我驚異。他出生於蘇格蘭的高尚家庭交際廣闊，多才多藝，他初在茫脫里爾一家最著名的廣告公司做事，地位很

好。後來徵兵入伍，在加拿大陸軍之中，升到上尉地位。旋又進戰時新聞局工作，後來主編『軍中公報』，報社設於渥太華的史巴克斯街。

羅南是個作家，並非技術人員。他是同盟勝利魁北克委員會的會員，這個組織的左傾色彩原是很濃厚的，那時就爲福萊德·羅絲所注意，吸引他成了間諜網中的有力人員。旋爲羅各夫少校拔擢爲間諜頭目之一，化名爲『貝克』。

我從武官處選取的文件之中，就有羅南的詳細報告。他的神通甚大，得到許多極機密的情報，如『鈾二三五號』，『V式炸彈』，炸藥以及其他有關政治方面的。

後來關於羅南的定罪，尙有一段有趣的偵探插曲。

我向加拿大皇家警察總署揭發了蘇聯間諜案後，據他們的密查，羅南曾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化了五十九元六角七分在茫脫里爾買了一架打字機。這架打字機的號碼爲〇七三一二四九。然而調查的人，在羅南辦公室和家裡都不能找到這架打字機。因爲每架打字機打出的文字，細細辨別起來，都有其不同的特點，如果我從武官處所取出的那些『貝克』的報告，證明係用羅南的打字機所打，則即能證實其罪案，所以這架打字機成爲偵察的重要線索。

警察署的偵探人員却不起初的找尋不到而灰心，他們打電報給倫敦的『蘇格蘭廣場』，要他們一查倫敦羅南父母的寓所，有無可疑的物品——尤其要注意那架〇七三一二四九號的打字機。

不久倫敦就有答復來了。一個警官在羅南父母的床底發現一只箱子，箱子裡放着一包拆散的打字機零件。而一塊零件之上，正刻有那〇七三一二四九的號碼。

在羅南手下，還有兩位值得注意的間諜。一爲鄧福·司密士，現處五年徒刑，一爲愛德華·麥塞雷爾，

現處四年徒刑。兩人都曾受過高等教育，年約三十略過。

司密士畢業於麥克吉爾大學的數學物理系，而在無線電方面得到了碩士學位。離開學校後進金鐘電話公司服務。一九四二年進國立科學研究所的無線電部門充當臨時性的初級研究員。後來升為助理研究工程師。他結過婚，有兩個孩子。

史密士化名為『巴都』，在羅南的間諜團體中最高為活躍。他第一次的情報是口頭供給的，關於太平洋軍艦上的應用雷達偵察器問題。據說雷達的偵察極為靈驗，他曾親自參與研究工作。

柴鮑丁對此人工作的熱心，可以從他給局長的一個電報中看得出來！

『自巴都處收到十七種有關野戰及無線電探索器問題之最秘密及秘密文件。』

麥塞雷爾是電機工程學士。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他在漢密頓的加拿大威斯丁霍斯公司做事，繼而加入加拿大廣播公司，到一九四二年進國立科學研究所，以工程師地位參與雷達的秘密研究工作。他的間諜化名為『巴格雷』。

羅南起初的報告，說這位『巴格雷』的反應不甚熱心，而他的太太反對丈夫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羅南報告中並且說：『他對於政治似乎全無興趣，我想必須慢慢的來。我計劃跟他相交極度熟悉之後，先請他寫點科學方面的文章，得到他的信任。』

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羅南又給羅各夫一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說道：

『巴格雷：我已成功地晤及巴格雷，他同意盡力之所至參加工作。現在我並且發現他起初所以似乎不願與我晤面的原因。他太太在教授音樂，當她出門的時候，他必須在家裡看着孩子。所以很難約定時間，與他見面了。他對於工作很表興趣，立刻答應相助。我把他應做的工作詳細告訴他，他允許提出報告……』

我作了脫離蘇維埃的巨大決定之後，經過了長久的思考，我又跟安娜商量。我說我倘使能把我所揭發的陰謀，佐之以文件的證明，加拿大當局豈不更能相信我的話嗎？

安娜起初甚表驚異，經過細細考慮之後，她鎮靜地說道：

「倘使你有這樣的魄力，伊各，就可在這個幸福的國家換得公民權了。」
像往常一樣，安娜的膽量決定了我的途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若沒有她給我這個鼓勵，我能否完成這樣一個冒險的任務，很可懷疑。

一九四五年六月之後，古拉高夫奉派到渥太華來接替我的密電工作，同時莫斯科又召我回去，我就着手選擇我準備帶着潛逃的文件——也就是足以證明蘇聯間諜網及第五縱隊在加拿大的活動，同時足以辨別間諜的各種證據。

我選定一份文件之後，就把它折着角，仍舊留在卷宗裡。這樣，到臨時就可很快的抽出來。
因為我無法攜帶太多，所以祇能選擇最重要而帶結論性質的文件。我一心鄙視那些受了共黨引誘的傻子，但知道他們不過是『小嘍囉』，上面所說的那幾個知識分子，在政治陰謀中不過是次要的脅從。

我主要目的，是想把三個重要間諜，這三個人是加拿大境內最大的敵人，我要獲得他們罪狀的確證。
三位是艾倫·納恩·梅博士，國會議員福萊德·羅絲及勞工進步黨的組織者山姆·卡爾。

十八 原子彈秘密

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莫斯科謠言已經明白了原子炸彈的秘密，如果這句話是真的，艾倫·納恩·梅博士

在英國的監獄裡應當鞠一個躬。

他在間諜之中，也是因我的證據而定罪的，唯有他的監禁使我得到了報復的愉快。爲什麼呢？因爲久在大家夢想到原子炸彈的恐怖之前，這位英國科學家早已知道它的意義了。可是，他雖在科學方面瞭解原子彈的重大威脅性，他雖宣誓保守它的秘密，仍舊故意與蘇聯的間諜們，一同把秘密讓蘇聯知道。他究竟洩漏了多少，這還無法知道，但莫斯科對他的積極『合作』，無疑是極爲重視的。

英國劍橋大學傑克遜講座的自然科學教授柯克格勞甫博士，他是國際聞名的科學家，一九四四年七月主持芒脫里爾和賈克河的原子能研究計劃，他的工作與加拿大國立科學研究所芒脫里爾實驗室的加拿大科學家合力進行。

柯克格勞甫的研究團體，對於人選非常審慎，而工作的進行亦極爲秘密。他派梅博士爲芒脫里爾實驗所的主任，而把這位親信助手帶了加拿大來。因爲梅也是具有豐富的原子能學說的少數高級科學家之一。

然而，這位梅博士却成了蘇俄的間諜，把秘密資料出賣給外國的人。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梅到加拿大之前，久已是個熱心的共產黨徒。柴鮑丁的卷宗裡，顯示此人在英國的時候，已爲莫斯科所知道。莫斯科曾電令柴鮑丁到芒脫里爾和他接觸，其化名爲『阿雷克』。這證明早已參加蘇維埃的間諜網。派他這樣一個差使，事前經過詳細調查，豈有不知道他的思想左傾。然而終於派了。

從這一方面，實足以說明蘇聯如何利用別國的真正民主來危害其民主主義。那位英國主持人，從他真正的民主觀點出發，認爲梅的『政治思想』是他私人的事情，而派他這個工作，完全從他的科學知識爲根據。梅的案子，大可以提醒那些所謂『民主』頭腦，讓他們明瞭共產主義不僅是『政治思想』，而是蔑棄道義，不擇手段，最危險的第五縱隊活動。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就決心刺探原子炸彈的秘密，其時羅南曾給羅各夫少校以下列的報告：

『據巴都(鄧福·司密士)見告，目前最秘密的工作是一種核心的物理學，(利用物質爆炸放射性活動而產生能)。這比雷達還要秘密，茫脫里爾大學及漢密頓的麥克馬斯德大學，正在進行此項研究。巴都認為政府收買鐳的工廠，是與此項研究有關的。』

同年四月中旬羅南的間諜團體奉到下列的命令：

『……噶巴都搜尋有關鈾第二三五號的資料，但需特別謹慎。如屬可能，把鐳工廠的詳細情形具報。』
接着，柴鮑丁上校接到『局長』一個訓令，叫他與茫脫里爾研究原子能的艾倫·納恩·梅博士接觸。特別說明梅是『一個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但進行時必須謹慎周密。

『他是自己人，』那電報說，『化名為阿雷克。我認為最好經過山姆·卡爾與他聯絡。如已接觸，即行電復。』

『自己人』為共產黨黨員的暗號，而梅早有化名，顯見過去已和莫斯科發生關係的了。

柴鮑丁命我給他翻了一個密電給莫斯科：『能否派本處人員辦理，不必經卡爾之手？』

這電報的用意，據我猜想，他對卡爾頗有醋意。卡爾又名為山姆·柯恩，又名史希密爾·柯根，是蘇聯間諜網的重要齒輪之一。他是加拿大共產黨的組織秘書。他與美國共黨有密切關係，每月從美共首領白勞德那裡領取數千元的秘密經費。我想他與白勞德的關係使柴鮑丁感覺不快，顯然卡爾跟莫斯科另有直接路線。

局長却同意了柴鮑丁的建議，派武官處的人去找梅博士派的是安其洛夫。

後來，據安其洛夫告訴我的經過情形如下：

那天安其洛夫到了茫脫里爾，就從電話簿上找到了梅的姓名和地址。他沒有跟他約定會晤的時間和地點，就按址尋去。

一位學者氣派，禿頂而留着髭鬚，態度很謙恭的人來開了門。

『是嗎？』

『艾倫·梅博士？』

那人點了點頭：『請到裡面來。』

安其洛夫立刻用暗號說道：『米契爾叫我代為問好。』

這句暗號使梅完全換了態度。安其洛夫形容他甚為慌張。他急忙四面望望，然後把安其洛夫帶到裡面一個客廳裡，把門關好。戰戰兢兢的說道，他跟莫斯科的老關係已經斷絕，他覺得加拿大的反間諜人員正在注意他。

安其洛夫不禁大笑。他告訴我道：

『我當時很痛快的告訴他，我不相信他斷絕不斷絕的話，現在莫斯科有工作命他去做。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與我無關。他似乎很窘，問我什麼事情。我告訴他莫斯科要一份關於加拿大和美國研究原子彈的報告。』

梅答應了。安其洛夫又告訴他，這報告愈快愈好。他定了下星期的一個日子，仍在原地點，但是他一再聲明，在下星期以後，必須在別的地方會晤，因會加拿大的警務人員正密切注意着原子能研究的人員。

安其洛夫臨走的時候，送了他兩瓶威士忌和兩百元現款，梅都收下來了。

梅的報告，廣博而詳細，分成兩個部份。

那時還在廣島投擲原子彈的數月之前。所謂『原子能』『鈾』『連續分裂』等等名詞尚為一般人所絕不知道的，所以梅博士的報告，在技術上有其真正的價值。

報告的一部分，敘述製造原子彈的技術步驟，共計單行抄打的稿子十頁。我告訴柴鮑丁這種報告，很容易翻為密碼，因為兩方面輾轉翻譯，極易造成許多錯誤。柴鮑丁想了一想，也表示同意。

『我從外交郵袋裡寄去。』他說，然後他把另一部份交給我，叫我譯發電報。

這一部分敘述加拿大及美國原子能研究的組織。柴鮑丁對於他敘述美國各處的原子彈秘密工廠尤感欣悅，如田納西之渥克·立奇，支加哥大學，新墨西哥之洛斯·阿爾摩斯，華盛頓之漢福特等，因為這種詳細的報告，可以不必化費時間先去刺探工廠的地點和性質，就可分派間諜按圖索驥，見機行事。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春季和夏季，安其洛夫跟梅博士保持着接觸。到七月底，安其洛夫報告說，梅博士將派回本國，繼續他的工作。接着莫斯科就來了訓令，這可以證明蘇聯國際間諜工作的無處不有，和無微不至。這電報是『局長』於七月二十八日發給柴鮑丁的：

格蘭脫鑒：

第一〇四五八號

(復來電第二二八號)速與阿雷克洽定與倫敦同事見面時之暗號，並電告。在其動身之前，設法向其取得有關鈾的研究進展之情報。並與其討論，如果他留在加拿大是否更便利於我們的工作？他能否辦到？還是到倫敦更為有利？局長。二八、七、四五。

梅博士立刻接受命令，這從柴鮑丁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給局長的電報上看得出來：

局長鈞鑒

第二四一號

據阿雷克報告：(一)原子炸彈之試驗，舉行於新墨西哥。廣島所投原子彈係用鈾第二三五號所製。克靈

頓之電磁分解廠每日生產鈾第二三五號約四〇〇公分。(二)阿雷克交來白金一小包，中含鈾二三三號計一六二微公分。如何寄奉，尙未決定。格蘭脫。九、八、四五。

柴鮑丁第一次得到鈾的樣品，引起極大的興奮。那晚我在密電室裡工作得很晚，安其洛夫從茫脫里爾帶來了。柴鮑丁把那塊東西放在桌上，興奮地招呼莫鐵洛夫來看這『無價之寶』。

于是就商討如何安全地寄到莫斯科去。外交郵袋認為仍不可靠。莫鐵洛夫新近奉派到華盛頓，先要回莫斯科一趟，當時決定叫他帶去。莫鐵洛夫當然高興接受這差使的，因為帶着鈾的樣品回去，必受歡迎無疑。

柴鮑丁欣喜若狂。我聽他興奮地說：『美國人的發明，我們有法子偷到手！』

得到鈾的消息，傳遍武官處。我不是科學家，不能說是否值得如此熱狂，但柴鮑丁無疑把它看成無比的收穫。後來有一次，他又舉着杯子，暗暗指着美國人道：

『昨天是我們的盟友，今天是我們鄰居，明天是我們的敵人！』

爲了要說明蘇聯間諜間的接觸，事前佈置得如何細密，以及其國際間諜網的聯系，我再提出兩封梅博士到倫敦以前的電報作爲例子。梅博士於九月初到賈克河工廠視察了一次之後，就準備動身了。柴鮑丁與局長之間來往的電報還有兩通如次：

局長鈞鑒：

第二四四號

已與阿雷克洽妥在倫敦與同志會晤之辦法。阿雷克將於史屈侖特之英皇大學工作。地址可於電話簿查得。會晤時間爲十月七日或十七日或二十七日，地點爲大英博物館前之街道。夜十一時。辨認標記：左臂夾報紙一份。口號：問米契爾好。阿雷克無法留在加拿大。九月必需飛英。在啓程之前將赴貝泰華華的鈾工廠，耽擱兩週。他答應在赴英之前，如果可能，再與我們一晤。他說他明年將再來加拿大作一月勾

留。我們付了他五百元。格蘭脫。

柴鮑丁設計的見面方法，莫斯科顯然不甚滿意，所以局長又有下面的電報：

格蘭脫鑒：

第一一九五五號

(復來電第二四四號)所擬倫敦會晤辦法不甚妥善，修正如下：一、地點：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前面的羅素街，在街的對面，近博物院路口，靠陶登漢路那一邊。阿雷克從陶登漢路走來，接觸他的人從對面索桑普登街走來。二、時間：如來電所擬，惟改爲下午八點，因爲十一點太晚了，看阿雷克是否方便，商定後將結果具報。如果十月未能見面，則下數月繼續有效。三、辨認標記：阿雷克左臂夾泰晤士報接觸他的人左手持『圖畫郵報』週刊。四、口號：接觸者說，『到史屈命特最近的路從那裡走？』阿雷克：『好，跟我來，我就是到那裡去的。』在開始談到任務之前，阿雷克說：『問米契爾好。』與阿雷克洽後速電復。局長。二二、八、四五。

梅博士以後的故事，曾經成爲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

加拿大警察總署得到了我所繳去的文件，直接以此案報告總理金氏，他曾召集高級顧問商談。其後，金氏到華盛頓向杜魯門總統剖析詳情。也通知了英首相艾德禮。他們決定在完成步驟，將間諜一網打盡之前，暫時保守秘密。

但梅博士不能不加以暗中監視，同時立刻逮捕他，又恐打草驚蛇，使全案無從追索。

九月底，當梅在茫脫里爾飛機場坐飛機往倫敦去的時候，鄰座坐着一個便衣的密探，此人爲加拿大政府所派，不動聲色，態度大方。在飛機橫渡大西洋的旅程中，此人跟梅隨便閒談，交換雜誌，一如平常的旅客。

這個便衣密探所負使命，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他是警察總署派的，不過到了倫敦機場，把梅博士指給蘇格蘭場的人認識，並隨時協助而已。

梅博士在日夜被監視之下，計有五個月之久，直到搜索整個間諜網有了把握為止。梅博士到了倫敦，不再給他極機密工作。蘇格蘭場的密探，發現他頗不耐煩，接受一些普通科學家都能做的一般任務。

決定逮捕的時候，梅很快受逮。他就招供犯了國家的保密法，並在書面供狀上簽了字。

十九 當間諜的國會議員

我在加拿大蘇聯間諜網中工作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奇怪，民主國家的所謂『自由』，竟給我們利用到那樣的程度。福萊德·羅絲即為顯著的一例。羅絲的第三次入獄，中斷了他的間諜工作。

若不是我的作證，若不是我所繳出的武官處秘密文件，這位羅絲先生說不定今天仍是渥太華的國會議員，而在芒脫里爾郊外監獄中吃六年的官司了。

我說這句話，並非自己誇口，祇是想說明，如果我這不足輕重的密電譯員，忠順地捲捲行李回到了莫斯科而不向加拿大警署告發，蘇聯間諜福萊德·羅絲或許至今仍坐在加拿大的議會之中，一面把國家的秘密交給蘇聯。

像他這樣的人會當選議員，真是實足的民主表現。我所不解者，加拿大的公民為什麼竟會盲目到兩次選舉他當議員。

他一九〇七年生於波蘭的羅白林，原名福萊德·羅森堡，一九二六年三月歸化為加拿大國民。在三年之內做了加拿大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總書記。他曾赴莫斯科受訓。到一九三〇年，做了六個月的共產主義青年

聯盟的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回溯到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因為他所受的訓練，即參加了加拿大共產黨的祕密內圈。一九二七年任共黨的中央委員，任職不久，因『不守秩序行動』在多倫多被捕，罰拘役三十天。

一九三一—三二年犯了加拿大刑法第三十八章的叛國罪，在茫脫里爾首次正式入獄，處徒刑一年。

一九三五年參加議員競選失敗了。一九三六年，為魁北克省的候選人，又遭失敗。一九三七年他由共黨中央委員會選派為中央監督委員會的委員，那是該黨的一種特務組織。

加拿大參戰的時候，羅絲變成了作家。他發表的小冊子反英情緒甚濃，目的在阻礙加拿大的參戰。當加拿大政府不再能够忍耐，宣佈共產黨為非法的時候，羅絲轉入『地下工作』。一九四二年加拿大警察署羅列他六項罪狀，將他逮捕二次入獄。其後，寫了一張『不再參加加拿大共產黨之宣傳及活動』的悔過書，方始獲釋。

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羅絲竟當選為國會議員，在我們蘇聯大使館的人，對此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而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竟還連選連任。但柴鮑丁覺得有此人參加到加拿大的重要機構去，極感欣悅。

我所說過的許多間諜人員，在大使館文卷中，涉及福萊德·羅絲及山姆·卡爾兩人者最多。卡爾當警察署搜捕的時候，竟獲漏網，當此書寫作的時候，據說他隱藏在墨西哥。

福萊德·羅絲，在我們武官處的化名為『福萊德』，後來改為『德波士』，自幼即為蘇聯工作，十七歲的時候，即為政治保安局的特務，化名為『納般斯』。

關於他的文件舉不勝舉，我只要提一件事即可明瞭。在柴鮑丁的發文簿上，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他給莫斯科寄去一份加拿大國會祕密會議決議錄，註明係由『德波士』供給。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拿大

國會確曾舉行秘密會議，羅絲身為議員，自然有資格出席的。

山姆·卡爾，或名為山姆·柯恩，或名希密爾·柯根。原籍俄國烏克蘭的湯麻克普，加拿大警察要搜捕他的時候突然不見了。他在柴鮑丁的間諜組織之中，地位與羅絲相伯仲。在一九四三年六月柴鮑丁接事之前，他已是「渥太華·多倫多」區的間諜頭目。據加拿大當局的報告，謂「我們不難獲得結論卡爾於一九二四年即奉派來加充當職業的間諜而他一直活動到如今。」

我們所引為奇怪的是，為什麼像卡爾這樣的間諜，活動得竟那樣的公開。安其洛夫有一次問柴鮑丁道：「你以為卡爾應當謹慎一些嗎？他對於工作好像毫不隱秘。」

柴鮑丁聳聳肩膀。

「卡爾能自己當心自己。你細細注意他看，你就可以知道他故意在民主習慣所許可的範圍做出許多喧鬧，那是他的煙幕，用來掩蓋他的真正工作。」

在羅各夫中校人事卷中，關於卡爾有如下的記載：

「此人詳細履歷見共產國際中央局的檔案。俄文甚佳，畢業於莫斯科的列寧學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卡爾以山姆爾·柯根的名字，得到加拿大的入籍證。同年十一月，犯刑法第九十八章被捕，同時因其為「非法組織」的「會員」及「職員」，自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起併處十年徒刑。並取消歸化國籍。

在監獄裡經過了不到三年，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赦免出獄。一九三七年他給加拿大共產黨辦一個訓練學校，一九三八年，暫時放棄他共產黨組織秘書的職務，改編共產黨的機關報「號筒日刊」。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重又取得加拿大的國籍證。六月一日參加國會大選爲候選人，但沒有當選。

武官處關於卡爾的卷宗，其中有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羅各夫中校指派他工作的通知底稿，其第四節稱：

『你有沒有辦法，把我們的工作推廣到國防部，空軍部，海軍部或其他有關的軍事機關。目前我們對於上述各部門極感興趣，請對此事盡最大之努力。』

X

X

X

X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我決心與蘇維埃間諜網脫離關係的日子，一天近一天了。莫斯科派來接替我的古拉高夫，對於工作已經熟習，我再沒有留在加拿大的理由了。

八月裡的某一天，柴鮑丁把我喊到他的辦公室裡。

『莫斯科又來問你什麼時候回國。』他說，『我失去你，心中很難過，伊各，但事實是如此。』我留心中着絲毫不作不愉快的表示。

『也好，上校同志。回國又可以看到許多家屬和親友了。』

柴鮑丁對我皺了皺眉頭，繼而笑了幾聲：『你是不可多得的人，伊各。你似乎對任何事情都不介意。我想向局長保舉你的忠心和努力工作。我想你的前程很大。』

我謝了他，問他我帶着家眷回國，有多少時間的準備。

『十月初有隻船，這差不多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偷窺間諜網的文卷，這件事究竟幹得幹不得，心中却有些疑惑起來。光光帶着安娜，和兩歲的安特烈逃走要簡單和容易得多。倘使我在盜宗卷的時候給抓到了，安娜和安特烈怎麼辦呢？

那時還有一個困難，安娜又懷孕了。八月是她懷孕的第五個月。九月是第六個月。她是受不了緊張遭遇的。

柴鮑丁告訴我莫斯科一定要我回國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又跟安娜商量起來。

『我不願聽你變計的話，』安娜斷然說：『這是你給這個國家作些偉大貢獻的機會，同時爲了你自己，爲了安特烈和尚未出世的孩子，加拿大將成爲我們的家。我們不能祇有接受而不作任何貢獻。』

我欽佩地看着她，安娜的勇敢從來不會消沈的。

『但是，如果我有什麼意外的遭遇，你母子怎樣過下去呢？』

她的答復使我不能忘懷。

『倘使要在這裡受苦，總比回到莫斯科去受那必然的苦痛要好些。』

以後我們就常常研究着實行的計劃。我們決定必須在九月初行動，過此則安娜的身體恐怕應付不了。

在這一段時期，我跟接替我工作的古拉高夫有過多次談話。他很年青，敏銳，而頗有抱負。周圍的民主環境顯然使他很苦悶，這種民主制度，正是他所受的教育要他鄙夷的，但現在却親身的看到了。

有一天，他突然嘆着氣說道：『我不知爲什麼緣故，外國的環境往往使人變壞。』

我記得柴鮑丁有一次向我們訓話的時候，也有過同樣的表示。我謹慎地回答道：

『怎麼一回事？難道你不相信你自已嗎？』

古拉高夫強硬地說：『不必爲我擔心。我的思想很可靠……』接着他顯然感到必須加上一句批評加拿大的話，『……加拿大固有它的長處，但同時我也注意到它的凌亂。俄國較有秩序。』

蘇維埃的秩序，除非你不會親身經歷，你纔會贊美它的，我心中這樣想。可是嘴上却說道：『對的，我

們更有秩序。但我注意到這些民主國家的人民更有守法精神。看着似乎沒有秩序，這是自由的外表現象。他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似乎沒有秩序，但後面却有嚴格的守法精神為背境，這或許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古拉高夫岔着道：

『你什麼用意——想說服我嗎？』

我微微一笑。記得我初到加拿大的時候，我想說服我自己，這裡的一切都是表面的，日後自會看明白它的真相。可是，蘇維埃的教育雖深深留在我的腦際，我沒有法子說服我自己，我的思想仍舊積極向民主生活方式游離。我也像別人那樣，設法躲在一個執拗的思想樊籬後面，但失敗了。我可以斷定，到外國來的蘇聯人民，祇要目睹了民主生活，都有同感，但很少人敢冒險表示出來。

古拉高夫思想上的轉變，使我很驚異。他的『發現』也就是我從前的『發現』。從蘇維埃觀點說起來，他是在『腐化』。但如果有人明白向他指出，必召致他的勃然大怒。有一天天氣很熱，中午我們走到公園裡，坐在樹蔭閒談，他忽然說道：

『你看吧！普通的工人都有汽車，這就是說，他們吃得很好，生活得很好，除了日常生活之外，還有餘錢購買奢侈品。你看他們所住的房子如何美麗。人人各得其所。我出國還祇有一個月……』他指着放在草地上的那件衣服，『可是國內重要工程師工作十年也買不起這樣好的衣服。』

我讓他說下去。

『這裡加拿大，』他繼續說，『據說只有一千二百多萬人口，但他們小至針線，大至鐵路引擎都會生產。不僅生產還要出口。它的秘密關鍵在那裡呢？』

我俯身拉了一張草葉，表示我的答復是漫不經心的，『對於我們纔算是秘密，他們却是家常便飯。他們

說是私人企業和完全自由的結果。」

古拉高夫擡頭看了我一眼。

「你想得太多了！」他說。

我不作聲，他繼續道：「你愈想得少，愈覺得安靜。現在我們俄國，紅軍中已實行最嚴格的紀律。軍人祇有執行命令，對命令不准疑問。在這裡，我們看見史太林的相片與羅斯福邱吉爾懸掛在一起。俄國你能看見羅斯福邱吉爾的相片會跟史太林懸掛在一塊兒嗎？你坐街車經過白立頓那公園的時候，你看正在興建數百幢房屋爲退伍士兵居住。爲什麼我國的士兵，除了口頭的贊美外，得不到別的酬報呢……？」

我不禁笑了：

「你纔想得太多了呢！」

古拉高夫顯然一驚。不知不覺地回頭看看後面，覺悟自己說話太隨便了，有沒有給危險的人聽了去。

X X X X

在密電室裡，我開始利用所有的機會，翻查秘密檔案。關於間諜的組織，一面記在心中，一面將有關間諜活動或計劃的電報、記錄、報告等文件作最後的選擇，凡選定者，都折着右上角做下記號。

我所選的文件，目的使幾個重要間諜都有罪證，無法逃出家網。若干不重要的脅從，雖也不免涉及，但我目的不在於他們，他們不過是愚者而已。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所舉發的人名，已有八人判決徒刑，自三年至十年不等。另有一人，已有罪證，尙待判決。九人宣告無罪，一人判處罰金。兩人逃亡，正在通緝。

有兩個電報，一個是莫斯科來的訓令，要搜集原子炸彈的情報，另一個是柴鮑丁給莫斯科的關於福萊德

·羅絲競選的報告，我特別從卷中抽了出來，放在身邊。我另外抄了兩個無關緊要的電報。編了號，放在原處，以防被人覺察號碼不銜接而知道缺了兩件東西。我很擔心古拉高夫，因為他正在悉心研究我的處理檔案方法。

回到家，安娜對於我秘密帶回的兩個文件，有些莫明其妙。

『這以防萬一的，』我解釋給她聽。『如果有什麼意外，我仍舊有這兩個電報給加拿大當局看。倘使我遭遇不測，你還可以持此要求加拿大當局的保護。』

安娜把這兩個電報放在廚房的架子上。旁邊特別放了一匣火柴，以備必要時立刻將它燒燬。

我們決定以後常常鎖上門，約定了叫門的暗號，連敲兩次三下，停一停再敲三下。

歸理東西是無用的，如果企圖遷移什麼東西，馬上會引起懷疑。我們既決心要求加拿大當局的保護，那末他們同樣會保護我們的財產。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星期三，我略早歸家吃晚飯。安娜給我開了門，我吻了她一下。安特烈在廚房裡的一張高椅子上向我手舞足蹈，我一面脫衣服，一面心不在焉地向他揮揮手。

安娜站在那裡，看着我的臉。

『是今晚嗎？』她問。

我點點頭。

『非今晚不可！』

我回到武官處去，那晚的天氣特別悶熱。但我知道襯衫裡面所流的汗，原因不僅爲了天氣。今晚，是我及全家生活的轉捩點，從蘇維埃奴隸制度轉變到民主自由。

我所以選擇這個日子，因爲實逼處此，柴鮑丁突然決定，叫我把工作移交給古拉高夫，而我退處顧問性質的旁觀地位。柴鮑丁之用意，大概爲了早給古拉高夫實習的機會，使他的譯電工作，在我回國之後，能够勝任愉快。

我不是英雄。真正有英雄秉賦的人，似乎是極少的。我是一個極普通的俄國小人物。在運動方面從無過人的成績。我高人一等者，祇有學業。從來沒有接受過危險生活，所謂冒險在我看來即等於危險。但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的晚上，我從塞姆山街的寓所走到侖其街的辦公處，我一步近一步地走上我所不願做的英雄道路。

這一晚，也可能成爲我在世上的最後一晚。一個錯誤行動可以使我的計劃完全崩潰，而我心中想，也許政治保安局的密探，已經注意了我相當時間。柴鮑丁突然調開我職務，說不定是故意設下的陷阱。我的內心，深深恐懼着無所不在的可怕特工。

除去竊盜宗卷之外，更有許多安全的道路，可是我堅決不渝的要實行我與安娜所預定的對策。不論有何遭遇，這件事非幹不可。

而盜宗卷祇有今晚這個機會。

安娜與我，原擬選擇週末爲潛逃的日子，以星期六夜裡最爲理想，這可以一直到星期一的上午，其間較有從容的時間以圖免脫。然而星期六晚上報館不開門的，而我們決定把盜來的文件立刻在報上公開。

當初不想報告警察。因爲在國內，我們早有經驗熟知特務和警察的腐化，我深怕警察會把我出賣給蘇聯

大使館。同時，加拿大報紙的自由與大膽，給我們的印象甚深。

選擇星期三，還有一個原因。我知道那晚由古拉高夫值夜，他第二天可以睡到中午。因為第一個發現我失蹤的人，最可能是古拉高夫，他第二天上午不辦公，又使我多了半天的從容。此外，密電室的工作原很機密，除了柴鮑丁之外，別的同事是不清楚我們什麼時候上班或落班的。而我知道柴鮑丁和羅各夫約好去看電影，預料他第二天上班必遲。

目前比較危險的是，我先要到武官處佯裝着去完成一二件未了的工作，然後再到大使館密電室方能盜到宗卷，因為重要檔卷都放在那邊。我專管密電，而柴鮑丁的管卷工作，也向來由我一手包辦，所以日夜任何時間進出上述兩處是沒有問題的。

我信步走去，後來轉到衚衕街了，很奇怪地，我覺到一種輕鬆之感。幾星期來我神經緊張到了萬分，現在要實際行動了，反而覺得如釋重負。

走進大廳的時候，我看見古拉高夫已經坐在值夜的辦公桌上了。這很好。如果古拉高夫不值夜，第二天上午會增加我的麻煩。我走進去，第一個碰到蓋爾金，他表面上是門衛，實際上是極有訓練的情報人員。

『跟我同去看電影，好不好？』他問我。

我裝着很有興趣的樣子。『你上那一家去呢？』

蓋爾金說出了一個鄰近戲院的名字。我心想，這倒是走開的好機會，因為我此刻到武官處來，目的不過看一看古拉高夫是不是值夜。

『好啊！』我說。『辦公實在太熱了。』

蓋爾金說還有幾位同事要去，我們在門口略略等他們一等。

到了戲院，我做出十分失望的樣子：『不巧得很，這張片子我已經看過了！這片子倒不壞，你們進去看看吧。我乘了車子進城到別家去看。』

我走到前面的電車站，眼看他們進了戲院，就轉變方向。一切很順利，我轉上夏洛帝街，一直往蘇聯大使館去。跨上臺階，與守衛點了點頭，我在簽到簿簽字的時候，他也跟我行了一個禮。當我把墨水筆插進衣袋的時候，望客堂看去，我的心幾乎凝凍了。那裡坐着的是蘇聯政治保安局派在加拿大的特工頭子貝夫洛夫！

可是我鎮靜了一下，非常自然地走過客堂去，一面假裝着料理我的墨水筆，把它插好在衣袋裡。從我的眼角偷望，貝夫洛夫顯然沒有注意到我。我按了一下扶梯上的秘密電鈴，拾級而上，直往密電室而去，拉開門帘，把臉貼在那鋼門的小孔上。

裡面有人給我開了門，那是商務參贊的密電員拉曹諾夫，跟我很有交誼的。此外別無旁人，我放了心。我跟他寒暄了幾句。他問我今夜是不是要工作得很晚。

『不，』我說。『只有兩個電報，我攪好之後，還想去看八點三十分電影。』

拉曹諾夫說這才對啊，說完就低頭做他的工作了。

走進我的小辦公室，把門小心關好。拉開抽屜，拿出柴鮑丁的密電卷夾來，這是我下午下班時故意留在那裡的。大部份文件都在這裡，其餘的尚在檔案之中。都已預先折角做好記號。有的是大頁紙張，有的是小紙條子。後來經警署的點檢，共計一〇九件。

我小心地解開襯衫，把盜取的文件一一放了進去。然後把故意留着以作前來工作藉口的兩份電報譯好。這是在加拿大外交部的一位女間諜伍依金小姐的報告。

按照原定計劃，這兩份電報是不在重要之列的，但既而一想，也許與別的資料可以互相參證。真是萬分抱歉，沒有多加考慮，爲了這兩個電報的底稿，後來使伍依金被判了三年監禁。

一切完畢之後，我站起來小心檢點襯衫，似乎很可疑地鼓了起來。但天氣很熱，我襯衫不加束緊，大概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我走出自己辦公室，把兩份譯好的電報交給拉曹諾夫請他發往莫斯科。柴鮑丁的卷夾也交給了他，請他代爲放進保險箱去。

我注意拉曹諾夫對我的神態有沒有懷疑的表示。當然我自己覺得胸口有些不對，但拉曹諾夫似乎全沒有注意。于是我信步走進盥洗室去。

一面對拉曹諾夫說道：

『就在這裡悶熱得要命。爲什麼不溜出去跟我一同看電影呢？』
拉曹諾夫嘴裡噤咕着。

『出去溜溜原是再好也沒有。但貝夫洛夫就在樓下。謝謝你吧，我還是不去的好。』

提起貝夫洛夫，使我膝蓋微微有些發軟。我是暫時的忘記了他，然而事到如今，決無後悔的可能。我又整了整襯衫，走到門口去。拉曹諾夫給我開了門，我與他說聲晚安告別。

我下樓梯的時候，特別謹慎，以免驚動那些卷宗，在我襯衫裡特別鼓起來。同時又怕小張的紙條，漏過袴帶，從袴腳管裡溜到地下。

眉毛上都覺得有汗，我走近客堂的時候，覺得胸口的紙張也給汗沾牢了。我連伸手摸手帕擦汗都不敢，深恐驚動了什麼似的。

路似乎特別遙遠，好容易走近客堂，我一步一步走過去。我快樂得心都跳起來，客堂是空的，原來貝夫洛夫早已走了。這是好兆，我的運氣不錯。在簽退簿上簽了名，又跟守衛招呼了一聲晚安，走到街上。天氣仍很悶熱，可是如釋重負似的呼吸着外面的空氣。

我跳上一輛街車，一直到渥太華日報館去。

我浑身發抖，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大概是神經緊張的反應。在報館外面，我停着步子，擦拭額上的汗，定心看了一眼確乎沒有人在跟隨我。走了進去就問電梯司機總編輯室在那裡。

『六樓，』他順手把電梯的門關上。

在六樓我找到了掛着總編輯室牌子的門戶，正想敲門的時候，心中忽又轉起了一個念頭：每家大報館都有蘇聯的特務。我沒有錯誤嗎？還得細細想一想，就轉身再往電梯那裡走去。電梯門拉開來，有人走出，那司機高喊道：

『下去。』

我踏進電梯。開過若干層的時候，又停着上了幾個乘客，其中有一位小姐對我看看，臉上堆下笑容：

『你在這裡有什麼事嗎？是不是大使館裡發生了什麼新聞？』

我心中很慌張，她的臉似乎很熟，在那裡看見過她的，我怎麼應付呢？

電梯已到了底層。開門的時候，我對那女人說了聲對不起，因爲有要緊事情，就搶前一步走到街上。一直走到第一個街角方把脚步緩慢下來。走過了幾條馬路口，設法鎮靜自己的緊張。我此刻怎麼辦呢？我跳上街車回家去，想再跟安娜商量一下。

安娜給我開了門，她的臉色灰白。

『沒有什麼亂子嗎？』她緊張地問。

我重重地坐下沙發，安娜過來坐在我旁邊。我把整個經過講給她聽，一直講到電梯裡那個女人好像在偵探我。

安娜很留心聽着。我講完之後，她很肯定的說道：

『別擔心那女人，伊各。她是記者或是報館的職員。你們大使館裡招待過許多新聞界的人，她或許以前跟你見過面。他們的記憶力很好。即使報館裡有特務，也不要緊的。事到如今，他們怎麼來得及阻止你呢？』

她的信心，使我恢復了勇氣。

『我怎麼辦呢？』我問。

『再到報館去看總編輯。在大使館發覺以前，你還有從容的時間。』

我解開襯衫，拿出文件來。已經浸透了汗液。安娜在空氣裡揚了幾下，讓它們稍為乾些。然後用一張紙包了。

安娜給我開了門，吻了我一下。我握了她一握手臂重又走到黑暗之中。到了渥太華日報館，那電梯司機又把我送到六樓。我急急去敲那總編輯室的門。沒有回音。再敲幾下，仍無聲息。我轉轉門把手。原來上了鎖了。我走到那邊一間大辦公室裡，那是本市新聞的編輯室，裡面很多人忙碌着。無人注意到我。一個工役往我這邊走來。我問他總編輯在那裡。

『下班走了。』他說完就走了過去。

我走到最近的一隻桌子旁邊，告訴那正在打字的職員，我要見任何一位負責的人。

『有非常緊要的事情。』我說。

他疑問地看了我一看，然後帶我到屋子那一端的一張辦公桌前面，一個年齡較大的人，額上帶着綠色眼鏡，招呼我坐下。

我把盜來的宗卷，放到他桌上，一面以我的身份告訴他，這些就是蘇聯間諜在加拿大刺探原子彈秘密的證據。

那人看了我一看，然後揀起幾頁文件。但一看就擱下了。因為都是俄文寫的。

『對不起，』停了一停，他說，『這已超出了我們的範圍。我建議你到警察總署去或是明天上午再來跟總編輯談談看。』

我趕快告訴他，到了明天，蘇聯的特務一定追蹤我，甚至暗殺我。可是我說的時候，就覺得失望了。從那人的表情看，他似乎覺得我在發瘋。

『對不起，』他說。『我忙得很。』

他站起來走開了，剩我一人坐在那裡，感到絕望而不知如何辦法。走到街上，我背靠了牆，想恢復我的思路。我想我祇有去見高級官員。司法部長似乎是最適當的對象。我走到威林吞街的司法部大廈，門口一位穿警察制服的高幹子阻止了我。我遲疑了一下，但覺得事情已到緊要的關頭，我說我有急要事情，立刻要見司法部長。

那警員很客氣但很堅決地回答我道：

『此刻差不多已經半夜了。在明天上午之前，你不能見什麼人。對不起。』

對不起！這句話立刻刺進我的神經。『但是，』我又對他說，『我有萬分的必要，立刻要跟司法部長接

觸一下——至少通個電話。」

他搖搖頭：「沒有辦法。」

我回到家，束手無策，但安娜却又鼓勵我。

「不要擔心。你明天儘有半天工夫去找司法部長。好好睡一覺，你會覺得舒服些的。」

她把那些文件放在她的手提皮包內，放在枕頭下面。可是那晚我們誰都睡不着。我們儘是想著談着，直到曙光透進我們臥室的窗戶。我撐起腰來，望望外面。東天有一片紅霞。這給了我一些安慰，至少預示着這是很好的一天。

「安娜，」我說，「等九點左右司法部開門，我們一同上那裡去。我必須等待，在我的安全沒有保障之前，我的憂慮總是覺得不容易忍耐的。我來給安特烈穿衣服。你覺得你受得了那緊張嗎？……是不是覺得有些不舒服？」

「我很好，伊各，」她說。「我們一同去好了，祇要走進司法部，你就什麼都用不着擔心了。」

我躺下去輕鬆地嘆了口氣。似乎安了一些心。直到後來安娜來搖醒了我。

「七點鐘了，伊各。」

我竟好好的睡了一覺，這一覺對我極有益處。我修了鬚鬚，穿了一套較好的棕色衣服。安娜早給安特烈吃過東西，灶上煎着一壺咖啡。天氣爽朗，不像昨天那樣的鬱悶。我覺得我已充分準備好，去對付面前的一切。

在出門之前，我們決定把盜來的宗卷放在安娜手提包裡，因為假若有特工尾隨我們，一定以我為目標。我到萬一的時候，可以跟他們糾纏，安娜仍有溜掉的機會。我覺得，那些文件至少可以使安娜獲得加拿大政

府的保護。

到了司法部，我向傳達室的人說明因有緊要事情，立刻要見部長。那人懷疑地看看我們，然後在電話上說了好一會兒的話。我們給帶到部長辦公室，一位很有禮貌的秘書，問我的事情是何性質。

我儘可能向他解釋，事情急迫而重要，我必需當面見到部長。那秘書看看我，再看看安娜和孩子。我可以猜度他當時的心理：這人也許有神經病，如果真是那樣，爲何又帶着女人和孩子呢？我計劃的時候却沒有想到這一層。那秘書走到隔壁房間裡，我聽見他在打電話。

後來又走過來了。

『部長在國會大廈那邊的辦公室裡，』他說，『我帶你們過去。』

我們走過國會小山，經過了富麗堂皇的大廳，走到部長的辦公室。但先得見另一位秘書。一切重演一遍。我說我要當面謁見部長。那秘書又拿起電話來，跟一個人用法文交談。我知道談論的是我的問題，因爲他提到我的名字，其餘則聽不懂。隔了一會，他掛上電話，叫那陪伴我們過來的秘書，仍舊把我們帶到司法部大廈去等待部長。

回到那邊，足足坐了兩個鐘頭。安德烈忍耐不住了，我們想盡方法使他不哭。電話響了，那秘書回答道：『是，部長！』接着就對我說道：

『我很對不起。部長沒有工夫見你！』

又是對不起！我惶恐地看看安娜，她無可奈何地咬着嘴唇。

『我們再到報館去吧。』她輕輕說。

走到渥太華日報館的時候，總編輯沒有見到。但有一位女記者來跟我們接談。她很漂亮，名叫雷絲蘭。

詹斯登。她態度很好，請我們坐的時候，拍拍安特烈的腦袋。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講給她聽。她很留心聽着，時時看看安娜，好像要從她表情上去找尋證實似的。她把文件翻了一翻，然後帶到總編輯室去。一下子又出來了。

『真正對不起，』她說，把文件交還給我。『你的資料我們並不適用。這些日子除了恭維史太林之外，誰都不願說別的話。』

接着是安娜先開口：『你看我們怎樣辦呢，小姐？』

那女記者想了一想。『爲什麼不到警察總署去辦歸化手續。那可以防止俄國人暗算你。』

萬分失望的回到司法部大廈，一位警署人員告訴我們，警察總署是不管歸化事務的，他說外僑歸化入籍的手續須到尼古拉斯街的檢察署去辦。

到尼古拉斯街有相當遠的路程，而天又熱起來了。安特烈哭着，于是我把他抱在懷裡。安娜顯然也疲乏得很。但這些都是小事情。我似乎已把事情弄僵，非謀補救不可。

到了檢察署，就知道那管理歸化登記的女職員吃飯去了，要好一會兒纔回來。這突然提醒我，從一大早到現在我們還不曾吃過東西。我就帶着安娜和安特烈進了附近的一家小館子。我在點菜的時候，看到壁上掛的鐘。已是一點三刻。我料想着大使館裡的情形。但他們或者還沒有發覺失竊的文卷，只是奇怪我爲何不去辦公。

安特烈在餐桌上睡着了。安娜決定把孩子送給我們鄰居的一位英國婦人，這是她的朋友。我們坐車回到塞姆山德街。安娜告訴那鄰居，她因準備回國，上街買些東西，請她暫時把孩子照看一下，那女人很和氣的接受了。

又回到檢察署。那女職員給表格我們填寫，叫我們明天再把照片送來。我驚駭地問她：

『歸化手續要幾天才可辦完呢？』

『哦，』她說，『這不一定，大概幾個月。』

安娜哭出來了。這是她第一次失去了勇氣。我挽着她用俄國話安慰她。我毫無辦法地四面看看。在另一只辦公桌前，坐着一位穿紅衣的女職員，這人就是飯前跟她交談過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當時臉上了有了同情表示，一種本能的衝動令我走了過去，把全盤事情向她訴說。

她顯然很表驚奇，站起來拉過兩張椅子，招呼我跟安娜坐了下去。她辦公桌上放着她的名牌，我記得是：佛爾南·仇朋太太。

『這種事情應當讓全世界知道的。』她堅定地說，『我來幫你忙。』

我焦灼得哭笑不得。當那仇朋太太打電話給另一報館的時候，安娜握住了我的手。我聽她在說，她的辦公室裡正有一個全世界應當知道的消息，叫他們立刻派一個記者來。談話似乎不大順利。那邊好像表示，無人有空，能否就在電話裡告訴他們聽。仇朋太太於是打電話給另外一個人。

半小時後，來了一位男記者。他是認識仇朋太太的，他們招呼之後，仇朋太太把我們介紹，我又得把事情重新敘述一遍。安娜把那些文件遞給我，我就翻譯給他聽。他叫我把有關原子彈的文件，重新再說一遍。然後我把有關山姆·卡爾勞工進步黨的文卷譯給他聽，他起初似乎很有興趣，結果却仍舊搖搖頭。

『這事情太大了——太大了。這是應當由警察署或政府處理的。我看你還是向他們報告的好。』

仇朋太太，安娜和我，差不多同時開口，想說服他請他幫忙。但他祇是表示抱歉，起身走了。仇朋太太嘆了口氣道：

『我也無能爲力了。你們還是接受他的勸告罷。』接着又對安娜道：『祝你幸運。將來生了男孩或女孩，請你告訴我。』

我們走到炙人的烈日之下。站在臺階，不知道往那一個方向去。安娜拉住了我的手臂。

『回家去吧，伊各。』她疲倦萬分地說。

回家的危險似乎也顧不到了。我已筋疲力盡，回家至少是休息，至少有一個地方供我思索，供我計劃應當如何進行第二個步驟。

在我的腦海深處，似乎有一個自幼以來的信念——阻礙和困難愈多，往往預示着終必成功。

走近塞姆山德街的時候，我叫安娜先到隣家去抱安特烈，而我則逕往寓所。如果一切平靜無事，我再在窗口打招呼叫她過來。

我走上樓，聽聽我房間裡的動靜。毫無聲息。開了門鎖望了一望，一切依然如故。安娜早已等在隣家的窗口，我就招手叫她過來。

她跟安特烈過來之後，我橫躺在床上，但總也睡不着。任何聲響都覺得在攪擾我。我又爬起身來，走到窗口。我的心『別』的一跳！

正對我窗的公園裡，有兩人坐在一張木長椅上，他們都在張望我的窗口。

我望窗帘這邊退了一步，隱藏我的身體。他們隔不了一回就舉目望望，然後繼續談話。他們祇注意我的窗口。我偷偷細看，但隔得那麼遠，總也認不清他們的面容。似乎完全是陌生人。我到廚房去喊安娜的時候，聽見有人在敲我公寓的門。

我停步靜聽。安娜從廚房裡出來的時候，我做着手勢叫她不要作聲。又是一陣敲門，聲音很大。這樣重

復了四次。外面的人似乎決心要裡面的人答應，敲得那麼急遽。安特烈趁這個機會從起坐間裡溜出來伏到母親身上。

門上重重的一拳，且粗暴地喊着我名字：『高會科！』

我聽得出這是蘭夫倫鐵夫准尉，柴鮑丁的汽車司機！

他喊了我好幾回。接着聽見他的腳聲下樓去了。我回到前窗。坐在木長椅上的兩個人，仍舊不時在望我窗戶。

安娜抱着安特烈坐在起坐間裡。她目不轉睛的看着我。我知道非有積極行動不可了。那時是七點零五分。住在我隔壁的加拿大皇家空軍的哈樂·馬因軍曹此刻定已回家了。我奔到後面與他家一柵之隔的陽臺上。馬因正坐在那裡納涼。

我問他，我能否跟他說一句緊要的話。他說：『當然可以！』我要求他，萬一我跟安娜發生什麼突然的意外。請他夫婦照看一下安特烈。

馬因軍曹不勝驚異的樣子。他招呼我爬過鐵柵，跟他到裡面去談。我覺得事已緊迫，祇能簡簡單單的告訴他，蘇聯特工正在想加害我和安娜的生命，而我們都擔憂着安特烈。馬因有些懷疑，但當我把公園裡長木椅上兩人指給他看的時候，他的表情改變了。當他送我從鐵柵上爬回去的時候，他突然停了步，下面過道之中也有一個人正在望上窺探！

馬因軍曹立刻作了一個決定。

『把你太太和孩子帶到這邊來，高會科！我去叫警察。』

我爬回自家的陽臺走進屋子。門開着——安娜和安特烈不在家裡了！

奔出寓門，一眼看見安娜就在對門依略脫太太的公寓裡。依略脫太太明白我們的情形之後，就請我們住到他家去。她的丈夫和兒子都不在家。客堂裡的沙發可以過夜。她另外再給安特烈找個地方。

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當安娜與依略脫太太談着的時候，我坐在飯廳裡，覺得十分疲乏。不久之後，就有沈重的脚步聲走進外面的走廊，那是馬因軍曹和兩個加拿大警官。我把事情告訴了他們。深恐有人要暗殺我們，告訴他公園裡兩個人和後面一個人。還有柴鮑丁的司機蘭夫倫鐵夫來敲過門。

他們問了我許多問題，然後對依略脫太太道：

『我們全夜派人注意着這所公寓。你浴室的燈光是在街上望得見的。那盞燈開着，如有什麼事情發生，就關上那盞燈，我們看見這記號，立刻上樓來。』

接着對我道：

『放心，高會科先生——現在你什麼都不用擔心了。你需要我們上樓的時候，我們立刻趕到。行嗎？』

『行，行。』我機械地點點頭。

十點左右，依略脫太太把三用沙發拉開，說我們需要多多休息。我躺下之前，關了燈，拉上窗簾，望望窗下面，沒有什麼人在那裡。

大約十一點半與半夜之間，我和安娜突然驚醒。有人在敲走廊對過，我們的寓所房門。我輕輕起來，走到門邊，從鑰匙孔裡，可以清楚地看見我家的房門。敲門的是特務頭子貝夫洛夫！

跟貝夫洛夫一塊兒的還有羅各夫，安其洛夫和貝夫洛夫的密電員法拉托夫。我聽着的時候，隣居馬因軍曹的房門開了。他問他們幹什麼。四人之中有一個對他提起了我的名字。軍曹說道：

『高會科家裡都出去了。』

貝夫洛夫謝了他一聲，四人就下樓而去。

我站起身的時候，安娜拉了我一把。『不要動，』她輕輕說，『他們還會回來的！』

等了一會兒，貝夫洛夫果真又來了，用一根鐵棍，撬我的房門。一陣礮軌之聲，門給打開了。他們進去之後，輕輕把門關上。

依略脫太太也踏着腳趾走到我的旁邊。

『我把浴室裡的電燈開關了好幾下，但沒有警察上來。這怎麼辦？』

我請她去打電話。她接通了警察局，說有人在撬開塞姆山德街五百一十一號公寓裡四號的房門。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剛才兩個警官出現在我公寓的房門口。那位曾經吩咐過我話的衛爾虛警官，急不及待，一手就把門推開。他跟另外一位麥克柯樂警官一眼就看見那四個俄國人在搜尋我的抽屜和櫃子。

我們把依略脫太太的房門輕輕開了一條縫，聽着對過房間的動靜，衛爾虛問他們所幹何事，貝夫洛夫嚴厲地回答道：

『這間公寓住的是一個蘇聯大使館的職員，姓高曾科！他今晚到多倫多去了。他在家裡忘記了一些文件，我們得到他允許前來給他拿去。』

衛爾虛的話也一點不含糊：

『他也允許你破壞他的門鎖嗎？……』他指指房門，『你空手能打開這門嗎？』

貝夫洛夫勃然發怒。

『你怎麼敢這樣對我說話？我們原有鑰匙的，但遺失了。但這鎖是蘇聯的財產，我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命令你出去！』

衛爾虛回答道：『麥克柯樂警官，我們一定要等在這裡，直到巡長到來。』接着好像又對貝夫洛夫道：『對不起，請你把身份證件給我看一看！』

巡長麥克唐納後來到了，把四個人盤問得更加嚴厲。貝夫洛夫急得冒火。他指責剛才兩位警官侮辱了他們，侵犯了蘇維埃外交人員的尊嚴。巡長叫他們等一下，他要回去請示一下，但他走後，貝夫洛夫就命令其餘三人，跟他一起離開了那裡。衛爾虛和麥克柯樂也不阻止他們。

在四點不到，又有一陣敲門，敲過道對面我寓所的房門，但這一次聲音很輕，很小心，我沒有認清什麼人，那人已經走了。

到第二天早晨，另外一位巡官來訪問我們。他說加拿大皇家警察總署要我到司法部大廈跟我談話。安娜嘆了一口長長的氣。

『到底，伊各，到底他們肯聽你的報告，』她說。『我非常開心。』

我鬼鬼穿上衣服，看看安娜。她臉色蒼白，神經似乎非常緊張。『我到司法部去，你做些什麼事呢？』我問她。安娜的答復像往常一樣。

『我有許多東西要洗。你不必擔心我，伊各。』

司法部大廈接待我的情形，與昨天兩次顯然不同。警署的高級人員和文職偵探都在等待着。他們以禮貌相待，差不多問詢了我五個鐘頭，我答復他們的問題。我把那些文件翻譯給他們聽之後，顯然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

我談到我的投報無門，那警官對我笑着說道：

『我們並沒有像你所想的那樣漠視你。』他說。另一個文職人員說道：

『不見得吧，我跟我的同伴坐在公園裡有好半天的功夫，注視着你的寓所。』

那兩人原來是警署所派的人，並不是像所猜度的那樣，是蘇聯特務。事實上，昨天我跟安娜與安特烈在司法部等待兩小時的時候，加拿大外交部與警察總署會商着如何處理我這個案子。並且還請示過總理金氏。他們決定把這件事擱置若干天，靜觀發展，判斷我所說的種種是否真有其事，或者不過是反蘇心理所造成我的神經錯亂。他們並且認為，如果我的報告確鑿的話，那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國際巨案。

經過了這幾天的緊張之後，又有極長的一段時期，我隱藏了起來，受他們嚴密的保護。後來安娜分娩期近，又需要謹慎的佈置，因為貝夫洛夫是知道安娜情形的，他一定注意着每一家醫院。所以，到了十二月的某一夜，由一位警官裝扮着安娜的父親，送她到醫院裡去。他假裝着波蘭人，說着極不連貫的英語，安娜也裝着不懂英語的波蘭女人。

生下來的是女孩，重七磅十二兩。分娩兩天之後，有一個看護偶然走過安娜的床前，說道：

『啊，你在這裡！你記得嗎？你上次在渥太華生產第一個孩子是由我照顧的。』

安娜嚇呆了，但她仍舊很鎮靜。她說她是波蘭農婦，以前從未到過渥太華來。接着另一個偽裝她丈夫的男人走了過來，那看護認為自己弄錯了。以後就沒有什麼意外，可是我們都擔心着。

藏藏躲躲的生活，總是不舒服的。我會經爲了作證，多次在法庭露面——至少二十次——但都佈置好嚴密的保護。貝夫洛夫和蘇聯特工一時決不會忘記我，加拿大警察總署也絕不馬虎。但總有一天，事情會鬆下來的，到了那時，我跟安娜與孩子們可以過正常的生活了。

但也有令人可喜的許多遭際。我逃亡的時候，絕沒有想到會有什麼金錢收穫。可是有一位渥太華鉅商撥款供我一生的生活。一個美國雜誌給我可觀的稿費，請我寫一段暴露蘇聯間諜案的經過。好萊塢拍一部有關

我和安娜的影片，給我大筆的版權費。還有本書行銷後的版稅。我空閒的時候，繪畫自娛，這些畫早在若干城市的展覽會裡陳列過。

而最大的收穫却在精神方面：我已經爲千千萬萬被奴役而不敢作聲的俄國同胞盡了責任。美國、加拿大、歐洲、遠至印度各地都有人寫信來溫暖我的心。

那天，當警察總署的報告發表之後，加拿大總理金氏曾有四十分鐘接見我，最後他對我說：

『你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行動。加拿大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得感謝你。』

這一切都鼓勵我生活下去，直到俄國的同胞也能享受到加拿大這樣的自由，這種自由也就是給我以力量，鼓勵我作那鉅大決定的。誠然，俄國的同胞未必人人有我這樣的機會，但我以爲至少是一種光明的啓示，使大家知道，像我這樣在蘇維埃機器中的一隻小齒輪，也可以作如此的貢獻。

最有趣者，這個蘇聯間諜網敗露，功勞最大的人，其實要推那位名義上爲蘇聯大使館二等秘書，實際是蘇聯政治保安局駐加特務的頭腦貝夫洛夫！

一個小小的行動，往往會神奇地引起極大的後果，影響到一人或一國的命運。加拿大當局起初對我懷疑，直到發現貝夫洛夫用鐵棍撬開了我寓所的房門，方始相信伊各·高曾科並不是發神經病，確有實在的案子要舉發！

879.57

7711

1155

高曾科 著

鐵 幕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879.57

著者號 7711

登錄號 1155

Published by

Hsin Sheng Pao Daily News

國史館藏書



0120724

每

一元正